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大卫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林兆木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 / John Frisbie
欧伦斯 / 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 / 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 / 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 / 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 / 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 / Marc Uzan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新年寄语

当岁月的钟声敲响，我们收获了过去一年殷实而丰硕的果实；在新年的春光里，我们又开始播种新的希望与梦想。

回眸过去的一年，全球经济正在缓慢复苏的进程中，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正在蓬勃发展，全球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稳步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突出，在世界的影响力、话语权明显提升，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已经展现在世界面前。随着建立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经略周边、“一带一路”等和平外交及经贸战略的实施，将使中国开放型经济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015 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将是我们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风险和挑战仍然严峻，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形势仍然错综复杂，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压力仍然很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任务更加繁重，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更加迫切，体制机制改革更加艰巨。这就更需要中国智库汇全球思想、融各方智慧，切实发挥好为决策服务的作用。

《全球化》作为一家智库刊物，创刊以来，我们一直秉承曾培炎理事长提出的“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创新、求实、睿智、兼容”的理念。在办刊方向上，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刊物定位上，我们牢牢把握为中央决策服务这个大局，以战略研究、政策研究为主要特色，突出全局性、前瞻性、创新性，注重刊登针对国际国内重大现实问题、长远战略问题的研究成果，切实发挥好“临门一脚的作用”；在办刊风格上，我们坚持全球视野、质量兴刊、精品名刊的战略，牢固树立品牌意识、质量意识和开放意识，力求做到权威性、导向性和包容性相统一，理论性、专业性、应用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办好本刊专论、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产业发展、企业发展、区域经济、名人观察等特色专栏，在国际经贸、和平外交、全球治理等方面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倡议。力争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智库刊物，努力成为世界一流新型智库的标志性刊物。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们已经迎来了中国智库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智库刊物是传播智库研究成果、提升智库话语权的主要载体，也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历史的使命、责任与担当，是展示中国智库创新能力、国际影响力、品牌竞争力的重要窗口。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在这充满期待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共同携手，励精图治，汇集专家资源，集聚优秀成果，为社会提供更多有影响力、有价值的思想产品，努力把《全球化》打造成为有特色、高水平的智库刊物，成为智库交流的新平台。

《全球化》编委会

2015 年 1 月

• 本刊专论 •

我国共同富裕道路问题研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006)

关于全球经济形势、中美经济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 朱光耀(019)

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对美国货币政策、美元走势的分析 李德水(026)

稳增长首先必须稳心态 贺 铿(029)

中国环保产业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杨朝飞(032)

• 国际经济 •

地缘政治危局笼罩下的世界经济 谷源洋(035)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地缘政治经济分析 盛思鑫 曹文炼(049)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综合评估及应对 任海平 王天龙(061)

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周 怡 戴颖杰 水名岳(072)

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与对策研究 李罗莎(084)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 企业发展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程凤朝 刘 铭(097)

• 智库信息 •

加快推动两岸中小企业交流合作

——第五届两岸中小企业合作发展论坛综述 周小柯(111)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9)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3)

• 英文摘要(ABSTRACTS) • (131)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征稿通知 (134)



CONTENTS

Research on the Road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Our Country

Research Group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006)

The Global Economy, China-US Economic Relations, and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Zhu Guangyao (019)

Recognize Correctly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i Deshui, He Keng, and Yang Chaofei (026)

The World Economy under the Dangerous Geopolitical Situation

Gu Yuanyang (035)

A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Sheng Sixin and Cao Wenlian (049)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untermeasures

Ren Haiping and Wang Tianlong (061)

Research on the Going-Out Strategy of Chinese Financial Industry

Zhou Yi, Dai Yingjie, and Shui Mingyue (072)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and Measures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Li Luosha (084)

Som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Governance of State-Controlled Listed Companies

and Countermeasures

Cheng Fengchao and Liu Ming (097)

To Accelerate Cross-Strait SM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 Review of the Fifth

Cross-Strait Forum on SM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Zhou Xiaoke (111)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9)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3)

· 本刊专论 ·

我国共同富裕道路问题研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摘要：共同富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建国以来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以按劳分配为目标的计划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出现低水平平均化、“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收入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和与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收入分配制度五个阶段。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但在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转移性支付政策效果等方面仍然存在一系列严峻挑战，迫切需要政府部门转变思路，在对口援助和帮扶方面建立责任机制，实现一体化共同发展，加大财政收入和倾斜力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财税优惠、信贷支持等方面鼓励小微企业发展，建立“造富”机制，打造橄榄形社会，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提低、扩中、抑高”中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 社会主义 公共服务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可以说，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党各项工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资助。课题指导：王春正；课题组长：戴桂英；副组长：刘浩、宋群、黄志龙；组员：张瑾、徐占忱、马庆斌、王福强、徐长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据邓小平阐述的“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当前已进入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一、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政策演变评析

（一）1949年—1957年，逐步建立以按劳分配为目标的计划分配制度

这一时期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城市逐步实现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农村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消灭剥削，走合作社的道路。

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使得多种分配制度并存。新解放的地区实行“原职原薪”，即对接管企业职工实行按原工资等级制度和工资标准支付的工资政策，而对老解放区及党政军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部分供给部分工资制或工资制。供给制总体上平衡了财政收支、稳定了物价、促进了社会保障，人民生活重新走上了正轨。但这一政策也产生一些问题，如由于各地区、各单位的经济条件不同，供给制的标准和等级差距也不同，并且经济条件越好的地区，等级差距越大。由此，1952年，废除工资分制，结合工资标准调整，实行货币工资制度，对于工资标准，根据企业的重要性，地区物价等采取不同工资标准。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城镇职工逐步建立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计划，农村逐步推行农业集体化，先建初级农业合作社，保留土地分红，很快进入高级社，取消分红，实行评工计分分配办法。

1956年城乡分别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在农村针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设立过快的现象进行整顿，在城市则是采取公私分类的工资办法。一是对于手工业合作社的工人工资贯彻“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原则，对国有工业企业取消工资分和物价津贴制度，实行货币工资；二是对轻重工业、内地沿海、机关和非工业部门等工资标准做调整；三是改进工人工资等级制度，针对熟练程度、繁重程度以及技术含量等差别化定级。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深入，按劳分配逐渐成为主流，逐步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城市逐步实行工人八级工资制。

（二）1958年—1978年，收入分配出现低水平平均化倾向

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对于当时的按劳分配制度进行了批判，认为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此后，平均主义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构建。在这一认识倾向下“一化三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发动“大跃进”，一个时期内，出现了“一平二调”和“急于过渡”的平均主义倾向，平均主义重新抬头，到“文革十年”，甚至想扩大实行“供给制”，1971年针对兵团和国营农场实行工分制或供给制。

1973 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发布《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其中就提出“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少数重体力劳动可以实行计件工资。”但是，在现实中并没有很好的坚持，1974 年，是对于按劳分配争论更加激烈的一年，“四人帮”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按劳分配，阻挠贯彻按劳分配，使得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的现象更加严重。

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相配套。国家严格控制了分配制度，例如，国家对公积金、公益金、社员分配比例、生产队留粮标准等进行规定。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与城市一样，也呈现单一化、固定化和平均化的特点，但农民收入分配以生产队为单位，因为不存在工资的等级差异，比城市居民更为平均。

这个时期，大力推行工业化“赶超战略”，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采取最大限度提取剩余劳动，提高积累水平，压缩消费的办法。从发展经济来看，该分配制度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的积累率，为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从社会稳定来看，按照人口定量供应主要生活必需品、普遍低水平的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但是，也使得生活用品供应匮乏的局面加剧。1977 年，各地经济理论大讨论，驳斥了“四人帮”谬论，明确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计件工资和奖金，同计时工资一样，都是实现按劳分配的有效形式。

（三）1979 年—1992 年，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收入分配制度

这一时期，在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的指导思想下，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与劳动绩效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倾向。1980 年，《国营企业计件工资暂行办法（草案）》开始试行，规定企业可实行集体或个人计件，1980 年实行计件工资的达二百六十三万人。当时的计件工资总额也由 11.7 亿增加到 18.7 亿元。

1984 年以后，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背景下，城市的改革从国有企业的分配制度开始，实行“工效挂钩”，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结构工资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城市发展迅猛，城乡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开始后，城乡收入差距由相对较大，在经历了一个逐渐缩小后又急剧拉大的过程，形成一个“V”字型。1978 年到 1984 年，居民收入增幅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57:1 下降到 1.835:1。1985 年—1991 年，这个时期的收入分配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各种负担加重、乡镇企业效益下滑等，使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开始放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二是区域收入差距扩大，对外开放使得东部地

区凭借区位优势率先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而中、西部地区没有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收入增长缓慢。

（四）1993年—2006年，实行按劳分配和与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

中共十四大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体现在收入分配方面，就是国民收入实现了由按劳分配为主转为按劳分配为主同时强调各生产要素参与的转变。特别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投资渠道更加多样化，股票、债券、房屋出租等非工资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收入分配政策更加强调市场配置和竞争，政府调整了计划经济时期在食品、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国家包办制度；取消对城市粮、油及副食的补贴；取消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推行医疗保险替代过去的“公费医疗”；允许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除此之外，大规模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促使大量企业破产、重组、转制和“减员增效”，使得大量职工下岗，改变过去国家包办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生老病死”体制，收入分配中的市场作用增强。在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法律的不健全，行业的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提供了环境，包括行业间、行业内等多种类型的收入差距问题也逐渐显现。

这一时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居民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2003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3倍以上。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垄断行业和新兴行业的工资增速远远快于传统行业。行业工资的高低及其相对位置逐渐不再取决于该行业劳动强度及其艰苦危险程度，而是主要取决于行业所有制垄断程度以及市场需求。

（五）2007至今，努力构建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收入分配制度

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要更加注重公平”，反映了收入分配政策导向的重大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预示着我国缩小贫富差距的若干政策将进入全面推进实施的阶段。

从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收入分配政策设计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需根据时代背景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调整创新。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是收入差距过大，整体格局仍偏于“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秩序的紊乱和不公尤其引起民众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很多国家滞留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因

此,在新时期,通过加大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力度,推动我国的收入格局向“橄榄型”转变尤其重要。总结历史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一) 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

1. 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份额中比重下降。在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但多年来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份额持续下降。从工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关系来看,在改革前十年的时间段,工资总额占比一直保持在15%以上,但从“八五”时期开始,这一比例就下降到13%左右,近年则只有11%~12%的水平。从收入法GDP中劳动者报酬的比重来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比例还在50%以上,但近年已经下降到40%以下,说明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并走向共同富裕遇到了障碍。

2. 分配格局呈现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虽然我国居民收入的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社会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趋势明显。政府在援助弱者、遏制垄断、调节收入、破除特权等方面缺乏有效措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滞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差别较大,个人所得税制综合计征改革缓慢,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对高收入人群的调节能力弱化等,巨额财产收入以及富二代不劳而获成为扩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分化的重要因素。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调查统计,1%的最富裕家庭拥有全国1/3的财产,使得建立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成为妄谈。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本世纪初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后继续升高,近年一直在0.47~0.48间高位徘徊,联合国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份额仅4.7%,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份额为50%。亚洲开发银行报道,我国13亿人口中,约5.83亿生活在国际公认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到两美元。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巨额财产收入使富二代等不劳而获,社会食利阶层大量出现。

3. 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改革开放以来,垄断性行业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近几年以超过其它行业数倍的速度增长,而低收入行业,如农、林、牧、渔业等一直处于低增长水平。上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但近20年来行业收入差距发生较大变化。其中,收入最高的金融保险业人均年工资上升最快,1993年尚不足5000元,到2010年超过80000元,涨幅超过16倍;垄断行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涨幅为8倍,接近50000元;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收入增长最为缓慢,1993年为3000元,到2010年为16000元,涨幅为5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农、林、牧、渔业的平均工资之比为5.06: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收入差距在

1.5~2 倍左右。2010 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36539 元，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是它的 2.25 倍。据北京社科院发布数据，近十年来，金融业工资收入一直是北京收入最高的行业，2012 年金融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 20.9 万元，比 2003 年翻 2.39 倍。2008 年—2010 年，工资最低的行业农、林、牧、渔业与金融业工资收入比为 1:7，最低行业在岗职工干 7 年才能赚取金融业职工相应工资收入。

4. 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改革打破了计划体制低效率的分配制度，但体现共同富裕理念的收入分配秩序尚未全面建立起来。政府对工资管理的行政手段减弱，然而市场经济通行的工会、雇主、政府三方协商机制却没有真正建立，造成职工工资增长过度低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工资总额过度低于企业利润总额增长。各级政府往往将经济发展政策与 GDP 指标近期化，而将共同富裕政策与改善分配等社会福利远期化，政府在初次分配环节的越位和再分配环节的缺位，造成收入分配与共富目标脱节。

5.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面临的体制性障碍。第一，市场公平竞争的机制不完善。各种行政性垄断造成不公平竞争，一些部门和行业以行业管理维护市场秩序为名，通过行政法规和手段垄断市场、垄断资源，在垄断条件下获取高额利润并据为己有，是导致当前不同行业、部门和企业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政府对一些特区、开发区实施特殊政策，使之获取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成本和竞争优势。社会医疗卫生和教育资源在城乡、地区布局很不均衡，居民获得的人身健康和能力培养作为竞争起点不公平，户籍制度也造成公民竞争机会不均等。第二，市场工资形成机制不健全。我国尚未有效推进雇佣双方集体谈判、政府协调管理的工资形成机制。普通劳动者在工资分配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体制与机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激励和约束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发展中，无原则地牵就于资方，放弃对劳动者就业、收入和保障权益的维护，侵害了广大职工的权益，造成企业生产率和利润高增长，职工工资低增长或不增长。第三，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差距过大。政府对有关部门和国有企事业收入分配的监管不到位，造成这些单位工资管理不规范，工资外收入泛滥且不透明。同时，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改革也没有统筹考虑社会群体间的差异，不同的社会群体根据所在单位的不同，在改革过程中得到的补偿也不一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没有统筹解决好改革成本补偿和平衡问题，造成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社会保障待遇差距过大，下岗失业人员生活困难等问题。第四，收入再分配机制存在缺陷。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医疗卫生和教育资源在城乡、地区布局很不均衡，居民获得的人身健康和能力培养作为竞争起点严重不公；对个人所得以及财产的税收调节作用也亟待加强，征管手段不能适应需要，房产税改革缓慢，使得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实难以有效校正。第五，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管理落后。

市场交易手段和监督管理不能适应需要，金融和财产实名制及其监测制约了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改革处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的层次的力度不够，且多头管理、缺乏协调，体制交叉的矛盾突出。一些部门、地方和利益集团以自身利益影响收入分配制度与政策制定，致使收入分配领域的深层次的矛盾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

（二）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基本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险、救助、优抚等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但还未达到完善程度，仍面临诸多问题。

1. 管理体制分割，信息化建设滞后。第一，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分别由相关政府部门提出并予以执行，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分割导致社保政策体系先天不足。不同地区间、城乡间保障项目、水平各不相同，制度、机制间缺乏衔接和协调，社会保障关系在不同地区和城乡间转移和异地就医结算、报销困难，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第二，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信息量急剧增加、数据频繁更新，传统社会保障手工操作和单机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社会需求，我国不少农村行政村一级社会保障管理信息及服务平台几乎是空白。

2. 社保发展层次低，保障水平不平衡。第一，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理念还停留在消极的收入保护政策上，对社会投资式积极福利政策考虑不足，社会保障体系处于消极防御状态。例如城市贫困居民生活保障只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线目标，对于减轻居民贫困程度无能为力，致使这类贫困长期延续。第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已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仍处于依靠家庭保障、土地保障及国家救济的低水平上。占总人口近 70% 的农民，只享有社会保障支出 10% 左右，城市居民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是农民 20 倍以上。这是在我国目前城乡差别仍然较大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的现象，但这种城乡差别明显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制约农村消费市场启动。

3. 社保基金缺口增大，资金运作效率低下。第一，资金缺口大。社会保障基金积累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和人们需求，随着人口老龄化，实际缴费人群相对减少，享受人群相对扩大，导致社保基金有很大缺口，给社会带来很大安全隐患。“统账结合、部分积累”的制度创新模式无法解决历史遗留的债务问题，支付统筹基金时透支个人账户储存金情况很多，一些企业逃避或拖延缴费，脆弱的社会保障基金基础直接导致社保金不够支付金额。第二，社保基金运营与保值、增值陷入困境。以货币形式存在的社保基金与通货膨胀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有贬值危险。养老保险陷入收入减少、缴费率提高和支付危机循环中，部分积累制度的养老模式优势受到严峻挑战。

4. 社会保障法规不健全，缺乏有效监管。第一，社保法规不健全。至今我国还没有

一部综合、权威的社保基本制度保障法，致使不同地区和不同所有制单位社会保障政策和措施五花八门，社会保障事业强制性和公平性难以发挥。第二，社会保障立法工作滞后，导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缺少连贯性和时效性。缺少专门和统一的法律法规指导，仲裁机构和法院仲裁或判决缺乏权威法律依据，社会保障事务管理和运营存在实施力度不够、操作程序不科学问题，基本社会保障强制性、权威性难以发挥。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量相对薄弱，影响法律法规效力。

（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公共教育服务资源配置城乡和区域不均衡。教育机会公平是社会分配公平的起点，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先城后乡、重城轻乡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巨大。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教育由政府解决，农村教育通过农民集资、合作解决，这导致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突出。据调查，我国省域内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县级差距有 10 倍以上。城市学校教师学历和高级教师比例远高于农村学校，农村教师老龄化现象比较突出，教师信息闭塞，教育方式和方法陈旧，教学质量不高。农村生源大量流失、农村优秀教师大量流失、农村学生上一流大学机会减少等新问题，值得重视。

2. 城乡公共医疗卫生条件差距明显。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投入，但农村卫生资源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仍较突出。县级卫生机构财政投入不到位，业务经费不足，科室设置不全，设备落后。据调查，农村卫生经费 80% 用在房屋等硬件设施建设上，人员培训占投资额仅 3%，农村卫生机构缺乏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机制，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严重滞后，乡镇卫生机构无学历人员占 50% 以上。目前，卫生费用城乡分配明显向城市偏斜，我国 80% 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其中 30% 集中在大医院。

3. 城乡、区域间基础设施均等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国全面开展了公路建设、电网改造、房屋改造、饮用水及沼气等工程，总体上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然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仍有 42% 的人口未实现集中供水，2/3 的农户未实现沼气入户，全国仍有 1200 乡镇、12 万个建制村不通沥青（水泥）路，城乡间道路数量、质量差距巨大。中西部偏远地区农村电网改造面较低，农村住房建设仍然滞后。目前我国农村仍有较大比例的地区存在电网老化、电压不稳、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的状况。信息化条件下城乡间数字鸿沟成为基础设施差距的又一问题，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亟待跟进。

4. 公共文化服务差距较大。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证研究证明，各省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差异明显。上海、北京属第一类地区，高基数高

增长，地区综合实力强，公共文化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人均文化事业费、公共图书馆人均购书费、每万人公共图书馆数量、每万人群艺馆数量、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册数各项指标几乎都高于其他省份；福建、新疆、海南、重庆、河北、青海、西藏、贵州、内蒙古等 9 个省份基本公共文化基数较低，但增长速度很快，多数省份人均指标靠前。浙江、云南、陕西、广西、广东、山西、江苏、辽宁、天津、四川 10 省份基数水平较高，由于人口基数大，对公共文化事业投入不足等原因，增速放缓，传统优势不再明显。吉林、黑龙江、山东、湖北、甘肃、江西、宁夏、湖南、河南、安徽基础弱，发展后劲不强。

5. 城镇公共服务没有均等地惠及流动人口。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2011 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 50%，达到 51.27%，城镇化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点内涵。近年来，我国农民工总量逐年增长，到 2011 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5278 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 15863 万人。在进城务工农民群体规模扩大过程中，一些外出较早、有熟人关系介绍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有了相对稳定的预期，逐步过渡到举家进城阶段。但是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工应该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并没有惠及他们，包括社会保障、就业培训、住房制度、计生服务、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和计划免疫、免费或低价公共服务项目。

6. 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相适应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政府大量公共财政流向城市，使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长期供给不足。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各地户籍人口为依据，在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城的背景下，流入地地方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问题十分突出，城市无法按户籍人口标准为新迁入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大量流动人口无法获得医疗卫生、养老、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没有清晰责任划分，省、市政府对县、乡政府财政控制加强，导致地方政府财权层层上移，而公共服务事权和支出责任重心层层下移，造成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上关系不顺，严重削弱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四）财政转移性支出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财政转移性支出是各国调节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重要工具。然而，近年来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有的甚至还助长了城乡、不同阶层、地区间居民的贫富差距。

1. 财政转移性支出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问题突出，农村在经济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等方面

始终处于弱势一方，这给社会稳定和农村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财政转移性支出作为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工具，理应在缓解城乡贫富差距发挥关键作用，应将更多的资源配置给农村。但是由于转移性支付多是采取基金安排，有些支出没有起到调节差距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9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一直远远高于农村居民。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1257.17元，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114.08元，两者差距达11.02倍。随后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在2003年达到最大值14.74倍。2004年随着我国全面免除农业税，并逐年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但至2011年，农村与城镇的差距仍高达8.14倍，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分别为5708.6元和701.35元。

从1999年—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增速情况看，2004年以前，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的增速一直高于农村，这使得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自2004年起，由于政府通过税费改革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增加了对粮农的直接补贴，使得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大幅增加。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支出增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由于在绝对数上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差距过大，至2011年，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高达5000元。由此可见，整体看十余年来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并未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由于其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而使收入分配矛盾加剧。

2. 财政转移性支出扩大了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

财政转移性支出是缩小不同阶层贫富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我国高收入阶层获得了较多的转移性收入，低收入阶层反而获得的较少。以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收入数据为例，按照五等分法将农村居民按收入高低分成五组来考察人均转移性收入情况，2002年—2011年，高收入群体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一直高于低收入群体，并且收入阶层越高，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也越高。2002年，农村低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3.72元，高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97.02元，后者为前者的12.52倍；2011年，农村低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达到了265.04元，同期高收入户人均获得转移性收入1263.35元，后者与前者的比值下降到了4.77倍，高收入户获得更多转移性收入的不合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从增速看，2003年—2011年，农村地区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增速一直高于中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但数据表明只有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在2004年—2011年的人均转移性收入增速呈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相反，高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的增速明显上升。因此，无论在绝对量还是增速上，公共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支出都应保持政策连续性，避免不同阶层收入分化的加剧。

3. 财政转移性支出扩大不同地区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一般认为，财政转移性支出是缩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然而，2005 年—2011 年我国较发达的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普遍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从各省市区的的情况看，2011 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 5708.78 元，全国共有 23 个地区该数据在平均值以下，其中人均转移性收入最低的 4 个地区都没超过 5000 元，而收入最高的 6 个地区都远超过 7000 元，其中城镇人均转移性收入最高的北京是收入最低的西藏的 7.12 倍。

2011 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 563.32 元，全国共有 17 个地区该指标在平均值以下，其中人均转移性收入最低的 8 个地区该项指标不足 400 元，而收入最高的 7 个地区则都在 700 元以上，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农村人均转移性收入一枝独秀，分别高达 3440 元和 2257 元，农村人均转移性收入最高的北京是收入最低的广西的 9.5 倍。

三、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对策

我国达到共同富裕的道路还很长，但必须从现在做起，以发展经济和提升经济水平为基础，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分好。要建立有效机制，控制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一）建立帮扶责任机制，实现先富带后富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国家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让一些地区，让一些人先富裕起来，同时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平等现象也突现出来。目前到了先富带后富的历史阶段，当务之急是国家应建立先富带后富的责任机制，促进共同富裕。第一，东部地区帮扶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以达到共同富裕。在国家确定的对口支援的框架下，真正建立对口帮扶长效机制，结成经济共同体，形成共谋发展、共同富裕的格局。有对口支援任务的地区在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公共服务指标实行一体化考核，使被支援地区逐步在公共服务方面享受同等公共服务水平。对人口少、缺资源的地区，结成帮扶关系的双方，在经济建设指标、社会发展、财政收支、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总量和增速、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公共服务等指标实行一体化考核。这样，发达地区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逐步全面提高帮扶地区和帮扶对象发展水平，缩小富裕程度的差距。同时，中央对在帮扶的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给予政策支持。东部发达地区，对本行政区内的欠发达地区实行承包责任制，自我消化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达到区域内共同富裕。第二，建立城乡一体化机制，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有条件的城市，要在交通、通讯、公

用事业等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延长辐射到所辖的行政村；不具备条件的城市要创造条件扩大对农村提供服务的范围和水平。城市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要与农村建立帮扶责任机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公共教育体系应当覆盖到农民的学龄子女，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落实土地改革制度，实现城乡土地要素平等交换，大幅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建立对中小城镇农业人口城镇化目标责任制，放开落户限制，消除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缩小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价格差距水平，提高农民的收入。第三，发挥企业社会责任，建立与欠发达地区共生共存共发展机制。在欠发达地区投资的企业要把企业的总部设在本地，特别是资源性企业，按照税收属地化的原则，对资源地财政做出贡献，承担社会责任。具备条件的企业要在交通、通讯、教育、公用事业等领域提供相应的资金投入，以改善当地的生活和投资环境。资源开发型企业，尽量在当地设立加工企业，提高资源的附加值，有的还要为当地提供自用的资源。除科技人才和特殊岗位以外，基本实现企业员工本地化，为本地居民增加就业机会。

（二）加大直接投入和政策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研究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衡量标准和指标体系、阶段性目标和相关政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原则是，缩小贫富差距，使欠发达地区在吃、住、行、学、医，以及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与发达地区享受同样的标准水平。政府通过直接投入和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加快建设交通、通讯和城乡公共事业等基础设施，使欠发达地区尽量达到与发达地区同等水平。以提升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逐步推进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生态脆弱、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实行移民政策。各级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将国家明确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功能区，加大移民力度，实行零人口的功能保护区，使迁移出来的居民有就业岗位，实现自己救自己，并享有同等条件的公共服务水平。

（三）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打造“橄榄”型社会

第一，打击垄断，限制非法致富。加大《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限制垄断行为和非法牟利，保护公平竞争。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和“灰色收入”监督和管理。适当开放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调节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第二，扩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城市切实贯彻劳动者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村贫困群体逐步完善农村低保制度，

尤其是解决好拆迁农民的养老和就业问题，让拆迁农民分享土地出让产生的利益。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城乡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着力缓解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不断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逐步把城乡居民整体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促进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深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健全医疗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构建城乡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和相应的配套体系。第三，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实现公平教育。规范基础教育的公平机制。国家重点扩大农村地区初、高中教育的财政投入，保证农村居民能够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有效的教育。完善高等教育保障机制，加大对贫困家庭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扶持力度，健全高等教育的扶贫资助体系。建立城乡社会失业、下岗、待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转型和升级机制，把保障城乡弱势下岗失业人员接受教育培训机会，作为人力资本政策的重要内容。第四，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培育中等收入阶层，有计划、有步骤地培育中等阶层群体的收入水平。为中等收入者阶层创造良好环境，充分发挥政府在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主导作用，让市场机制在催生和促进中等收入者阶层发展上发挥有效功能。

（四）政府要放宽政策，让低收入者阶层“休养生息”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从政策上给低收入阶层以扶持。第一，要政策“造富”。积极支持、鼓励低收入者从事个体工商户经营，创办私营企业，给予优惠政策支持，优先给予贷款支持，帮助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为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积累后劲。第二，调整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针对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起点太低的问题，要继续深化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落实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政策，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第三，鼓励公益捐赠。一方面开辟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来源，另一方面缩减高收入者的财富保有量，正向引导共同富裕，对公益捐赠实行免税政策，对出资赞助教育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鼓励高收入者以捐赠方式参与社会公益。

（五）加强宏观调控，缩小贫富差距

在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一，研究制定共同富裕战略规划。共同富裕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稳定密切相关，在制定和实施现行的政策规划时，必须与长远发展目标，特别是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衔接。因此，应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体系中，提升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地位和行动能力。应积极制定共同富裕战略规划，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具体实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为实现共（下转第 34 页）

关于全球经济形势、 中美经济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

朱光耀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复苏曲折缓慢，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主要国家利率政策出现分歧，新科技革命尚待突破。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在经济、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两国关系对中美双方乃至全球影响深远。中美任何一方的经济发展趋向和政策状况，不仅对本国、也事关对方和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本文在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改革、房地产、地方债、影子银行等问题。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 基础设施 汇率 地方债务 影子银行

作者简介：朱光耀，国家财政部副部长。

一、对目前全球经济形势的认识

首先，全球经济面临新挑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10月7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将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7月份的3.4%下调至3.3%。这主要是由于2014年迄今为止全球经济活动弱于预期。雷曼兄弟破产已过去六年，但金融

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全球经济复苏曲折缓慢，不平衡性、不稳定性突出。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严峻的挑战，亟须解决经济结构的问题。同时，地缘政治危机也不容忽视。

其次，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六年多来，全球范围内就业形势依然堪忧，当前就业水平仍然低于六年前的水平。令人欣慰的是，美国 2014 年 9 月份的失业率降至 5.9%，中国在 2014 年前 8 个月新增就业达 1000 万人左右。但其它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欧元区国家的青年失业问题尤其严峻，这将对社会稳定带来挑战。也正因此，今年的 20 国集团（G20）会议仍将经济增长和就业作为核心议题。各国必须加大力度促进经济增长，切实改善就业。

第三，主要工业化国家利率政策分道扬镳。目前全球利率已跌至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了 3.3 万亿美元，日本也通过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巨大的流动性。美联储已明确表示本年度内将结束量化宽松政策，从明年起启动升息进程，实现利率正常化。与此同时，基于目前 0.3%~0.4% 的过低通胀率，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首次承认欧元区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和挑战，公开表示欧央行 2017 年年中以前都不会提高利率，这与美联储的政策走向形成强烈反差。应格外关注美国、欧洲、日本及其它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变化趋势，特别是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确保 G20 确定的货币政策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并密切关注货币政策的实际影响，包括对汇率的影响。

第四，新科技革命期待突破。从二战后的经济发展史看，每一轮经济危机都蕴育着技术革命，每一轮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新的经济繁荣周期。当前，新科技革命仍在酝酿，但尚未形成突破。人们寄希望于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作为新一轮革命的突破口。中国、美国和欧洲应发挥领导作用，采取切实的行动推进技术革命，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重回正常轨道。

第五，美国仍然维持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内的领导地位，但表现出对其领导地位的彷徨。我们必须认识到，二战以后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建立由美国主导，其后美国一直维持在该体系内的重要领导地位。但如今美国开始表现出对其领导地位的彷徨。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共同构建，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美国一直迟迟未能批准 2010 年 IMF 份额和治理机构改革方案，美国应该尽快批准该方案，使 IMF 能落实改革议程，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目前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下，世界经济要想重回正常轨道，美国就必须兑现对国际体系和制度构建的承诺，包括安全 and 经济方面。美国在这方面做出表率，才能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维护二战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也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目前美国

的 GDP 为 16 万亿美元，居于世界第一位。就目前全球经济结构而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代美国的地位。国际社会迫切希望美国能够尽快解决自身问题，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事关整个世界的利益，更事关美国自身的利益。

第六，中国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中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原则。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形势，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将更加开放，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改革开放永不止步，中国必须持续推进改革开放。这对中国是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指示，为此，必须不断改革国内经济结构；对于国际社会也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表明中国将继续扩大和完善对外开放格局，更加全面与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参与“10+6”区域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这包括 10 个东盟国家，以及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希望以此加强同各国的经贸联系，促进地区合作，使每个成员国获益。中方将继续扩大进口，稳定出口，欢迎外商更加积极地到中国直接投资，并将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往来。

二、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分析

当前，中美经济关系十分密切，不仅仅体现在每年 5200 亿美元的贸易额和 1000 亿美元的双向直接投资额，两国经济关系已形成相互依存、深度交融的格局。最近，IMF 将美国 2014 年经济增长率预测从 1.7% 调高至 2.2%，提升了 0.5%，这种情况并不常见。IMF 预测中国 2014 年经济增长率仍为 7.4%。2013 年全球生产总值（GDP）总额为 73.9 万亿美元，中国为 9.2 万亿美元，美国 16.7 万亿美元，中国 GDP 占全球的 12.4%，美国占 22.7%。而基于 IMF 预测的 2014 年美国增长率和中国增长率，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今年将达到 27.83%，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为 15.3%。根据 G20 成员提交的涵盖投资、贸易、就业、竞争力等领域的增长战略，中国是对实现 G20 未来五年全球经济规模额外增长 2% 的目标贡献最大的国家，贡献率达 30%~40%，这一水平也与目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相一致。

我们希望美国能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更好地发挥经济领导力，对中美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友好互信的中美关系将有利于世界和平、经济发展及地缘政治危机的解决。关于中美关系，以下几点需要重点关注。

首先，中美贸易潜力巨大。美国对华出口额出现了迅速大幅提升，如果美国加快改革高技术出口管制体系，中美贸易关系有望取得实质性改善。彼得森研究所从历史发展的视野和战略高度提出建立中美自贸区的长期愿景，以实现中美经济的更深度融合，值

得重视。关于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等，虽然目前各自参加方有所不同，但是离不开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紧密合作。中美两国如果能协同一致共同努力，势必能够带动更大范围的创新，促进更程度的发展，继续提高两国乃至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次，《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大进展。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就开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达成了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启动了以准入前待遇加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双边投资谈判。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上，中美双方目前正在开展紧锣密鼓的磋商，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尤其是协定文本概念澄清工作有了很大的突破，经过多轮谈判所达成的协定能够实现高标准高质量的目标。

再次，中美双方在处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关系方面须达成共识。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而言，美国国内有争论，中国国内也是如此，都在进行辩论。但是中方将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继续开放，以高标准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目前，美国希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只有 12 个参与方的情况下结束谈判，在谈判结束之前不再吸纳新的成员。但应当认识到，没有中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不完整的，中国和美国都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成员。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已明白无误地表明，中方正在积极推进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为此，中方欢迎美方表现出开放的姿态，并希望能和美方一道，不断努力，共同合作，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发展和市场开放。双方在商讨非洲的能源、公共卫生等重大问题时，中美都已充分认识到双方形成合力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并会对非洲等第三方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投资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第四，中美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合作也有很大潜力。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双方都强调了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重要性，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应增进讨论交流，切实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促进全球行动，共同推进 2015 年的巴黎会议取得成功。2014 年 7 月举办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均强调开展中美能源合作，包括加强页岩气开发合作，以及美液化天然气对华出口等。我们期待私营部门在这些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另外，在 G20 框架下中美共同开展化石燃料补贴同行审议，化石燃料补贴同行审议对于能源价格合理化非常重要，这也直接服务于应对气候变化。这是中美两国在 G20 框架下的良好协作，希望更多成员参与其中，共同行动。

最后，中美两国在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保持着紧密合作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 G20 和亚太经合组织的重点议题之一，各国已经认识到基础设施开发的需求和资金供给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中国成功主办了 2014 年度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作为亚太经合组织两大重点领域的投资、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议题，以及 APEC 峰会和 G20 峰会二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成为会上讨论的重点，并达成了广泛共识。中美两国都支持世界银行成立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充分发挥作用，筹集更多资金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提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澳大利亚也提出成立一个推动基础设施开发的中心。这些提议都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我们期待今后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出现实质性进展，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实现这一突破离不开密切的沟通交流和坚定的政策支持。

三、关于目前中国经济基本情况的分析

自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开始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全面改革。根据中央的部署，一年来推进了财税金融改革、科教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这些改革方案已经公布，改革力度前所未有的。改革突出法治，强调法治是所有改革的基础，改革必须于法有据。2014 年 10 月 20 日—23 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已将改革完成时间定为 2020 年，计划到 2016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通过这些努力，我国正在不断接近实现制定的目标：到 2020 年 GDP 相比 2010 年 GDP 翻一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 2050 年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以下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提振内需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内需主要来自于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然而，如果中国要实现长足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就必须重视消费对内需的拉动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量日益庞大的大国，实现增长最终还是要落脚在提振内需上。如今中国正在继续深入调整产业结构，重点领域之一即为提振内需，平衡供求关系。此外，由于中国目前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必须不断提高生产力，使内需和投资实现平衡。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必须全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解决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中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实现由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向国内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转变。这事关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事关人民生活的质量，最终能为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也

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第二，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 GDP 质量。首先，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多差距，尤其是在 GDP 质量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过去 35 年中，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增长速度高达 9%至 10%，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但也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尤其是在环境方面。所以，如今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只片面注重经济发展的数量，而必须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正是因此，习近平主席提出高度重视人民对于优质生活的需求，尤其是人民对于环境方面的需求。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其次，中国现在高度重视发展的质量，而不仅仅片面强调 GDP 增长的数字本身。7.5%只是 2014 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参考目标值，无论最终数据略高或略低于这一目标，只要落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都可以接受。衡量合理区间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就业。中国的就业情况良好，2014 年 1 月至 8 月实现了创造 1000 万就业岗位的目标，有信心继续优化经济结构，实现 GDP 合理和有质量的增长。从中长期看，有信心在未来十年及至更长的时间之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我们的信心来自：一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得到了优化，城镇化进程大量增加了城市劳动人口供给；二是中国有较高的储蓄总量；三是混合所有制经济，进行了经济结构改革。这些因素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再次，中国在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2007 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占同期 GDP 的比重为 10.1%，但 2014 年上半年这一数字仅为 1.8%。如此巨大的变化正是中国政府努力推进结构改革的充分体现。2014 年上半年，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 46.6%，超过了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在此基础之上继续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发展质量和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第三产业是就业的重要带动因素，然而在第三产业内，不同部门的就业者，比如金融行业和零售服务业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仍然存在。

第三，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克服包括房地产领域在内的诸多挑战。过去，我们一直关心的是，怎样才能控制房价和地价。现在我们强调发挥市场作用，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观察市场作用的结果。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发展，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让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使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

第四，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汇率问题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重要议题。中国坚定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2014 年 3 月，中国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 1%扩大至 2%，亦即汇率总体浮动区间提升到了 4%。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浮动区间。美

方也意识到 4% 的浮动区间很大。长期以来，美方一直认为人民币价值偏低，并对此表达了关切。最近中美双方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坦诚的交流。美方欢迎中方在 2014 年 7 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之后所做的努力。在此过程中，中方允许人民币汇率随市场浮动，在一定区间内不加干预。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背景是，美元开始升值，美元指数回升到了 86。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6.15，即 1 美元可兑换 6.15 元人民币。同时，日元兑美元汇率已跌至 100，欧元兑日元汇率也在不断走低。国际金融形势十分复杂，中方将继续与美方就宏观经济改革保持良好密切合作，并且继续深化改革。

第五，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影子银行的问题。关于影子银行的问题是今年金融稳定理事会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众所周知，影子银行问题对世界各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中国也是如此。坦率地讲，中国影子银行问题主要是银行的表外业务，特别是信托基金的问题，尽管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却持续增长。中国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贯彻巴塞尔协议III方面，中国比很多发达国家行动得都要早，正在加强金融监管，而且希望这能够帮助中国的银行更好地进行海外业务。但是影子银行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六，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国内债务管理问题，特别是政府债务部分。2014 年 8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预算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以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受到严格限制。《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共经历了四次审核，这次我们希望能够解决债务问题，方式就是“打开前门关后门”。此次修正案将促进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地方政府有权举债，这对于中国国内市场投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我们的原则是，在处理道德风险的同时，必须要审慎地处理并避免引发金融体系的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问题。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目前为止，我们较好地实现了平衡，并且使债务问题得到了控制。

责任编辑：沈家文

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编者按：当前，我国逐渐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全球化》编辑部邀请李德水、贺铿、杨朝飞三位专家，分别从美国货币政策及美元走势、经济新常态下应该具备的心态和应该关注的深层次问题，以及我国环保产业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等角度，发表权威观点。

对美国货币政策、美元走势的分析

李德水

一、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回顾

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 QE），是近年来一些经济体在基准利率趋近于零、传统货币政策失灵时使用的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会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市场流动性几近枯竭。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失灵。在此背景下，美联储被迫采取了以量化宽松政策为代表的紧急救市措施。2008 年 11 月 24 日，美联储实施了第一次 QE 政策（QE1）。QE1 累计购买国债和金融机构债券 1.7 万亿美元，同时将基准利率降为 0~0.25%。2010 年 11 月 3 日，美联储提出实施第二次 QE 政策（QE2），表示要在 8 个月内购买 6000 亿美元

美国长期国债。2012年9月，美联储提出第三次QE政策（QE3），计划每月购买850亿美元债券，其中国债450亿美元，2014年2月以来每月减少100亿美元。2014年10月29日（北京时间30日凌晨），美联储宣布量化宽松结束，同时宣布基准利率维持0~0.25%不变。美国6年来3次QE共购进3.5万亿美元资产，对缓解财政危机、金融风险以及稳定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QE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QE执行中对我国的影响

格林斯潘前几年曾说，“QE所投放的美元约2/3流入发展中国家”。我国首当其冲。200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19460亿美元，到2014年三季度末为3.89万亿美元，增加约2万亿美元，6年翻了一番。三季度末比二季度末下降约1000亿美元，三季度美元指数上升7.7%，人行外汇占款达29万亿元人民币。

美元流程图：从美国大量溢出国际市场，推高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我国则努力向美国等国际市场出口，争取外汇支付高价的原油等大宗商品货款，出口顺差加上套利人民币升值而流入的大量热钱，逐步形成巨额外汇储备。央行又用此投向美国国债等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国经济稳定起了很好的作用。2014年9月底，我国广义货币（M2）高达120万亿元，是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1%。此比值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至2013年底，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达31.728万亿人民币，折合5万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同期美联储为4万亿美元（目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达4.5万亿美元），欧洲央行3.12万亿美元，日本央行2.2万亿美元。而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国外资产占全部资产的85%，对外风险敞口相对较高，这是与美欧日的重大不同。由于市场预期QE行将结束，三季度我国外汇储备量有所下降。

（二）QE结束后对我国的影响

对我国有利的方面：一是外汇储备保值压力略有缓解，外汇占款可能减速甚至收缩。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输入型通胀压力减轻。三是生产进口商品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四是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对增加出口有好处。

不利因素：一是由于美元升值，国际资本可能更多从我国流出，甚至有的国内资产也要求换成外汇出去牟利。二是对生产大宗商品的企业，如油田、铁矿山带来困难，铁矿石如果降到90美元/吨，国内铁矿山绝大部分要亏损关门。三是企业到国际市场融资会比较困难，如我国房地产企业今年前8个月在海外市场共发行524亿美元的债券，获得海外金融机构贷款59亿美元，共近590亿美元，以后融资难度和成本都可能上升。

三、加息预期

这次美联储承诺暂不加息，前些时候也曾说过在 2015 年年中之前暂时不会加息。美国不会急于加息的理由：一是不利于美国依赖贸易再平衡式的复苏，即不利于出口。二是美国通胀率仍处于低位。2014 年 8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仅上升 1.7%，环比为 -0.2%。三是货币收紧操之过急会带来金融风险。四是美国经济增长基础不稳。2014 年二季度、三季度分别环比折年率达 4.6% 和 3.5%，但美国政府预计 2014 年也只能增长 2.1%。失业率 5.9%，由就业增加和退出就业申请的人数减少两种因素所致，青年就业问题仍很严重。

总之，QE 结束意味着美联储采取的特别货币政策完结，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对世界经济不会带来太大影响。2014 年 10 月 31 日，日本央行又宣布要出台新的 QE，欧洲央行早就提出要实施 1 万亿欧元的 QE，因德国反对未干成，但仍跃跃欲试。日、欧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美国 QE 结束的影响。美国 QE 影响的高潮早已过去，结束早在预料之中，回归正常是好事。

四、积极应对美国对我实施金融遏制战略

对我国真正的威胁在于美国正在对我国实施金融遏制战略。英国媒体说，中国正试图改变全球战后金融秩序，一是建立人民币区，二是建立多边金融机构与美主导的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抗衡。美元霸主地位是二战后确立的，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一张纸制美元的印制成本大约只有 4 美分，美国因美元霸主地位而获得的铸币税每年有 6000 亿美元左右，比国防开支还大。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依仗的是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不择手段的外交能力。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从美元的霸主地位中受益良多，是绝不允许有人动它的“奶酪”的。

我国通过推动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直接兑换、加快在海外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以及建立三个以我国为主导的金融机构，即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美元的霸主地位。对此，美国决不会善罢甘休。早前美国不惜以发动海湾战争来捍卫美元对国际石油的计价权。可以预期的是，美国将继续从多个层面加大对我国实施遏制战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此同时，为应对美国对我实施的遏制战略也要做好充分准备。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责任编辑：刘英奎

稳增长首先必须稳心态

贺 铿

一、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

第一，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总体是稳定、正常的。从2014年前三个季度的各种统计数据看，1月—7月经济运行正常、平稳；8月工业增加值下行较多，处于异常状态，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降到6.9%，比7月回落2.1个百分点；9月工业增加值增速又恢复到了8%，走向正常。2014年第四季度经济运行比第三季度要好，从第四季度的趋势来看，实现7.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有可能的，全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4%也是极有可能的。尽管8月、9月工业增加值统计数据偏低，但2014年以来有两个数据值得高度关注。一个是就业，前三季度的就业超过1000万，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目标，就业增加并不支持工业运行有问题的观点。另外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工业发电量。一般说来，工业发电量和工业增加值之间密切相关，过去几年，这两者的相关系数一直在0.9以上，呈高度正相关，2014年以来这个相关系数出现下降，降到了0.7以下。分析这种变化，发电量的增长在工业增加值增长之上，也就是向上偏，这可能是因为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存在系统偏差，这个偏差不是指工业增加值高估，而只能是低估。因此，我们整个经济总体状况是比较稳定的。

第二，2012年以来经济下行是必然的，但不会出现太大问题。经济下行主要是过度投资的结果。从1998年开始，我国一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直到现在，由投资导致的资本形成一年比一年高，这种情况导致当前经济下行是必然的。而2014年在结构调整之下，投资率下降到了48%左右。从最终消费率看，按照一般规律，最终消费率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约为65%，1998年之前我国是62.5%，跟世界平均趋势差不多，一直到2010年、2011年降到45.5%，达到历史最低水平，2014年恢复到48.5%左右。从这个角度看，经济下行并不可怕。

第三，应采取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办法消除风险。过去，由投资过度产生的问题如

同是“吃补药”吃过了头。要根治这个问题，不可以再用吃补药的方法，不可以再用加大投资的办法。可是，我们仍把扩大投资的办法用在扩张房地产上，这样做具有较大的危险性。应采取一些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办法消除风险：一是适时终止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一定要量入为出；二是努力稳定人民币汇率，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鼓励依法成立民间金融机构，打破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想尽各种办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让金融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三是继续减税，采取切实措施，落实已经提出的各种减税政策，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只有解决了中小微企业的困难，就业才会真正增加，居民收入也可因此增加；四是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国有垄断行业，让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竞争性行业真正做到平等竞争，为了提高工业运行的效率，我们应该在改革过程当中有勇气推进民进国退。

二、继续促进我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第一，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不是再把房地产弄热。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稳增长而急于救市，这是心态不稳的一个表现。心态不稳，宏观政策就不可能真正稳，稳增长就有可能演变成新的投资扩张，产生的问题将会比原来老的投资扩张更严重。当前房价还没有回到合理位置，房地产业的问题不是房价下跌过快的问题，而是空置房太多，炒房的人处于观望状态，有刚性需求的人仍买不起房。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房地产业发展，要“去库存”，使剩余的房子慢慢让人能够买得起，而不是盲目地再进行开发。盲目救市、盲目开发有可能加快引发金融危机，这是当前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第二，房价是否回到了合理位置，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房价收入比。应该让我国房价收入比落到 4~6 区间，房价总体上应该回落 30% 左右。每个地方房价下跌多少，应根据当地的需求确定，不能一概而论。如果需求很旺，房价不可能跌多少，甚至会出现微涨。现在有许多观点认为，目前房市还是要“去泡沫化”，实际上泡沫也还没有真正解决，应想尽各种办法让房地产业真正去掉泡沫，这样才可以健康发展。

第三，救市是政府心态不稳的一个表现。房市既不能救，政府也救不了。救市的方法有几种。一是降低买房子的贷款利率。这个办法操作空间不大，因为现在银行融资成本不断提高，再降低房贷的贷款利率，商业银行积极性不大。二是财政补贴，或者是降低购房的各种税收。各级地方政府之所以急于救房市，是因为土地财政受到了影响，房地产税收减少，财政吃紧，因此财政拿钱救房市的可能性不大。三是央行提出将房地产资本证券化。这个办法风险很大，应慎重采用。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由次贷问题引起的，即把贷款证券化，再利用杠杆扩大资金量，最终资金链出现问题，相关银行全部亏本。

社会资本考虑到风险因素，当前也不会进入房市。四是放松流动性。央行采取了一个SLF放松流动性的办法，即常备借贷便利，主要功能是满足金融机构较长期的大额流动性需求，是央行的一种流动性供给渠道。但因为混淆了央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这种做法也不合适，危险性也比较大。这几个救市办法效果都不一定很好，当前，如果用这样一些措施把房地产又刺激热起来，后面出现的问题将会比现在更大。

第四，恢复之后，经济还有跨越发展期。近来，有一些人认为，达到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水平，是顺利渡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的成功标志，经济增长速度将自然回落。据此，得出我国经济速度回落是正常现象，是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的结论。实际上，这个认识是值得商榷的。我国人均GDP世界排名为第89位，还处于较低水平。在工业化水平也很低的情况下，我们还有较长的跨越发展期。而且我国农业也很落后，基本处在小农经济状态，需要进一步发展。所以，只要继续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三五年之后，我们还将有经济增速8%~9%的跨越发展期。

三、加快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

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的农地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制约了城镇化发展，因而也制约了经济复苏。因此，必须加快农地制度改革，这样城镇化、经济发展速度、结构调整才能得以加快。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土地的处分权返还给农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农地制度改革，有三个亮点：一是肯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鼓励农民将土地在公开市场上流转，如果农民没有处分权，这个流转就是空话；二是保障农户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地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进行抵押、担保、转让，这也需要把宅基地、房屋的财产处分权交给农民；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如果农民没有真正的处分权，这也是难以实施的。因此，必须把处分权还给农民，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农地制度改革是当前一个极其重要的改革，若不能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都将难以推进。

总之，稳定宏观经济政策，深化改革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应有要义。当前，应该放稳心态，既不能着急，也不必过于悲观，应努力使经济获得有质量、有效率的发展，这样我国经济应该是很有希望的。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责任编辑：李蕊

中国环保产业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杨朝飞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环境保护已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中国环保产业迅速发展的根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国力不断增强，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与此同时，环境、资源、能源问题日益凸显。2013 年中国煤炭消耗量为 36.1 亿吨，占世界煤炭消耗总量的 50%。石油消耗 5.14 亿吨，位居世界第二位。此外，雾霾天气大范围出现，接近 10% 的十大水系国控监测断面的水体为劣五类，59% 的地下水受到污染，19.4% 的耕地污染超标。数据表明，由于发展方式粗放，能源以及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重，突发性污染事故高发，环境风险上升，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未来五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1. 发展环保产业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举措。中国国务院于 2010 年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产业列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加以重点培育和发展。2011 年，中国环境保护相关产业从业单位 23820 个，从业人员 319.5 万人，年营业收入 30752.5 亿元，年营业利润 2777.2 亿元，年出口合同额 333.8 亿美元。近两年来，中国的环保产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2. 严格的环境政策将推动环保产业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政府发布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修订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提高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上述政策措施为环保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其中，《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修订直接催生了火电厂脱硝市场的井喷式增长。近期，国家还将出台《清洁水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4 年 4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的《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新《环境保护法》，无疑将对环境执法监督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持，同时也将大大推动污染治理工作，为发展环保产业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

3. 中国政府加大环保投入，直接带动环保产业发展。“十二五”以来，中国密集出台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和《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覆盖了污水处理、大气治理、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以及环境服务等环保产业的重点领域，涉及数万亿元环境保护投资，为环保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十三五”期间，政府还将继续加大环保投入，继续加大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专家估计，今后几年中国将会出现高达 10 万亿元的巨大环保市场需求。

二、当前中国环保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 在环保产业的各个门类之间发展不够均衡。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噪声污染防治和固体废物处理处置领域整体发展相对较快，但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发展较滞后；市政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领域发展相对成熟，但工业废水处理、农村污染防治、重金属污染防治等领域发展还不充分。特别是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资源循环利用及节能等方面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而且缺乏实践经验；一些关键材料和设备的加工制造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明显，如水处理高端膜材料和膜组件、布袋除尘高端滤料、脱硝催化剂载体（纳米级）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小差距。

2. 在环保核心技术的研发方面，尚未建立政府引导、市场竞争的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机制，以企业为主体、以需求为导向、产学研有机结合的环保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进展迟缓。环保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目前却呈现出技术储备、技术力量不足的窘境。

3. 在环保产业的市场发育和监管方面，存在着市场监管不力，市场秩序无序的现象，加上行业自律能力薄弱，一些地方存在着招投标不规范，甚至存在着商业欺诈、商业贿赂、同行业恶性竞争等不正常现象。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仍然存在，尚未建立起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氛围，影响了全国统一、开放市场的形成。

三、促进中国环保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今后，中国将在加强环保产业健康发展方面重点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完善国家环保产业的发展协调机制，确保国家有关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落到实处；二是完善国家环境标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环境标准对环保产业的引领作用；三是严格市场监管，

破除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四是提升环保装备的技术水平，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五是进一步健全政府采购政策，加大政府购买环境服务和环境产品的力度，积极引领环保产业发展；六是切实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国家环保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畅通民间的政策咨询与政策评估渠道；七是加强在环保产业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引进适合国情的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

日、韩两国是中国的近邻，在环境保护方面拥有许多经验可供中国借鉴，在发展环保产业方面也有许多好的环保技术和环保产品可供中国选择。希望通过进一步增强中日韩三方之间的理解和共识，共同努力推动中国与日韩两国在环保产业方面的贸易合作，为中国、为东亚地区，也为世界的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作者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上接第 18 页)

同富裕目标提供制度保障。第二，组建由国务院有关领导负责的共同富裕领导小组，负责共同富裕总体设计，研究制定共同富裕战略规划和规章制度；组织当前政策与长远目标的协调一致，统筹协调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制定共同富裕的监测和考核体系、督促落实共同富裕目标体系和保障措施。第三，完善财税政策。财政要逐步退出经济建设领域，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导作用。应加大政府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投入，降低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等经济领域的投入。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增加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建设投入，缩小城乡间、地区间由于财政收入差异而造成的公共服务差异。税收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在资源税方面提高税率，资源税收入应向资源原产地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实现欠发达地区资源致富的发展模式；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应增强收入税的累进性，提高高收入者的税负，实现灰色收入透明化、规范化；推进以房产税为主导的财产税征收制度，对大众基本居住性房产免征房产税，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细化住房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适时开征遗产税，通过征收遗产税来调节财富的不平衡，提倡个人奋斗，增强财富积累的社会动力。

责任编辑：沈家文

地缘政治危局笼罩下的世界经济

谷源洋

摘要：2014 年世界经济发展非同步、不稳定；各主要经济体经济波动，美英向上波动，金砖国家向下滑行，经济表现普遍逊于预期；世界经济面临多种新旧风险与挑战，变革、调整和转型成为世界性潮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松紧有别”，总体保持较为宽松的基本面；世界经济相对“平静”，未出现往年那样的“财政悬崖和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危机成为影响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各经济体呈现不同特点的发展态势，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与作用；主流国际金融机构下调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期，但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未变。世界经济处于“周期路口”的拐点，或走向持续的低速增长，或步入周期性景气的起步阶段。

关键词：世界经济 复苏 风险 挑战 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

2014 年初，主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将朝着利好趋势运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4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 3.7%。然而，IMF 2014 年 4 月、7 月和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分别将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值下调 0.1、0.2 和 0.1 个百分点，最终降至 3.3%，主要原因是美国首季度经济为负增长；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持续下行；日本景气欠佳、法国和意大利经济停滞；乌克兰政治危机波及和影响许多国家经济；埃博拉疫情导致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国经济萎缩，使趋于上升的非洲经济蒙受损失，疫情范围继续扩大，受其影响的领域触及到全球航空、旅游、商品贸易以及疫情区的农业生产，等等。

一、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标志

2014 年世界经济增速尽管被下调，但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未变，重要标志如下。

第一，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13 年全球直接投资的流量为 1.45 万亿美元，2014 年达 1.6 万亿美元，2015 年—2016 年分别为 1.75 万亿美元和 1.85 万亿美元。

第二，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对经济稳定、基础好的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有限，中国日趋增长的资本输出将部分抵消美联储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的影响，并通过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具有潜力的服务业，实现了既定 7.5% 左右的增长目标。

第三，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数据显示，代表运输费用的每日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自 7 月以后上涨。BDI 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具有正相关的联系，BDI 指数上扬折射全球贸易的改善，反映了全球经济回归正常复苏。^①

第四，世界贸易组织（WTO）2014 年 9 月 23 日预测 2014 年全球贸易增速为 3.1%，虽低于 1999 年—2008 年约为 GDP 增速两倍的水平，但高于 2013 年的 2.5%。随着新兴经济体产能提升、消费者财富增加及各区域内和区域间贸易整合增强，国际贸易增长率低于全球经济增速并不是不可逆转的长期化趋势。WTO 预测，2015 年国际贸易将增长 4%；汇丰银行发表的“汇丰贸易展望”报告认为，全球贸易正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到 2016 年全球跨界贸易增速将回升至 8%。

第五，美国等原油供给增加以及沙特从过去以确保油价为主要目标的石油政策，转为不限产而关注保住石油市场份额的政策，触发了国际原油市场的卖空潮，油市成为“买方市场”。国际油价偏软将持续一段时间，如果布伦特原油每桶 85 美元持续一年，全球经济将增加 0.25 个百分点。沙特石油政策转向起着“一石两鸟”的作用，既打击美国页岩油开发，也造成俄罗斯石油收入锐减。

第六，各种不同称谓的区域内和区域间经济合作更加活跃，推动了资本、劳动力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抵消了多边贸易谈判失利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和印度已就粮食安全问题达成政治性妥协，为实施 WTO 框架下《贸易便利化协议》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缓解了“多哈回合”谈判僵局。

第七，20 国集团（G20）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到布里斯班峰会都聚焦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就业，通过结构性改革，使 5 年之内世界经济额外增长 2 个百分点；^②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达成的多种成果、丝绸之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给全球经济复

①[英]《卫报》：《运输费用上涨体现全球经济改善》，2014 年 8 月 20 日。

②2014 年 9 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的目标。

苏带来新的预期和动力。

“金砖国家”概念的首创者—吉姆·奥尼尔认为，除非欧洲经济出现新的恶化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发生不可预见的重大灾难，否则，世界经济几乎没有可能会重现上世纪 90 年代的相对低增长，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全球经济增长温和提速，^①提升全球经济的趋势增长水平。

然而，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无处不在，包括世界经济增长不均衡，全球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各经济体内部贫富差距不同程度扩大，^②造成社会秩序不稳甚至社会动荡；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快，各国财政负担不堪重负；全球失业率居高难下，许多国家受到高失业的困扰。^③美联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行长会议认为，欧美“就业市场尚未完全复苏”；发达国家的通胀率均低于各国央行设定的目标，通货紧缩风险上升，^④全球债务有增无减；各经济体受结构性约束，经济复苏力度不强，货币和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危机引发的暴乱或战争，摧残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种族矛盾、冲突引发难民潮，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恶化，等等，这些因素正在并将继续拖累相关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

但重要的是变革、调整和转型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面对众多已知因素风险的冲击，不仅发达国家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经济变革、调整与转型，以摆脱“复合型危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根据内外部经济形势变化，加速推进改革、调整与转型的步伐，促其实体经济从旧增长模式向新增长模式转变，进而带动消费、医疗、教育、养老、信息技术等行业的成长。正如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所说，“世界正处在划时代的变化当中”。^⑤

2014 年世界经济主要特点是，发展非同步、不稳定；各主要经济体经济波动，美英向上波动，金砖国家向下滑行，经济表现普遍逊于预期；世界经济面临多种新旧风险与挑战，变革、调整和转型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有紧有松”，总体保持较为宽松的基本面；世界经济相对“平静”，未出现往年那样的“财政悬崖和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危机成为影响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各经济体呈现不同特点的发展态势，

①吉姆·奥尼尔：《为全球经济增长提速欢呼》，《上海证券报》2014 年 1 月 28 日。

②英国乐施会报告称全球最富的 85 人的资产总额相当于占全球一半人口的最贫困者财富的总和，2014 年 1 月 20 日。

③国际劳工组织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发布的《2014 年度全球就业趋势报告》指出：2013 年全球失业率为 6%，失业人口为 2.02 亿。

④2013 年美国的 CPI 为 1.7%，PPI 仅为 1.2%，是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点。2013 年 12 月，欧元区 CPI 仅为 0.8%。

⑤克劳斯·施瓦布：《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中国证券报》2014 年 1 月 10 日。

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与作用。

二、美国“经济数据”总体向好，联储如期终止购债计划，但尚未步入加息周期

美联储从 2014 年 1 月开始有序削减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规模，到 10 月底已按期停止购债计划，标志着美国经济有所改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已接近“彻底复苏”的门槛，实际 GDP 增速接近或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美联储和 IMF 曾预测 2014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2.8%，美国国会预算局发布的报告甚至认为，2014 年美国 GDP 增长率为 3.1%、2015 年为 3.4%。

然而，2014 年首季度经济增长率却为负 2.1%，创下 5 年来最大的跌幅，主要原因除个人消费支出增长 0.71% 外，其他数据，包括净出口及政府消费与投资等均为负增长。鉴于此，IMF 将 2014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从 2.8% 下调至 1.7%，^① 美联储则把增长预期值降为 2.0%~2.2%。但首季增长收缩后，个人消费支出、出口、商业库存与政府需求上扬以及私营部门新增就业岗位连续多月超过 20 万个，又推动经济反弹。美国商务部等机构的报告把二季度 GDP 增长率调高至 4.6%，三季度 GDP 增长率为 3.9%，超过市场预期。第四季度是美国购物狂欢季，销售额同比增长 4.1%，因此，全年经济增幅有望达到 2.2% 的目标，在周期性复苏中处于引领地位。

然而，美国经济尚未步入强劲增长的“快车道”，因此，美联储主席耶伦多次表示，“在结束购债后将继续维持低利率相当时间”。人们的关注点是耶伦所说的“继续维持低利率相当时间”究竟有多长？对于此问题，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相佐，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经济提速，美联储应在 2014 年底，最晚在 2015 年上半年提升利率；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长期失业的劳动者人数“仍反常地高”、通胀率低于美联储设定的目标区，美联储升息时间点应放在 2015 年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

美联储现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过早或过晚加息都将给美国带来风险。何时升息及加息幅度，如同美联储退出 QE 一样，取决于美国经济数据的变化。从耶伦的多次表态看，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需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经济走向强劲增长；就业市场更加充分；通胀率达到或超过 2% 以及资产泡沫加速发酵。上述四个要素年内基本尚未出现，尤其美联储关注的核心通胀率、通胀率到年底仅分别为 1.5% 和 1.75%，失业率虽已降至 6% 以下，但劳动参与率仅为 62.8%，平均时薪在过去 7 年间只增长了 2%。因此，IMF 总裁

^①IMF 这一下调幅度偏低，没有考虑到美国第二季度和下半年经济提速的因素，2014 年 10 月发布的报告又将 2014 年美国 GDP 增长率调升至 2.0%——笔者。

拉加德提醒美国不可过度紧缩银根，以免影响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事实上，美联储中的“鸽派”亦担心在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仍以宽松货币政策为主基调，对抗“过低的通胀和脆弱的复苏”的形势下，采取过快的货币收缩政策将会抑制经济复苏。因此，美联储丢掉“QE 拐棍”后，并没有马上步入加息周期，即使是在今后适当时间点上调利率，加息节奏也将是有序而缓慢的，联邦基金利率要从 0~0.23% 回归危机前 4%~4.5% 的水平，恐怕是一至两年之内难以做到的事。

美联储从退出 QE 到步入加息周期，势必将通过多种渠道，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美联储改变“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经济基本面改善及消费需求从弱转强，从理论推理看，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对美出口增加。二是美联储收缩流动性及美国实施减税等优惠政策，将会导致部分企业从海外撤资，直接和间接影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市场稳定和资产价格。三是伴随 QE 的结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趋利性资金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市场。国际金融协会 2014 年 6 月 27 日发布的报告将 2014 年流入新兴市场的民间资金从 1.145 万亿美元缩减到 1.112 万亿美元。一旦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与新兴经济体利差逐渐缩小，将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流向美国，推高新兴市场的借贷成本。四是美元指数上升以及加息预期，使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下挫，以出口原材料、能源等大宗商品为支柱的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和主权债务膨胀。为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趋利避害，未雨绸缪，尽早采取措施，严防资本无序流动。

三、欧洲经济动荡、波折，经济形势不及预期， 欧洲央行逐步推出有限度的“欧版 QE”

IMF 预测，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将从上年的零增长和负增长，转为分别实现 2014 年 1.2% 和 1.0% 的增长，但实际经济状况却不如 IMF 的预期，经济困境向北欧国家扩散，呈现“复苏太慢、通胀太低、失业太高”的特点。于是有人认为，欧洲正在走向经济全面停滞与通缩的泥潭，有人认为欧洲经济将再次衰退，有人又言称欧元区解体、欧元崩溃。人们有理由担心欧洲经济放缓，通过贸易和金融等渠道拖累世界经济复苏，但欧洲经济陷入新衰退的概率不大。前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认为，欧元区已不再处于全球危机的“震中”，最为突出的变化是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重债国纷纷拒绝来自外部的援助计划，重返国际金融市场，自主发债融资。

较为客观地看待欧洲经济：一是英国经济形势不错，英国央行将 2014 年 GDP 增速预期从 3.4% 上调至 3.5%，成为欧洲经济的“亮点”；二是欧洲央行对 130 家大银行进行

压力测试，要求核心资本充足率至少要达到 8%，法、德及西班牙等主要银行都顺利通过测试。在未通过测试的 25 家银行中，有 12 家银行已经弥补了资本缺口，欧洲央行接过了对欧元区银行的统一监管权，向建立欧洲银行联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三是欧洲央行继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落实已出台的购债方案刺激经济复苏；四是欧洲国家长期形成的创新传统没有受到削弱，德国“制造”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仍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五是作为欧洲经济稳定器的德国，因地缘政治及工业产值减少等因素导致二季度经济收缩，使欧元区经济更显疲软、脆弱。但欧元区经济形势尚在变化之中，欧盟统计局 2014 年 11 月 14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德国 GDP 初值环比增长 0.1%，同比增长 1.2%，两个数据均好于二季度，预计全年将增长 1.3%。第三季度法国 GDP 初值环比增长 0.3%，同比增长 0.4%，创一年来新高。受益于德法及西班牙、波兰等国经济回暖，第三季度欧元区和欧盟 GDP 初值分别环比增长 0.2% 和 0.3%，同比增长 0.8% 和 1.3%。然而，在消费需求乏力、复苏力度脆弱、企业投资低迷、失业率居高难下、通货膨胀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风险加剧以及对俄制裁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欧洲经济尚处在“摆脱衰退尾部阶段”。欧委会发表的秋季经济报告，将欧元区 2014 年 GDP 增速预期下调至 0.8%，虽不及预期的 1%，但强于上年的负 0.4%。欧洲经济生命力的回归及出现实质性增长尚需要较长的时间。

经济表现差异化决定其货币政策取向，由于欧盟、欧元区宏观经济形势逊于美国经济基本面，因而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同美联储“分道扬镳”。IMF 总裁拉加德强调，欧洲通胀率长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需要采取措施予以提升。2014 年 6 月，欧洲央行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和再次推出约 4000 亿欧元长期再融资（TLTRO），但欧洲经济依然低迷，通缩风险继续加大，迫使欧洲央行于 9 月 4 日再次降息，把隔夜存款利率降至负 0.2%，让再融资利率保持在更低的水平上，以对抗通缩上升压力。然而，消费与投资不振，失业率高达 11.5% 左右，难以驱动通胀率上升和抑制通缩。欧委会发表的秋季经济报告，把欧元区 2014 年通胀率预期由 0.8% 下调至 0.5%，距离 2% 的目标区相差甚远，因而各方要求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启动“欧版 QE”的呼声越来越高。

然而，德拉吉对实施 QE 政策持谨慎态度，主要原因：一是学术界和理论界对何谓通缩存有争议。一般认为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同比数据连续 3 个月为负增长才算称得上通货紧缩。欧洲 CPI 虽然下滑，但尚未陷入通缩的泥沼，只是加大了通缩压力与风险；二是欧洲流动性较为充沛，各银行拥有大量资金，但资金未流入有需要的企业和实体经济。欧洲央行通过 TLTRO 释放出的资金部分回流银行，部分被银行用于套利交易购买国债；三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坚持，欧元区实施 QE 并非“对症下药”，而是饮鸩止渴，将造成更多的资产泡沫甚至信心泡沫。但在长期低通胀率、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率的三重压力

下，原则的坚持敌挡不住来自多方面的政治压力。由于其利率难以再降以及资产负债表规模持续萎缩，欧洲央行从第四季度起启动购买担保债券及资产支持证券（ABS），并准备把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从约 2 万亿欧元增至 3 万亿欧元，欧委会于 11 月 26 日提出具有争议的 3150 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上述系列举措旨在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提振欧元区通胀水平，促其股市反弹及汇率下跌，带动对外出口增加，刺激经济复苏与创造就业岗位。

但是，在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约束下，欧洲央行并没有条件实施像美联储和日本央行那样的量化宽松政策，即使是推出有限度的“欧版 QE”措施，其作用也不会太明显，反而有可能抬高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债券收益率。欧盟和欧元区眼下最大的难题依然是需要排解多重深层次结构性问题，2014 年欧洲改革重心已从政府财政支出“节流”转向政府税收“开源”，着力改善企业生存发展环境问题。但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条顿集团”与以法国和南欧国家组成的“拉丁集团”之间关于紧缩还是增长的矛盾仍难以消除，在“反德”和“反欧一体化”的声音日趋增大以及欧盟加大对俄制裁力度的形势下，真正的结构性改革恐难以推行。欧盟“三大巨头”业已选定，摆在新权力中心的挑战是欧洲经济停滞；欧美、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以及欧盟与英国的关系，这三大问题的解决将任重而道远。

四、日本难以跨越“结构性门槛”，走向技术性衰退， 安倍经济学面临预知性考验

2013 财年日本实际 GDP 增长率为 2.3%，但经济增速逐季下滑。2013 年 4 个季度的年化增长率分别为 4.1%、3.8%、1.9%、1.0%。随着时间推移，安倍经济学的“潜在反效果”逐渐显现。其一，安倍经济学的“大胆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策”推动股市大幅上涨，但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约 54%为银行存款和现金，股市上扬的受益者只是持有股票的投资者，而广大消费者的困窘状况并未得到多大改善。其二，日元贬值幅度接近 1 美元兑 120 日元，创下近 7 年来的最高值，使其进口原油及液化天然气、零部件或最终产品价格猛涨，抬高了企业生产成本，抵消了日元贬值的政策作用。其三，安倍政府无节制地扩大公共支出，没有增加多少财政税收，反而导致公共债务规模不断膨胀，成为经济复苏中的重大隐患。其四，在日本央行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政策下，从 2014 年 4 月起，把消费税率从 5%提高到 8%，试图通过新税收，减轻财政压力。维持“超低利率”和提高消费税率的叠加作用，迫使消费者只好削减其他方面的需求来平衡家庭总支出，使日本政府刺激内需、推高通胀的努力受到抑制。其五，物价增速超过工资增速，造成百姓生活成本攀升、居民“消费冲动”缺乏后劲、企业生产和意愿低落、企业没有

扩大设备投资动力，有能力的企业选择在海外发展，从而使国内投资更显不足。安倍反复呼吁企业主增加员工工资收入，但日本约有 2/3 的企业员工在中小企业工作，日元走软的受益者是大型综合商社，真正受惠于出口的中小企业不多，难以给员工提高工薪。

面对上述众多难题，日本政府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旨在实现“继续全力以赴地重振日本经济”的目标，包括从 2014 年 10 月起，提升最低工资水平，并准备在 2015 年度预算中增加 1 万亿日元的预备费用，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及补贴中小企业；把资产购买规模从 70 万亿日元增至 80 万亿日元；对企业投资实施减税、鼓励企业扩大投资领域、促进居民就业和向低收入者发放补贴金，以缓解消费税上调后经济面临的冲击，支撑经济景气。然而，不管是推出的“新招数”抑或通过所谓的三支箭激活经济景气、摆脱通货紧缩和经济疲软，其成效均显不佳。从实践结果考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升了通胀率，减缓了通缩压力，但通胀率尚未达到 2% 的目标。日本央行预计，2014 财年通胀率为 1.3%，2015 财年升至 1.9%。安倍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摆脱“失去 20 年”的困境，但种种结构性缺陷以及提高消费税率已使日本“经济脱轨或继续减速”。据日本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第二季度年化经济增长率从一季度的 6.1% 下降至负 7.3%，第三季度又萎缩了 1.6%。两个季度的连续负增长，表明日本经济已从“局部疲软”走向“整体疲软”，陷入经济学定义的技术性衰退。IMF 认为，“日本经济复苏正在失去动力，安倍经济学再造繁荣的政策效力已经大大退化”，并把 2014 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降至 0.9%，而日本多家民间智库平均预测值仅为 0.6%，两者预测值均远低于日本政府预期增长 1.2% 的目标。

安倍面对上述严峻经济形势，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宣布推迟上调消费税率、提前进行大选和继续实施刺激经济措施。日本经济虽然远逊于预期，但日元贬值及外部经济复苏，利于推动日本出口回升，近期日本就业市场和工资水平略有改善；推迟上调消费税率将使其负面影响逐渐减缓，通胀率将逐步加速上升，因此，日本经济尚未脱离温和复苏的轨迹。然而，不管日本政府采取何种经济刺激措施，未来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五、新兴经济体经济仍在下行，但略显企稳， 崛起依旧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2014 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仍在放缓，主要原因：一是有些发展中经济体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二是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不足，导致进口锐减；三是大宗商品价格走低，造成发展中经济体资源出口国财政收入减少；四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影响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市场稳定和资产价格；五是发展中经济体调整结构进展迟缓。由于上述内外部因素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减速已成为事实。

摩根士丹利银行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脆弱五国”（巴西、印度、南非、土耳其和印尼）的概念，以印证“金砖国家宣告终结”；IMF 则带头宣扬，“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来自发达市场，而非新兴市场”。

然而，占全球经济总量约 50% 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依然存在众多积极因素和变化。

首先，新兴经济体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后发优势和现实优势，包括家庭收入增加、失业率低于发达国家、消费需求欲望及增长潜力趋强；外汇储备膨胀，外债总体水平可控；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领域投资潜力大，“吸金魅力”与创新能力趋强；存在推行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余地。

其次，IMF 预测，2014 年发展中国家增长率为 4.4%，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为 6.5%，与上年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 1.8%；美联储退出 QE 及美元指数走强，并未引起多数新兴经济体汇市大波动，资金既有流出也有流入；亚洲新兴经济体扩张功能有所恢复，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增强，国际资本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重燃投资希望。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4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流入发达经济体的 FDI 低于全球 FDI 规模的 40%，而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 FDI 却保持较高的水平。素有“新兴市场教父”之称的麦朴思称，近几年来全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对新兴市场的信心从未丧失，包括中国和新兴市场的总体表现是“UP”（向上）。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11 年开始，未来 10 年新兴经济体年均增长率为 6.3%，而发达经济体仅为 2%。

其三，IMF 按美元汇率推算，2014 年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4%，发展中国家为 46%，相比 2008 年 53% 的贡献率下降了 7 个百分点。但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贡献率则高达 65%，而发达国家则仅为 35%。美国《彭博市场杂志》载文称，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 2000 年的 31% 降至 2013 年的 22%，而中国在同期内则增加了两倍，上升至 12%。^①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认为，在过去 5 年间世界经济一直依靠新兴经济体一个引擎拉动，现在发达经济体将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另一引擎。IMF 总裁拉加德的态度亦发生变化，认为新兴经济体增速虽比以前放缓，但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事实表明，“两个引擎”的观点较为容观。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由单引擎牵引转向双引擎驱动，并非是一件坏事。

其四，南北经济衰退和不景气互为影响，对双方乃至对全球经济都会产生负面作用。

^①[美]《彭博市场杂志》：《美国作为最后的消费者角色正在消失》一文引用的 IMF 的数据，2013 年 12 月 1 日。

IMF 发布的《2014 年溢出效应报告》估算，如果新兴市场国家增长放缓 1 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的增长便会随之降低 0.25 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只有采取措施，加强互动共生，才能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复苏。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幅趋窄是由周期性、结构性、脆弱性及外部性因素所致，在未来较长时期难以重现 2003 年—2008 年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持续性大幅倒退的概率不大，而是在下行中趋稳，崛起依旧是难以逆转的趋势。

六、地缘政治危机重重，给众多国家经济及国际关系造成冲击

2014 年，世界经济没有步入周期性景气的起步阶段，主要原因在于地缘政治危机造成的破坏力严重，包括中东进入极端动荡期；巴以大规模军事冲突；伊拉克极端武装组织进行反扑及美军等予以空袭等等。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则是由乌克兰问题引起的美欧对俄的制裁以及俄罗斯采取的反制措施，使众多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遭遇“逆风”。

在马航 MH17 班机坠落后，美欧与俄罗斯关系进一步恶化，美欧在 2014 年 7 月底追加对俄罗斯新一波的严厉制裁，打击目标涉及金融、能源、军售、敏感技术出口等领域。俄罗斯则“以硬对硬”，于 8 月 6 日对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挪威等国发出为期一年的肉类、鱼类、蔬菜、水果、牛奶和奶制品等进口禁令，导致荷兰、波兰等多国对俄农产品出口锐减。普京表示，俄准备对美欧飞机、造船和汽车等行业对俄出口采取保护性措施。

制裁与反制裁不断加码与升级，已经给相关各方经济以及国际关系造成冲击。从贸易规模看，2013 年，俄美贸易额仅为 300 亿美元，而俄与欧盟贸易额高达 4500 多亿美元，其中欧盟对俄农产品出口总值为 160 亿欧元，占农产品出口总值的 10%，而同年美国对全球农产品出口为 1441 亿美元，对俄农产品出口仅为 13 亿美元。因此，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战”和“贸易战”产生着不均衡作用，对美影响有限，而对欧伤害甚大。据德国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由于对俄罗斯出口汽车及零部件锐减，2014 年上半年德对俄出口额降至 153 亿欧元，其降幅达 18.7%，加上工业生产下挫等因素影响，德国政府已将 2014 年增长预期从 1.8% 下调至 1.2%~1.3%。尤其夹在美欧与俄罗斯中间的乌克兰，尽管得到 IMF 和德国贷款援助，但失去优惠的天然气价格及对俄出口大幅减少，2014 年 GDP 增长率下滑至 6% 以上，惠誉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已将乌克兰主权信用等级下调至 CCC 级。2014 年 7 月 29 日，《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撰文称，经济制裁使俄欧在年内各损失 900 亿~1000 亿欧元，这一数据远超过欧盟预计的 400 亿~500 亿欧元。制裁与反制裁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扩大。

然而，在实际利益差异面前，欧盟 28 个国家对俄采取集体制裁行动，是不太容易做

到的事。越来越多的欧盟成员国和非欧盟成员国已公开表示，欧俄经贸联系远高于美俄，制裁的逐步升级将损害欧盟经济，令尚未痊愈的欧盟经济“雪上加霜”。芬兰总统斯塔布更为直接了当地指出，“制裁战的升级将造成芬兰数10亿欧元损失。如果欧盟成员国不能平均承担对俄制裁所带来的损失，那么我们会向我们的欧盟伙伴寻求帮助”。所谓“寻求帮助”，实为要求“赔偿”。为此，欧盟委员会一方面表示，“将欲劝说”第三国不要乘机抢占俄罗斯食品市场，以免削弱对俄制裁效果，另一方面则承诺拨出1.25亿欧元补偿受损国家的农民。

2014年俄罗斯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乌克兰政治危机以及制裁、反制裁从多方面伤害俄经济。

首先，俄约有40%的农产品依赖于进口，禁止从欧美等国进口农产品和食品，如果不能及时找到替代货源，那么将导致食品价格飙升，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通胀率将升至两位数，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并造成卢布兑美元和欧元大幅贬值。为此，俄央行于2014年10月底把基准利率由8%上调为9.5%，以抑制日趋增长的通胀，但提高利率却加重了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了生产经营困难，为其经济增长带来阻力。因此，2014年俄政府将工作重点定为“保持货币稳定和抑制通胀”。

其次，欧美对俄能源制裁集中于四个目标：一是对俄实行“技术封销”，禁止向俄石油工业提供勘探设备和技术，试图抑制俄寻找开采难度大的石油资源；二是阻止西方大型能源集团在俄石油开采领域进行巨额投资；三是冻结俄石油企业在欧美银行资产；四是降低欧盟对俄油气依赖程度。但俄在应对欧美能源制裁方面仍占有优势，欧盟所需天然气有25%以上及超过30%的原油由俄罗斯供给，美国承诺的“能源支援”远远满足不了欧盟和乌克兰的能源需求，欧盟及乌克兰要彻底摆脱对俄油气依赖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俄油气出口并不缺少买方，欧美尚不敢冒然对购买俄油气一方实施金融制裁；美欧在俄能源设备和技术进口份额中仅占1/4，再加上欧盟同意已经与俄签订合同的欧洲企业将继续履行出口合同。因此，俄罗斯的石油勘探和开发能力，至少在10年内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再次，美欧对俄实施金融制裁，却带来了可见的效果。欧盟是俄利用国外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近几年排在对俄投资前10位的国家中，欧盟占了7~8名，其年投资总额占俄年吸引外资总额的约70%。^① 欧盟裁决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俄罗斯发展及对外经济事务银行、俄罗斯农业银行不得在欧盟资本市场发行期限超过90天的债券、股票和其他金融产品。美国对俄罗斯金融机构的限

^①王兵银：《经济短板阻碍俄罗斯大国梦》，《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月刊》，2014年9月10日。

制，不仅包括上述 5 家大银行，并把莫斯科银行包括在内，从而使俄每年出现巨大外来融资缺口。

金融制裁给俄造成的伤害具体表现为：一是导致资金流入减少及资金外流增加。2014 年前三季度俄资金净流出规模达到 852 亿美元左右，全年将超出千亿美元，远高于 2013 年的 630 亿美元。美欧限制俄主要银行经营活动及冻结俄在欧美资产，使其俄国内投资更显不足；二是在西方国家持续制裁下，资金外流直接影响卢布稳定，尽管俄央行投入 710 亿美元外汇储备予以干预，但未能阻挡卢布急剧贬值的势头；三是金融制裁的叠加作用，给正在下行的俄经济造成更加严重的冲击。俄在 2010 年—2013 年的 GDP 增长率分别为 4.3%、4.3%、3.4% 和 1.3%。俄经济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 GDP 增长率仅为 0.5%，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从而使普京提出的跻身世界经济“五强之梦”难以如期实现。

俄财政收入的 50% 以上依靠油气出口，油气出口虽暂无大碍，但国际油价如果持续下跌，势将影响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据俄联邦储备银行计算，如果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 90 美元，2015 年俄财政收入将减少 1.2%，假若跌破每桶 80 美元，俄可能不得不削减开支。这是美欧乐见的结果。国际油价持续性下跌对俄的伤害比美欧对俄制裁更大，好在俄央行现仍握有约 44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 450 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尚能够应对石油财政收入减少和短期货币波动，并有能力向受到制裁影响的国有及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因此，俄企业虽然考虑转道香港等亚洲金融市场筹资，但不少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由于拥有较多的现金流，并没有出现争抢“高价贷款”的现象。俄《政治杂志》主编阿科波夫撰文称，西方强化制裁不会搞跨俄罗斯经济。^①但俄经济总量仅为 2.12 万亿美元，远小于美国和欧盟的经济规模，俄企业外债总额为 4220 亿美元，其中约有 300 亿美元的企业外债年底前需要还本付息，如制裁长期拖延下去，总体对俄不利。

不管怎么说，美欧和俄罗斯相互“制裁”与“反制裁”将造成两败俱伤的结局，并影响其他国家同欧美、俄罗斯及乌克兰关系，抑制世界经济复苏。正如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宾塞所说，“政治不安全、潜在冲突和国际关系的扭曲正在日益对经济进展产生威胁，其程度比金融危机后的争论所预见的更大”。令人忧虑的是在 2014 年 9 月 5 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与乌东部反对派达成停火协议之后，欧盟又对俄发起新一波的制裁，包括对俄国防部长在内的众多人士实施旅行禁令以及加大对俄金融业、石油业和国防工业打击力度，而俄则重申正在考虑禁止西方国家航空公司的航班经越俄领空飞往返于亚太地区。

然而，尽管“经济战”不断升级发酵，但各方都在寻找利益的平衡点，宣称不想“兵戎相见”，强调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乌克兰政治危机。俄工业贸易部长已表示，俄罗斯

^①《西线转变》，俄罗斯《观点报》网站，2014 年 7 月 28 日。

不打算对西方制裁引入新的回应措施；欧盟驻俄大使则声称，如果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稳定下来，欧盟将考虑取消对俄制裁。欧美与俄比拼的是耐心与决心，因此，短期内美欧与俄关系不可能全面修复，但也不会因乌克兰“政治纠结”而彻底破裂而走向不可挽回的“死胡同”。

七、“非美元化”趋势明显增强，推动国际金融秩序重塑

2014 年“非美元”和“去美元”趋势明显增强，成为当前和今后值得关注的事件。70 年前，12 个主要国家的代表在布雷顿森林酒店订立了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的章程，奠定了二战后世界经济金融秩序，为全球金融稳定和欧洲战后经济重建作出了贡献。然而，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的大趋势下，美欧则一直垄断着世界银行行长和 IMF 总裁的位置；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享有“过度特权”，美国国会对 IMF 提出的 2010 年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拖延至今不予通过；IMF 与世界银行虽选择新兴经济体人士担任了两机构的高级主管，但改革仍滞后于时代变化；美元作为国际贸易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但美元没能解决“特里芬难题”以确保全球金融稳定。因此，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更加呼吁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经济秩序，反映了美元信用与信心的弱化。

“非美元化”或“去美元化”趋势明显增强的具体表现：

一是 2013 年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尼时提出了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在北京 APEC 会议期间又提出设立丝绸基金。“银行 + 基金”旨在弥补周边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的巨大资本缺口，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与服务，提升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二是 2014 年 7 月在巴西福塔莱萨召开的第六次金砖五国领导人峰会，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和建立应急外汇储备基金（CRA），其银行和基金规模将逐渐扩充，最终将形成福塔莱萨货币体系。

三是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互间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用本币而不是美元进行贸易交易。普京在访问克里米亚时表示，俄应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以卢布来出售自己的油气，使用美元作为能源贸易中单一的定价货币正在伤害俄罗斯经济。俄副总理舒瓦洛夫认为，“俄购买中国商品和中国购买俄商品时，使用第三国货币将是愚蠢的”。截至 2014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已同俄罗斯等 25 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结算货币。

四是美国司法部以法国巴黎银行违反美国法律，帮助遭美国制裁的苏丹、伊朗和古巴转移资金，为此罚款 89.7 亿美元。这一举动引发欧盟各大银行强烈不满，法国财长宣

称欧盟将在国际市场上大量使用欧元结算。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分别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 2000 亿人民币和 3500 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签署的 5 个人民币清算安排合作备忘录中就有 4 个合作国家来自欧洲，人民币已正式开启对欧元的直接交易，并在伦敦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

“非美元化”并非是一种新的概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既存在“美元化”趋势，也存在“非美元化”趋势。上世纪末期，许多国家处于美元化和非美元的纠结之中，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关国家表示要弱化美元而增加欧元和日元的份量。相反，巴拿马、萨尔瓦多、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却先后实行“美元化”。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过度依赖美元的负面影响日渐增多，一些拉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减少美元在外贸和融资领域的比重，加强本国货币的地位和作用^①，从而使“非美元化”或“去美元化”渐成一股难以阻挡的潮流和趋势。

但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必须看到以下现实：其一，美元在国际货币储备中所占比重超出 60%，欧元、日元、澳元占比过低，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仅为 0.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②其二，在国际贸易交往中，特别是购买原油仍主要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其三，美元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资产；其四，IMF 坚持“蜗牛式”改革，引起新兴市场国家的强烈不满，但即便是 IMF 改革从“A 计划”转向“B 计划”，对新兴市场国家再增加一些份额与投票权，也抵挡不过美国大股东的一票否决权；其五，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建立的金融机构尚存在不足，难以同由欧美控制的 IMF 和世界银行相抗争；其六，美国拥有最强的综合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仍难以被其他国家超越，同时也没有哪一种主权货币能够替代美元，美元作为全球大宗商品定价货币的根基尚未动摇。鉴于上述多种原因，尽管“非美元化”或“去美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但也仅仅是一种起步的尝试而已。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必须理性认识和正确对待“非美元化”与“去美元化”趋势，切不可对“非美元化”和“去美元化”给予过高、过激的非理性渲染。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周期路口”的拐点，或走向持续的低速增长，或步入周期性景气的起步。但权衡世界经济的喜与忧，出现 IMF 总裁拉加德所说的“新平庸时代”的可能性不大，野村证券和瑞银集团等多家机构发布的年度展望报告均认为，2015 年全球经济将持续扩张。

责任编辑：刘英奎

^①杨涛：《理性认识“去美元化”》，《21 世纪经济报道》2014 年 7 月 23 日。

^②郑新立：《建立多元化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全球化》2014 年第 8 期。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地缘政治经济分析

盛思鑫 曹文炼

摘要：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新时期国际战略的重要部署。目前，各主要国家对这一倡议持不同态度，在东南亚、南亚和大中亚地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面临着不同的市场结构与竞合形势。综合考虑资本金规模、目标市场结构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未来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集团间的竞争大于合作，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会有较大空间，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竞争合作的机会并存。为加快筹建和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扩大该行的战略效应，中国应合理确定区域布局、科学设计商业战略、打好政策组合拳。

关键词：亚投行 亚行 世行 基础设施投资 地缘政治经济

作者简介：盛思鑫，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战略研究处副处长；

曹文炼，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目标市场结构

从地理区域来划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未来的目标市场主要包括：东南亚、南亚和大中亚地区^①。根据普华永道、牛津经济（Oxford Economics）

^①大中亚地区主要包括俄罗斯在亚洲地区的版图、中亚五国、蒙古和南高加索地区等。

和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的数据合并计算，东南亚、南亚和大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规模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大部分投资集中在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领域。按照 Oxford Economics 的统计和预测^①，2013 年东南亚、南亚和大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约为 4500 亿美元，今后十年能够保持大约 7% 的增长率，到 2025 年这三个地区总计基础设施投资花费年均将超过一万亿美元。根据亚行的预测^②来计算，2010 年—2020 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中，东南亚约为 1.2 万亿美元，南亚为 2.6 万亿美元，大中亚地区为 2.1 万亿美元。这些数字尚不包括许多跨境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一）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融资大部分来源于本国政府投资，由于目前东盟国家政府的负债率普遍相对较低，未来各国政府的投资依然将是最主要的基础设施资金来源。根据高盛的估计^③，2013 年—2020 年，菲律宾、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四国的政府资金占本国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分别约为 90%、80%、65% 和 50%。从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来看，美日主导的世界银行集团（以下简称世行）和亚行在该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投资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从贷款规模来看，世行在东南亚地区的资助重点首先是菲律宾和越南，截至 2014 年 9 月，两国在世行的未结清贷款均超过 120 亿美元；其次为泰国 83 亿美元和印尼 68 亿美元；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老挝都在 10 亿美元左右。^④ 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投向基础设施项目。印尼是当前亚行在东南亚的工作重点，2013 年印尼在亚行的未结清贷款为 82 亿美元左右，居于东盟国家首位。^⑤ 随着东盟互联互通规划的制定，亚行在 2012 年作为主要出资方启动东盟基础设施基金（AIF），预计初期每年能提供 3 亿美元贷款，2020 年之前能够发放约 40 亿美元贷款，并希望以此撬动超过 130 亿美元的融资；亚行还和新加坡合作，鼓励私人资本通过公共私营合作制（PPP）模式参与东盟区域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⑥ 有数据显示，不少东盟国家倾向于越来越多地采用 PPP 模式，以吸引私人资本参与本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例如，印尼政府计划于 2010 年—2014 年执行超过

①资料来源：<http://www.pwc.com/gx/en/capital-projects-infrastructure/publications/cpi-outlook/about.jhtml>。

②资料来源：<http://www.adbi.org/working-paper/2010/09/09/4062.infrastructure.demand.asia.pacific/>。

③资料来源：高盛分析报告，http://pg.rj.com.cn/acc/Res/CN_RES/MAC/2013/5/30/410d8954-8a1f-4483-828a-2816ea6e84d0.pdf。

④资料来源：世行官方网站。

⑤资料来源：亚行 2013 年年度报告，<http://www.adb.org/documents/adb-annual-report-2013>。

⑥资料来源：亚行 2012 年年度报告，<http://www.adb.org/documents/adb-annual-report-2012>。

100 个 PPP 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总额为 470 亿美元。^①

根据毕马威 2014 年的测算^②，2013 年—2020 年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大约为 1.2 万亿美元，主要包括缅甸 3200 亿美元、印度尼西亚 2350 亿美元、越南 1700 亿美元、新加坡 1300 亿美元、菲律宾 1100 亿美元、泰国 1050 亿美元、马来西亚 1000 亿美元。普华永道 2014 年的估计^③则认为，印尼是东盟国家中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潜在市场，在 2025 年之前基础设施投资有望达到年均 1650 亿美元，其次为泰国 585 亿美元、越南 560 亿美元、马来西亚 450 亿美元、菲律宾 270 亿美元、新加坡 180 亿美元。近年来，印尼通过采用负面清单管理等体制机制改革，使其外国直接投资在东盟国家中增长最快。

根据表 1 数据来源的估计，2010 年—2020 年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有超过 60% 的份额集中在能源和交通领域。高盛预测^④，2013 年—2020 年泰国、马来西亚、印

表 1 2010 年—2020 年东南亚国家非跨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国家	投资需求(百万美元)	占未来 GDP 比重(%)
印度尼西亚	450304	6.18
马来西亚	188084	6.68
泰国	172907	4.91
新加坡	150000	3.00
菲律宾	127122	6.04
越南	109761	8.12
缅甸	21698	6.04
柬埔寨	13364	8.71
老挝	11375	13.61
总计	1244615	

数据来源：新加坡数据系本文作者测算，其余数据来源于 Bhattacharyay, B., 2010, “Estimating Demand for Infrastructure in Energy, Transport, Telecommunications, Water and Sanit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0–2020”, ADBI Working Paper 248, 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Available: <http://www.adbi.org/working-paper/2010/09/09/4062.infrastructure.demand.asia.pacific/>.

①资料来源：OECD 报告，<http://www.oecd.org/gov/regulatory-policy/47377678.pdf>。
②资料来源：<http://www.kpmg.com/SG/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Documents/Advisory-INFRA-ASEAN-An-overview-of-infrastructure-opportunities-in-ASEAN.pdf>。
③资料来源：<http://www.pwc.com/sg/en/capital-projects-infrastructure/assets/cpi-sea-infrastructure-spend-summary-201405.pdf>。
④资料来源：高盛分析报告，http://pg.rj.com.cn/acc/Res/CN_RES/MAC/2013/5/30/410d8954-8a1f-4483-828a-2816ea6e84d0.pdf。

尼、菲律宾四国，在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约为 5240 亿美元。比较重大的跨境交通和能源项目有东盟高速公路网络、昆明—新加坡高铁线路和东盟电网等。麦肯锡认为^①，对外国投资者而言，印尼、泰国、越南和菲律宾等资本市场相对不太发达的东盟国家，会有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但是，泰国和菲律宾由于外资所有权的限制、国内政局不稳、缺乏稳定成熟的市场架构和法律管制等因素，会对吸引外国参与基础设施投资造成较大障碍。

（二）南亚地区

南亚地区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市场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主要的投资需求集中在交通、电力和与水有关的领域。根据世行 2013 年的测算^②，2011 年—2020 年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在 2 万亿美元左右（按 2010 年的美元价格计算），其中印度为 1.7 万亿美元、巴基斯坦为 1650 亿美元、孟加拉国为 1000 亿美元。从基础设施的领域来看，交通大概需要 6850 亿美元、电力设施为 6000 亿美元、饮用水和水利灌溉为 4400 亿美元、电讯基础设施约为 2500 亿美元。

世行和亚行都非常重视在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之下，世行比亚行在该地区投入了更多资金，但远远无法填补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世行采取的主要支持形式是提供免息或低息的长期贷款以及技术支持。目前，印度是累计从世行获得贷

表 2 2010 年—2020 年南亚国家非跨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国家	投资需求（百万美元）	占未来 GDP 比重（%）
印度	2172469	11.12
巴基斯坦	178558	8.27
孟加拉国	144903	11.56
斯里兰卡	37908	6.85
阿富汗	26142	11.92
尼泊尔	14330	8.48
不丹	886	4.07
总计	2575196	

数据来源：同表 1。

① 资料来源：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financial_services/asias_1_trillion_infrastructure_opportunity。

② 资料来源：http://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orldbank/document/SAR/Reducing%20Poverty%20by%20Closing%20South%20Asia's%20Infrastructure%20Gap_Web.pdf。

款最多的国家。2008 年—2013 年，世行总计向印度提供超过 250 亿美元的贷款，大部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与教育相关的项目。2014 年前三季度，世行批准了印度 17 个项目总计超过 51 亿美元的贷款，同时还将印度单一借款人的借款额上限提高至 205 亿美元。^①而亚行 1986 年—2013 年总计才向印度借贷 273 亿美元，其中交通和通讯领域为 90 亿美元左右，能源领域为 85 亿美元左右。^②从中长期来看，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减少，其从世行能够获得的优惠贷款将会越来越少。但近年来有迹象表明，亚行希望未来能够提高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基础设施领域的影响力，2013 年亚行对巴基斯坦的贷款增加至 47 亿美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此举也使得巴基斯坦成为目前排在中国、印度、印尼之后的亚行第四大债务国。2014 年 8 月，亚行宣布在未来三年将向印度提供 70 亿~9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贷款，并有 4 亿美元的专项贷款用于促进私营部门对印度基础设施的投资。2014 年，亚行还推动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跨境天然气管道项目各方签订运营协议，并负责为该项目筹集 76 亿美元的建设资金。

尽管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常年来主要依靠政府资金，但近年来私营部门的投资也日渐成为该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的重要来源，其中尤以印度较为突出。根据世行的统计^③，1990 年—2012 年私营部门对印度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总计超过 3000 亿美元，占同期印度在该领域总投资的 50% 左右，占整个南亚地区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 85%。印度官方称^④，该国 2014 年—2018 年基础设施资金缺口约为 1 万亿美元左右，并希望通过私营部门投资来弥补这个缺口。从领域上来说，南亚地区的私营部门投资比较偏好能源和电讯基础设施领域。在电讯基础设施领域，私营部门通常 100% 控股；在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私营部门则会少量采用 PPP 模式与政府部门合作投资；而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私营部门则普遍采用 PPP 模式。

（三）大中亚地区

根据欧洲投资银行的分析^⑤，大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融资来源中，国际开发性金融机

①数据来源：根据世行官方网站公布数据统计和计算得来。

②数据来源：本段有关亚行的数据均根据亚行官方网站公布数据统计和计算得来。

③资料来源：http://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orldbank/document/SAR/Reducing%20Poverty%20by%20Closing%20South%20Asia's%20Infrastructure%20Gap_Web.pdf。

④资料来源：<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ternational-business/India-has-1-trillion-infrastructure-deficit-Chidambaram-tells-World-Bank/articleshow/19660814.cms>。

⑤数据来源：本节数据都来源于欧洲投资银行报告或基于该报告所做的计算，<http://www.eib.org/infocentre/publications/all/economics-working-paper-2013-01.htm>。

构占 21%，政府资金支持仅为 5%，股权投资者占 36%，国外的商业银行占 32%（其中俄罗斯的商业银行占 8%），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占 6%。总体而言，大中亚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资金的杠杆率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平均资产负债率大概为 60%，个别项目的资产负债率甚至只有 30%。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0 年以来，俄罗斯 PPP 模式发展较快，尤其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应用较多，有多个 20 亿~30 亿美元的 PPP 项目成功实施。

表 3 2010 年—2020 年大中亚地区国家非跨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国家	投资需求(百万美元)	占未来 GDP 比重(%)
俄罗斯	1949573	6.50
哈萨克斯坦	69538	3.77
乌兹别克斯坦	41764	9.82
阿塞拜疆	28317	4.97
塔吉克斯坦	11468	16.21
蒙古国	10069	13.45
吉尔吉斯斯坦	8789	13.29
格鲁吉亚	4901	3.14
亚美尼亚	4179	3.46
总计	2128598	

数据来源：同表 1，其中俄罗斯数据系本文作者测算。

1994 年—2012 年，从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大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来看，呈现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行和世行三分天下的格局。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投资额占到了所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这一地区投资的 40%，投资总额为 800 亿欧元左右，亚行占比为 30%，世行为 22%（包括国际金融公司 5%的份额），欧洲投资银行为 7%。此外，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发展银行（2006 年成立）在本地区也占有 0.4%的份额，但大部分投资集中在哈萨克斯坦。

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大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部分都集中在交通和能源设施领域。其中，亚行 63%的项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以及欧洲投资银行 45%的项目都属于交通基础设施；欧洲投资银行和亚行分别有 45%和 18%的项目在能源基础设施领域；亚行还有 18%的项目用于改善中亚地区饮用水和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大幅领先于其他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该领域的投资。

在基础设施领域，目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最大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投资者，占两国市场份额分别为 75%和 43%。在俄罗斯的交通、能源、电讯和水

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投资中，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占比均超过 60%；同时该行也完全垄断了乌克兰电讯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投资，在水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份额也超过了 50%。在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的基础设施投资中，亚行均是最大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市场份额分别为 70%、57%、57%、55%，资金主要投向这些国家的交通和水基础设施领域。世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是大中亚地区最大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但自 2001 年以来其在大中亚地区各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影响力越来越弱，目前在俄罗斯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投资中世行占比约为 13%，在哈萨克斯坦甚至只有 3% 的市场份额。

二、国际关系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影响

总体来看，国际关系对于亚投行的影响可从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来分析：一是主要国家对亚投行倡议的反应与态度，二是亚投行与主要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潜在的竞争与合作。

（一）主要国家对亚投行倡议的反应与态度

自 2013 年 10 月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之后，各方反应不一。截至 2014 年 10 月，已有至少 21 个亚洲国家表示有兴趣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并参与了筹建亚投行的多边磋商。^① 仔细分析相关各国的反应和态度，大致可以将他们分为反对派、支持派、谨慎派和骑墙派。

美国和日本是最为坚定的反对派。美国认为亚投行意在削弱美国主导的世行和亚行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更担心中国此举将会对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带来深远影响，进而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利益。但亚投行旨在促进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这使得长期批评中国不承担地区责任的美国很难公开批评亚投行的倡议。但美国已经发起外交攻势，私下游说韩国和澳大利亚不要成为亚投行的发起国。日本反对亚投行倡议的原因众多，除了中日长期以来的各种冲突之外，日本在心理上也很难接受中国崛起，更实际的考虑则是担心亚投行会冲击亚行在地缘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同时也忧虑亚投行对日本在东南亚和大中亚地区的长期经营及广泛利益将会形成一定的威胁。

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卡塔尔、沙特是较为积极的支持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较大，本身有较强的融资需求，其中新加坡通过亚投行还可获得基础设施的投资机会。相较菲律宾和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从世行及亚行方面获得的资金支持明显更少，因此未来希望亚投

^①资料来源：<http://in.reuters.com/article/2014/09/28/asia-infrastructure-idINKCN0HN04G20140928>。

行能够给予更多支持。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作为南亚国家，也都有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以及经济增长方面的压力，积极支持建立亚投行也是现实利益的考虑。卡塔尔和沙特支持建立亚投行的理由与新加坡大致相同，尤其考虑到印尼、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这些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国家也都在支持建立亚投行。不过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近来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活动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制造了一些人为障碍，可能会对两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带来不利影响。

印度、菲律宾和越南是谨慎派。印度的顾虑可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平衡与世行和亚行的关系以及背后的美印关系，世行和亚行在中国提出亚投行的倡议后，都大幅加大了对印度的资金支持力度；二是印度也担心亚投行的控制权如果过度集中在中国手上，会给其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印度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极大，也迫切需要多样化资金来源，而且印度在经济发展方面需要中国给予支持的趋势也比较明显。综合考虑，如果中国积极争取，印度成为亚投行创始国的可能性较大，但未来印度与亚投行以及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仍旧会持较谨慎的态度。菲律宾和越南是美日在东南亚地区扶持的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棋子，两国在南海和排华等问题上又与中国长期冲突，因此在地缘政治方面也非常需要美日的安全保障。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方面的确能够给予菲律宾和越南更为实际的经济支持，所以加入亚投行对两国来说符合现实利益考虑。在这样的格局中，菲律宾和越南无法对亚投行的问题公开表态，只能一直保持谨慎态度，避免激怒美日或中国而有损自身利益。

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德国是骑墙派。尽管韩国和澳大利亚都公开表示有意愿加入亚投行，但是美国特别不希望有任何发达国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因此给这两国施加了压力，韩国和澳大利亚最后的决定还是取决于从亚投行中能够获得多大收益。比如，韩国透过媒体呼吁将亚投行的总部设在韩国，以此促进其建设亚洲金融中心的进程。但是，中国在经贸和朝鲜问题上又对韩国有巨大影响。澳大利亚的情况大致类似，中国对其经贸影响巨大，澳大利亚国内对加入亚投行的呼声也很高，但美国因素也必须考虑。估计韩国和澳大利亚都会以是否成为亚投行创始国在中美两国之间平衡要价。相比韩国和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德国是亚投行更应该积极争取的战略性会员国，即便无法争取两国成为创始会员国，未来亚投行扩容时也应将两国作为优先的重点发展对象。俄罗斯对大中亚地区影响巨大，本身也有较大的基建需求，又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会员国，近来还积极邀请中国增资其主导的欧亚发展银行。德国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中是第二大股东，也是亚行的会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分量也比较重。目前的国际情势对争取俄罗斯和德国都非常有利，但俄罗斯和德国方面也会综合考虑权衡成本与收益。

（二）亚投行和主要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综合考虑资本金规模、目标市场结构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未来亚投行与亚行、世行间的竞争大于合作，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会有较大合作空间，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竞争合作的机会并存。尽管世行和亚行都宣称，未来将会与亚投行在基础设施领域内展开合作，但是世行和亚行仍旧希望在基础设施领域保持领导地位。2012年，亚行经济学家 Vikram Nehru 曾建议将亚行和世行间的联系制度化，从而加强两个机构的整合，以更大地发挥对亚洲地区事务的影响力。^① 2014年10月，世行联合许多机构投资者，宣布成立新的“全球基础设施合作平台”（GIF），并力图通过 PPP 模式大力协调各方促进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此举针对亚投行的意味较浓。^② 亚投行目前拟定的首期资本金为 1000 亿美元左右，尽管规模与亚行 1650 亿美元和世行 2800 亿美元左右的资本金相比，尚有不小差距，但毕竟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可能只有 30 个左右，明显比亚行的 67 个成员国和世行的 188 个成员国数量要少。^③ 此外，中国也是新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重要发起国，该行核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完全没有美日等发达国家出资，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也可新兴市场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融资。考虑到未来中国还可用外汇储备进一步增资亚投行，因此从资本金规模和成员国数量上来看，亚投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确较具竞争力。

从区域上来看，未来亚投行与亚行、世行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东南亚在地缘上对美日来说相对更加敏感，两国也是该地区最大的对外投资来源国，而且东南亚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规模相比南亚和大中亚地区更小，亚行和世行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2013年，亚行的放贷规模为 210 亿美元。近年来，其资金投向的优先顺序是东南亚、大中亚地区和南亚。亚行在东南亚的主要资助对象是印尼，大中亚地区为哈萨克斯坦和南高加索地区，南亚为印度。^④ 亚行在其发布的《2020 战略》中，将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放在未来工作重心的首位。^⑤ 亚行的基本思路是，通过私营部门的密切合作放大自有资本对区域内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并且以 PPP 为基础设施融资的主要模式。世行 2009 年—2013 年的放贷规模为年均 430 亿美元左右，援助资金中大约有 40% 都投向了交通、

①资料来源：<http://www.adbi.org/files/2012.10.02.wp385.world.bank.adb.should.asia.have.both.pdf>。

②资料来源：<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4/10/09/world-bank-group-launches-new-global-infrastructure-facility>。

③数据来源：本段所涉及到的数据均来自亚行和世行的官方网站资料，以及主要媒体对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相关信息的公开报道。

④资料来源：亚行 2013 年年度报告，<http://www.adb.org/documents/adb-annual-report-2013>。

⑤资料来源：<http://www.adb.org/documents/strategy-2020-working-asia-and-pacific-free-poverty>。

能源、水和通讯基础设施等领域，资助的优先次序为非洲、亚太、欧亚、拉美和南亚，菲律宾和越南是近年来获得世行最多资助的东南亚国家。^①

亚投行在南亚与亚行、世行的合作空间相对更大，更可以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该地区展开深度合作。一方面因为该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较大，亚行和世行的资金相对较为有限，需要寻求更多的战略合作者。另一方面也因为中美和中日在这一地区的地缘冲突相对较弱，而且南亚均在亚行和世行工作优先秩序的最末位。尽管南亚中的印度在 2008 年—2013 年是累计获得世行最多贷款的国家，但世行贷款依旧远远不能满足印度庞大的基础设施需求，而且印度对世行目前完全由美国和日本把持的格局也颇有不满，一再呼吁对世行进行改革。由于中印两国都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创始国，该行的总部设在上海，而行长则来自印度，这样的结构有利于中印之间展开合作。如果印度也成为亚投行成员国，势必将会得到更多的基础设施融资，并且印度通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投行的合作也可以增强自身对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由于亚行已在俄罗斯以外的大中亚地区建立起较大的优势，亚投行将会与在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领域竞争激烈，但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俄罗斯的基础设施领域存在较大的合作潜力。亚行在苏联解体之后，积极经营俄罗斯以外的大中亚地区，目前已经是该地区最大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而且俄罗斯以外的大中亚地区基础设施的需求量相对不大，加之这一地区的诸多国家长期以来都奉行大国平衡外交与第三邻国外交，因此亚行能够通过自身以及与世行的合作施加较大的影响力。如果亚投行未来希望在这一地区有所建树，将不得不面对与亚行的激烈竞争。不过俄罗斯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创始成员国，本身也是大中亚地区基础设施缺口最大的国家，鉴于当前俄罗斯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如果能够吸收其成为亚投行成员国，可以预见亚投行未来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密切合作的机会较多。另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目前是俄罗斯境内最大的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该行旨在帮助冷战结束后的中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其提供的贷款利率比世行硬贷款的利率还要高。近年来，该行也非常支持大中亚地区的能源、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并注重通过 PPP 模式来放大资本。亚投行未来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投资，势必会和该行形成一定竞争。但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300 亿欧元的资本金使得其放贷能力严重受限（2013 年放贷仅为 85 亿欧元）^②，该行虽在大中亚地区有广泛影响，但对于大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而言仍是杯水车薪，因此与亚投行存在不少合作空间。

①资料来源：根据世行官网上的数据计算分析得来。

②数据来源：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方网站。

从所涉及到的具体领域来看，未来亚投行与世行、亚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的竞争会较激烈，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次之，跨境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对地缘政治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将会是各方争夺的焦点。通讯领域、与水有关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敏感性相对更弱，竞争性相对也更小。举例而言，亚投行在大中亚地区、东南亚和南亚的能源基础设施方面，将会遭遇较大竞争，尤其是当这些能源基础设施对于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较具战略意义时；在东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尤其是高铁领域，亚投行会与日本及其主导的亚行形成战略利益冲突。

三、促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展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对地缘政治经济的综合分析，本文就如何促进亚投行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合理确定区域布局，加快推进亚投行筹建

在东南亚地区，印尼、泰国和缅甸应是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南亚地区则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大中亚地区则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发达国家的战略合作者是澳大利亚、韩国、德国和英国。应努力争取这些战略合作伙伴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或尽可能在亚投行未来首批扩容时将这些国家全部包括在内，如此方能使亚投行在每个地区都有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成员国。亚投行的总部首选设在北京，南亚地区可设分行于印度首都新德里，东南亚地区可设分行于印尼首都雅加达，大中亚地区可设分行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这样可以大致构成以北京为顶点，莫斯科、新德里和雅加达为一线的等腰三角形（如图1所示），北京总行到另外三个分行的直线距离大致相等。此外，还应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策略地积极争取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参与亚投行，如中国可考虑以加入俄主导的欧亚发展银行来换取俄加入亚投行。在推进亚投行的筹建工作中，还应积极借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行的经验，同时汲取世行和IMF的教训，创新设计决策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在保证中国主导权的同时尽力争取更多国家参与，并加快完成多边磋商，防止美日从中破坏。

（二）科学设计商业战略，确保亚投行稳健运行

亚投行目前的定位主要是促进亚洲范围内的互联互通与经济整合。考虑到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和大部分项目风险较高的特点，同时为避免和亚行、世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形成直接竞争，在做好风险管控的前提下，亚投行可突出商业性贷款为主、援助性贷款为辅的特点，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贷款利率可以略高于亚行和世行的普通贷款利率，在大中亚地区的贷款利率可以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大致看齐并略低一些。鉴于亚行、世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都将PPP模式作为未来基础设施业务的



图 1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区域布局图

重点，亚投行也应积极探索通过各种 PPP 模式来扩大资本的杠杆效应，与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合作，同时也与其他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尤其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南亚和大中亚地区展开合作。依托亚投行发行基金、证券、债券和跨境基础设施投资保险等金融产品，适时考虑构建亚洲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市场，放大亚投行投资的杠杆效应，吸引亚洲地区的私人投资，同时也可极大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地域来看，可以首先考虑与东南亚、南亚以及大中亚地区的战略伙伴合作，其次再考虑南亚、大中亚地区和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同时也注意和东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在业务开拓方面，应加强管理，先易后难，注意树立好亚投行的国际形象，从低敏感性项目入手，再逐步向高敏感性业务方向推进，确保亚投行的稳健发展。

（三）打好三套组合拳，扩大亚投行的战略效应

第一套组合拳：将亚投行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及中国在东南亚、南亚和大中亚地区的国际援助统筹起来考虑，尽快在中国建立起类似日本协力机构的统一国际援助组织。该组织的对外援助性贷款应和亚投行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贷款按一定比例挂钩，例如，亚投行主要投资交通、能源和通讯基础设施，中国的国际援助机构则侧重水、教育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努力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效率和效果，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下转第 110 页）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综合评估及应对

任海平 王天龙

摘要：近年来，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给我国国家安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传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与日俱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体系亟待变革与更新。要加快构建新的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全方位地做好各方面安全工作，加快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

关键词：国家安全 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 新安全观

作者简介：任海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王天龙，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安全环境总体上向着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但同时，围绕中国和平崛起的话题越来越被国际社会关注，在一系列成绩与繁荣景象背后，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给我国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加快构建新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体系，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迫在眉睫。

一、我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形势

1. 政治安全。政治安全主要是国家主权、基本制度、意识形态的安全等，也包括政府体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等。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前提。近年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以及国际社会对我和平崛起的种种不同心态，对我政治安全产生着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把经济全球化作为推动政治全球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工具，企图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尤其是想通过“和平演变”来遏制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越来越把中国作为潜在竞争对手，并着手制定各种防范中国崛起的政策和战略。特别是美国战略东移，在我国周边地区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不时在一些我国内政问题上做手脚，显示出防范中国崛起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长期目标。美国等国对我造成的最大压力，可以说也就是政治安全问题。同时，国际社会对我和平崛起的矛盾心态也是影响我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不少国家对我既想借助又充满疑虑，既想倚重又有防范牵制。特别是一些周边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恐华、疑华、防华心态。这些都会对我政治安全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未来我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比较起来，政治安全将是最大的安全问题。我们所要努力减轻的最大压力，也是政治安全上的压力。

2. 国土安全。国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利益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随着我国国际利益的不断拓展，国内一些分裂势力的滋长以及与海外敌对势力的相互勾结，我国在国土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首先，台湾问题是我国土安全面临的最大隐患和危险。目前“台独”势力的潜在威胁仍然严峻，而美国则一直把台湾作为一张“牌”来遏制我国，成为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大外在障碍。“疆独”“藏独”势力近年来也在不遗余力地策划、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严重损害和威胁我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其次，边界领土争端，尤其是海洋权益争端对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影响不断增大。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国与一些国家的领土争端还没有完全得到妥善解决。我国与印度边界问题还没有解决，与东亚一些国家的海洋划界尚未确定，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围绕南海问题的争议还在激化。尤其是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向，一方面，东盟一些国家加强了对我南沙岛礁的“占领”；另一方面，美国也在不断以各种隐性手段插手南海事务。近年来的钓鱼岛问题也给本就争议颇多的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影响国土安全的因素，既有周边的，也有远离周边的全局性因素。如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其重要目标之一就可能是针对我国的。

3. 军事安全。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目前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军事安全的挑战。近年来，局部战争不断，不断催生新的军事变革，武器装备领域出现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美国等大国大幅增加军费、扩充军备，不少国家群起效尤，这些都给我军事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周边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前沿与关键领域。目前，美国对华军事包围圈已基本成型。在东亚和东南亚，过去的环太平洋对华遏制链得到进一步巩固。美日军事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美日澳等多边军事合作迈出实质步伐，美国军事介入东南亚和南海的行动接连不断。在南亚，美国通过反恐加大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渗透，对该地区的战略影响进一步加强。在中亚，美国借反恐扩大其军事存在，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同时，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借美国战略东移机会，加快扩军备战步伐。日本冲破重重限制，在军事大国道路上越走越远。东南亚一些国家不断加强军事力量，特别是海上力量，与我在南海问题上对峙。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不断增加军费、扩充军备，特别是印度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发展。而且，我周边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重要聚集地。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与国际恐怖组织联系密切，不断在我境内从事恐怖暴力活动。周边的跨国犯罪、走私、贩毒等问题也都在影响着我国的安全和稳定。

4. 经济安全。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复杂。首先，我国与外部世界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复杂，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与对抗的可能性不断增大。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提高，与国外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也越来越多。过去还主要集中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现在与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很多摩擦。可以预见，未来不仅在贸易方面，在经济规则、市场开放以及世界经济秩序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分歧仍会不断出现甚至会有激化的可能。其次，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与压力越来越明显。随着我国在市场和投资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跨国公司不断拓展在华业务，这不仅给我国内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而且我国的民族产业安全也面临严峻挑战。还有，我国的经济主权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干扰。近几年，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不时对我经济、金融政策指手划脚，施加压力。再次，我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我国的金融市场本身发育不成熟，监控体系不甚健全，防范能力较弱，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对我整体较脆弱的金融行业无疑将形成巨大压力。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潜在危机和投机资本的流窜也将始终是我金融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

5. 文化安全。文化安全主要涉及到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的选择权以及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自主权等。在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和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当前,我国在文化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西方政治文化的渗透和反华舆论的鼓噪。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西方政治文化“外溢”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一些西方国家大肆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对我国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进行渗透和颠覆,严重威胁我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局面。其中,美国的文化战略最为典型,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威胁也最大。此外,国际文化交流也被一些西方国家视作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与扩张的重要手段。利用西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影响和动摇我国人民信念,从而逐渐侵蚀我国的社会主义基础。一些反华舆论甚至裹挟了西方国家一些本不了解我国的一些民众的心理,又进而形成了一种不利于我国的所谓“民意”,不仅影响了这些国家与我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而且对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着负面影响,有损于这些国家与我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6. 社会安全。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和生产安全等自然或人为的种种灾害。这些要素有的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如果出了问题,经过一些因素对它的放大,往往会扩大或发展为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事件急剧增多,社会矛盾凸显,各类突发事件频发,使社会安全面临的态势日趋复杂、严峻。特别是民族分裂势力挑起的暴力恐怖事件、新型流行疾病的传播和蔓延、人口问题、食品安全等问题,严重威胁到社会和谐与稳定,已经由一般的社会安全问题上升成为国家安全层面的重大安全问题。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采取“分化”战略,特别是我新疆、西藏等边境民族地区的少数分裂分子和极端主义者,通过分裂活动、宗教渗透和恐怖主义威胁我国的社会和政治安全。在全球化环境下,某些新型流行疾病的传播和蔓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对国际安全和国际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和危害。我国自 1985 年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的流行呈快速上升趋势。2003 年春季,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肆虐的非典型肺炎曾引起全球各国的高度关注,引起了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严重恐慌,也导致了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不易处理的危机。当前,我国面临的人口安全问题也非常严峻。首先,人口膨胀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沉重压力。从总体上讲,目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直接制约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其次,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人口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老龄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比较快,这使得我国在经济欠发达时期需要解决比发达国家还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另外,大量人口国内流动带来的问题和隐患也日益严重,不仅给交通、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等工作增加了难度,而且严重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影响了一些区域的社会稳定。

二、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形势

1. 资源安全。资源安全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渐渐凸显的一个新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我国的能源资源种类不均衡，储备严重不足，开发难度大，供给后劲不足，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而融入世界的步伐却很快。所以，一旦出现国际市场供应中断或价格飙升，我国的能源资源安全将受到很大冲击。而且能源资源安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和军事问题，它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其对外依存度相联系，也与国家对世界能源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密切相关。目前，我国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能源安全上，能源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清洁能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上，而石油又是我国清洁能源中需求增长最快而供给能力日益严重不足的品种。因此，石油短缺将是我国未来一段历史时期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我国石油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油源安全。国际油源竞争日趋激烈，各大国对外战略往往围绕石油问题进行布局，导致油源问题更加复杂敏感。二是油路安全，我国进口石油大部分都要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来，经过马六甲海峡与我国南海地区。目前看，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通道安全主要掌握在别国手里。美国在我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也是影响我石油通道安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美国通过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已进一步渗透到印度洋，客观上形成了对我油路安全的潜在威胁。

2. 科技安全。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保护国家利益免受外国科技优势以技术手段相威胁，以及国家利益免受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上。当前，我国面临的科技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在先进技术、前沿技术、核心技术方面掌握得还比较少，往往会受制于人，而且科技安全对其他领域的国家安全影响很大，在科技安全与政治安全上，近些年来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对国家的主权关系提出了挑战；在科技安全与军事安全方面，军事优势始终掌握在科学技术先进一方的手里；在科技安全与经济安全方面，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据相关数据，一些发达国家目前已达到60%~80%的水平，相比之下我国只有30%，经济方面问题的解决越来越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手段和科技安全的保护；在科技安全与生态安全方面，现代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滥用现代科技的结果；在科技安全与文化安全方面，现代科学技术为西方某些国家通过大众信息传播进行文化侵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先进手段，而受到文化侵略的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导致了在反文化侵略上的不力；在科技安全与社会安全方面，国内外恐怖主义势力或恐怖主义分子，往往利用科技手段来进行违法犯罪等活动，增加了维护社会安全的难度。

3. 信息安全。近年来,我国信息化发展速度令人瞩目,但信息安全问题也相伴而来。信息安全是物理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信息内容安全、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与公共信息安全的总和。信息安全与国家的安危紧密相连,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目前,我国的信息安全相当脆弱,已成为各种安全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国家的通讯、能源、交通、航空、救灾、消防、金融等基础设施系统越来越多地依赖网络传输数据进行管理,并且各系统之间相互依赖。信息安全的威胁主要来源于技术系统本身,如技术缺陷、电脑黑客、网络病毒、信息污染等等。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威胁不断得到强化。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与因特网相连的网络管理中心有 95% 都遭到过境内外黑客的攻击或侵入,其中银行和证券等金融机构是攻击重点。政府上网、政务信息化也增加了泄密的可能性。我国基础信息技术严重依赖国外,计算机芯片、骨干路由器、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管理系统以及大量的应用软件等核心技术缺乏,成为国家信息安全的“根本问题”或“最大隐患”。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建立了多个大规模的监听机构,围绕地球飞行的卫星 24 小时全天候收集通信秘密。总之,信息安全已呈现出突发性、扩散性、全球性等特点,其复杂性、跨国性、不可控性越来越突出。

4. 生态安全。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一方面,庞大的人口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持久的压力;另一方面,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和先发展后治理的思路也使生态环境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我国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尤其集中在水土流失、空气污染和酸雨、水稀缺和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在土地安全方面,主要问题是森林植被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我国森林面积下降,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 16% 左右。我国是世界上荒漠面积较大、分布地区较广、危害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问题涉及 18 个省区,受荒漠化危害的人口在 4 亿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巨大,占国土总面积的 1/3 以上。在大气环境安全方面,大气污染十分严重,特别是近几年雾霾问题突出,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都逐年提高。许多城市空气质量尚未达到三级水平。同时,我国酸雨也呈蔓延之势。酸雨区面积占国土面积 30% 以上。在水安全方面,淡水资源稀缺、淡水污染、海洋生物资源过度利用、海洋污染等问题都在不断加剧。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排到全球第 121 位,被联合国列入 13 个贫水国家之一。七大水系 400 多个重点监测断面中,只有 1/3 的断面满足一到三类水质要求。在生物物种安全方面,目前我国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达 4000~5000 种,其中珍稀濒危重点保护动植物已分别达 258 种和 354 种,生物资源的破坏形势十分严峻。

5. 核安全。核安全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的新生领域。核安全作为典

型的非传统安全，具有事故后果严重和极端的社会敏感性等特点，对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安全领域都有重要影响，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共有运行核电机组 18 台，在建核电机组 30 台，约占全球在建核电机组的 40%。在核技术利用方面，我国在用放射源 10 万余枚，涉及单位 1 万余家，在用射线装置 12 万余台（座），涉及单位近 5 万家。随着核技术应用事业快速发展和放射性废物量快速增加，我国核安全面临诸多困难和严峻挑战：未来 5 年～10 年将是我国核电建造、调试和运行的高峰期，安全监管任务持续加重；历史遗留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置问题进展缓慢，存在安全隐患；现有的核安全技术标准还有较多缺项，很多在建核电机组的安全性有待提升，我国的核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也有待改进；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后社会公众对核安全高度关注，公众信心已成为整个核事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不断交织，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给我国家安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既有传统安全的挑战，也有诸多非传统安全的挑战，许多传统安全问题中也在不断产生一些非传统的安全新问题。总体上看，我国面临的大的安全环境有所改善，但不安全的因素一直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难关还没有度过。所以，要维护好国家安全，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认真梳理、正确认识、妥善应对各种挑战，以长远的眼光构建新的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全方位地做好各方面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和延长“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才能真正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复兴大业，早日实现“中国梦”。

三、以新的国家安全观全方位维护国家安全

1. 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夯实国家安全基石。国家的地位和安全由多种因素决定，但归根结底取决于自身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靠依附于别国或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取得安全，不可能靠在别国的夹缝中生存来取得安全。我国的安全要靠自己，靠自己以经济为主，包括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人才、资源等等在内的综合国力，各方面都不可偏废。如军事力量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直接而重要，但在当代世界军事力量的提升必须依赖于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人才素质等，没有这些方面的雄厚基础，不可能开发出先进的武器装备，不可能提高军队的现代化作战水平，也不可能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综合国力上不去，单纯加强军事力量，基础将不稳固，也难以持久。再如，信息安全是目前国家安全的薄弱环节，根本原因就在于我硬件制造和软件开发水平还有欠缺，芯片买别人的，软件用别人的，飞机坐别人的，卫星租别人的，安全

问题自然相伴而生。所以，制定和实施我们的安全战略，必须始终坚持聚精会神搞经济建设，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集中力量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人才和资源实力。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身的基础打扎实，把这作为最重要、最根本的国家战略，其他安全战略应处理好与这一最根本战略的衔接和配合。

2. 综合考虑安全形势，加强重点领域工作。在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时时处处都会遇到安全问题。强调增强综合国力，并不意味着忽视各领域国家安全的保障和建设。就安全战略本身来说，在各个方面加强安全保障的同时，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好最迫切、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在经济方面，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力求更好地掌握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既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同时又要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带来的冲击。既要兑现我们的承诺，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又要行使我们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设置必要的防火墙，防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政治方面，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民主建设和制度建设，稳步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严格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通过不断完善和巩固基本政治制度，获得最大限度的政治安全。同时，有效应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加强国家价值体系建设，增强人们对国家制度体系的信念和信心，打击敌对势力各种破坏活动，保证国家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稳定、安全。在军事方面，要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努力建设一支“靠得住”“打得赢”的现代化人民军队。加紧高精尖武器装备研发，保证手上能有若干拿得出、用得上的“杀手锏”。深入研究现代化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不断改进和完善国防与军事战略，从未来可能出现的战争样式出发，制定各种预案。加强人才建设，加快提升军队和军工队伍的整体素质。科学处理军事与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关系，以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后盾，有效服务于政治和经济战略特别是整体的国家战略。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资源安全等方面，要采取积极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强薄弱环节，消除各种漏洞，提高国家整体安全系数。要加强社会治理力度，积极与相关国家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等活动。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力度，弘扬中华文化精华，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和价值观侵蚀。在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合作，注重战略资源储备。

3. 积极践行“新安全观”，不断改善国际环境。国家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产生的，如果没有或减少了外部威胁，国家安全系数自然就提高了。因此，

维护国家安全除了加强自身各方面建设外，还须通过实施正确的国际战略，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自身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的国际环境。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上提出的新安全观，是我国新时期国际安全合作的新理念，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政策宗旨，坚持共同包容的安全原则，倡导多边主义，通过平等协商与合作，寻求创造共享的安全环境。要秉承合作安全原则，实现各方共赢；追求综合安全原则，包括传统安全合作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坚持可持续原则，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前进。此外，要做好自我推介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积极改善我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加强与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以及各行业、各领域的联系与交流，不断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在原则问题上，要立场坚定，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与此同时，要提高国际交往、沟通水平，掌握政策和策略的灵活性，尽可能减少摩擦，消除误会。

4.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着力处理与美关系。随着美国全球战略布局调整及“重返亚太”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中国周边与国际环境更趋复杂，面临更多的战略挑战。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从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而处理与我国的关系也将是对现在与未来美国战略与政策的重要课题。要深入研究新时期对美关系的战略与战术安排，研究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对我国经济安全带来的重大影响。目前，我国在经济上对美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我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形成了美国对我国的经济约束力。中美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对等依存关系，增加了我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因此，要加强美国对我国的经济依存度，使我国对美国能够形成较强的约束力，把两国经济的融合度和依存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两国政治合作与战略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一方面，应该鼓励企业拓宽出口市场，增加对欧盟、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出口，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鼓励从美国的进口和投资，增加美国在华经济利益。要加强与美双边战略对话和贸易谈判，通过沟通、谈判，尽可能避免损失。要进一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20国集团（G20）峰会等国际组织平台，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等高层对话机制，加强与美对话磋商和贸易谈判，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能起到安抚作用，又可减少贸易摩擦的代价。要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考虑启动与美开展双边贸易与投资协定（BITT）谈判，把中美经济合作的众多议题装在BITT谈判的“篮子”里，形成若干制度性、长效性的机制安排，增加中美经贸合作的可

预期和透明度，以促进两国贸易投资的发展，更加直接地促进中美经济合作，促进中美关系取得实质进展。

5. 正确把握机遇挑战，科学处理内外关系。国家安全是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认识、把握和维护国家安全，要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科学的思想方法，正确处理若干关系，防止简单化、片面化倾向。要正确把握机遇与挑战的关系。这是评估总体安全形势须掌握的基本关系。国际战略形势，包括国际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复杂的，既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一方面是机遇，另一方面也是挑战；短时间内可能困难较多，从长远着眼可能前景看好，这类双重性和矛盾的现象是经常存在的。因此，在研判国家安全形势时，须注意两点论，防止片面性，既要看到大局、主流、趋势，同时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隐蔽的一面，可能出现的一面。近年来的国际形势，总的来说还是积极的一面占主导和支配的地位。我国 30 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外部环境和我们对外部环境的争取与利用。但国际环境对我也有消极的一面，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科技、信息、社会方面，我们都面临着一些新的安全问题，个别方面的危险因素还有可能加大，个别事态的发展趋势尤为不利。

要科学处理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国家安全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看国家安全，主要是指外部对我国家安全的侵犯和损害，所以，这里的基本态势是防范、是对付。但从更全面、更长远、更深层次角度看，仅仅着眼于防范外部显然不够。首先，防范要有防范的能力，防范的能力当然在内部，在于国家的发展，在于自身的综合国力，包括某些领域专有的防范力量的建设。如果没有内部的基础性建设，只就防范谈防范，不可能真正收到防范的效果。其次，许多安全问题并不仅来自外部，而更多存在于自身内部，有些内部因素还更重要，不解决内部问题，仅仅防范外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要看到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不能注意外部忽略内部，也不能注意内部忽略外部。要坚持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但不能因此忽视国际领域对国家安全的不利因素。要认真研究国际环境变化，认真分析不利因素的具体情况、特点、态势，包括种种发展的可能性，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及时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发生侵害我国家安全的情况，就可以有效措施及时应对处理。

总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趋利避害、化解风险、迎接挑战，将成为我们长期面临的重要课题。面向未来，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

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加快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新华网 2014 年 4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15/c_1110253910.html。
2. 李克强：《经济外交转安全外交，构建亚太安全架构》，新华网 2013 年 10 月 1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11/c_117670103.html。
3. 曾培炎：《国际形势特点可以归纳为四个“一”》，中国经济网 2013 年 1 月 26 日，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301/26/t20130126_24066085.shtml。
4. 魏礼群：《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建设》，2012 年 2 月 15 日在第十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上的主题演讲，<http://theory.people.com.cn/GB/17111128.html>。
5. 陈文玲：《影响 2014 年乃至更长时期的重要变量》，《中国经济时报》2014 年 2 月 12 日。
6. 石晓虎、司银涛：《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六大安全挑战》，《时事报告》2004 年 6 月 2 日。
7. 李忠杰：《怎样认识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瞭望》2002 年 5 月 27 日。
8. [美] 施莱辛格：《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韩亚军、李韬、陈洪桥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9. 楚树龙：《冷战后中国安全战略思想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 9 期。
10. 徐坚：《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安全合作》，《当代亚太》2003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周 怡 戴颖杰 水名岳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是支撑企业“走出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本文聚焦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模式，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对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经验及其意义进行总结，探索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金融业 “走出去”战略 外汇储备 人民币国际化

作者简介：周 怡，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 2014 级博士；

戴颖杰，西安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全国工商联法律部权益处处长；

水名岳，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博士生、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这次重要会议推动了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市场、企业、货币的国际化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活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吸引外资，把资金、技术、管理“请进来”，用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回答了世界的困惑和担忧。如果说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把外资“请进来”，那么未来 30 年更突出

的特点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①特别是中国金融业的“走出去”。近年来，中国已有不少金融企业开展“走出去”业务，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缓解中国能源资源约束、服务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全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

中国金融业“走出去”能为中国实体经济“走出去”提供融资支持和风险保障支持，这些支持可以通过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两种手段来共同完成。金融业“走出去”不仅是产业升级，实现产能、技术和劳动力转移，为经济结构调整腾出空间的需要，而且也是开展经济外交，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特别是金融业“走出去”将在下列经济与金融战略领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一）维护国家战略资源安全

在当前逐渐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中，资源价格成为了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最为关键的核心，而资源价格都是由国际期货市场的期货价格所决定。因此，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的问题需要更多地从金融安全的角度考察。维护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离不开金融业“走出去”的支持。首先，海外资源开发需要“走出去”的资源生产企业动用外汇储备。其次，建立资源储备需要使用外汇储备。再次，通过境外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需要使用外汇储备。在中国目前尚未建立相关期货市场之时，国内企业可以到境外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这就要求外汇储备管理必须给予支持。最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需要运用外汇储备。由此可见，在中国当前外汇资源主要由政府外汇储备掌握的前提下，金融业“走出去”必须合理运用外汇储备来支持中国的资源安全战略。

（二）提高外汇储备管理效率

截至2014年3月，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9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高额的外汇储备虽然有助于支持国家信用，防范国际收支波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中国基础货币的控制构成了巨大压力，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外汇储备结构不合理，持有美国国债比例过高，导致外汇储备价值与流动性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这也是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实现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在全球的优化配置，就必须通过全球经营的金融企业来加以运作，实施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在外汇储备日常流动性部分得以保障的前提下，将国

^①“走出去”战略主要是指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包括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从而达到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目标。金融支持是“走出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家外汇储备的一定比例由金融企业、央企进行海外运用，无论从战略意义还是经济意义都优于购买美国国债，这也将有利于提升中国金融企业与企业的海外运营能力。

（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013 年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为 4.63 万亿元，反映出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下，货币使用度飞速增长。此外，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调查显示，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外汇市场第九大交易货币。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最新数据表明，人民币已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这些数据显示，人民币在贸易、投资、交易等领域应用日益广泛，与人民币相关的金融产品将更加丰富，全球金融市场也将因此更加多元。较为封闭的金融体系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障碍，但考虑到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的需要，中国仍不宜为人民币国际化而加速资本项目开放。在资本、金融项目遭受限制的条件下，中国应重点在贸易与直接投资项下扩大人民币国际影响，推动金融业“走出去”战略，扩大向发展中国家发放人民币贷款的模式，通过项目融资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除了对“走出去”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提供金融支持之外，“走出去”的金融企业还可以独立地开展业务，通过吸收人民币存款、发放人民币贷款，以及出售人民币的其它金融资产，使得境外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有一个畅通的流转渠道，从而增加人民币及其资产的吸引力。而且通过“走出去”的金融企业开展人民币业务，可以使得人民币输出入大部分都在中国的银行体系完成，有利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对人民币国际流动进行监测，并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以应对人民币突发性地大规模流进或流出，降低人民币境内外流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四）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提速，金融业加快海外布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满足企业境外金融需求，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金融业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其领域从最初支持轻纺加工、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到支持通信设备、飞机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又扩展到支持境外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具有战略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境外收购项目等。中石油、中石化、华为、中兴通讯、联想、海尔等一大批企业在境内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领军者和中坚力量。尽管成绩显著，但与企业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金融需求相比，中国金融业提供的跨境金融服务还不能够完全满足这些需求。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相对落后于企业“走出去”。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90 家境

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90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8%，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其中民营企业投资额占比超过 30%，数量占比约 50%，这些都为未来中国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和助推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数据支撑和现实依据。

二、现实条件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作为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为本地区金融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托。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是一个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机遇期，需认真把握。

（一）优势与特色

1. 国家信用作支撑。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与西方经济体的金融机构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金融企业在长期贯彻国家战略、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与政府部门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因此容易获得国家的政策支持，便于整合国内各种政治经济资源，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优质全面的金融服务。在与各国开展合作方面，展现的是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更易于取得合作国的信任与共识。

2. 兼顾国家利益与经济效益。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尽管也有战略合作，但都是以自身最终盈利为标准。这样的合作方式虽然符合机构利益最大化，但往往会忽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逐渐成为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大鳄”。中国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作，也有业绩压力，也要追求经济效益，也要通过盈利实现企业的做大做强，但在中国金融机构中，国有股仍居支配地位，委托主体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能兼顾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此时金融机构和企业就如同国家左右“两个口袋”的关系，金融机构会从国家长远发展所需的战略资源出发，优先支持企业“走出去”。

（二）问题与挑战

1. 话语权。与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相比，中国金融机构对国际规则掌握不够娴熟，稍有纰漏就会遭到国外金融制裁和排挤，而且发达国家往往执行双重标准，增加了中国金融业开展“走出去”业务的难度。同时，一些区域经济组织为了实现本区域的利益最大化，经常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阻碍外部企业的进入，尤其在金融等敏感领域则更是如此，这也给中国金融业的“走出去”带来了困难。

2. 政治风险。中东、南美、非洲等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定，宗教、民族冲突时有发生，部分国家甚至内战频繁，国家分裂，而且在某些国家，极端政治势力还常常蓄

意将矛头指向海外华人，俄罗斯、印度、印尼等国都存在这方面的潜在威胁。

3. 管理经验。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开展国际业务有的已有上百年历史，对业务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习惯等了如指掌，并且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的经营管理模式和金融技术，而中国金融体系刚刚完成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许多管理制度尚未完善，业务经验积累不足，中国金融业“走出去”不足 10 年，在这些方面学习的空间更大。

4. 机构设置。海外大型跨国金融集团都建有全球性的机构网络，在不同地区提供兼具标准化与本地化的服务。如汇丰银行在 82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约一万家附属机构，通过其先进的技术网络，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美国花旗银行在全球 140 个国家开展业务，为个人、企业、政府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金融服务。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分支机构主要设在发达国家，服务也主要面对华人和部分中资企业，而大部分中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业务，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对称。同时，由于在海外缺乏常设机构和常驻人员，也给业务经营带来了困难。

5. 协调机制。目前对外一揽子合作增多，涉及能源资源、农业、民生、基础设施、机电设备出口、对外工程总承包等多个领域，涉及优惠贷款、商业贷款、信用保险等多项金融业务，涉及商务部、外交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多个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政策协调。同时，随着国内企业、银行“走出去”步伐加大，国内相关机构在“走出去”具体业务上的竞争也在加大，比如中石油与中石化、华为与中兴、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在境外业务发展上都存在竞争关系。如果国内机构之间竞相压价、恶性竞争，不仅会损害中国机构的利益，使外国人坐收渔利，还会损害中国的对外形象和整体战略利益。

三、模式创新

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的核心思路应定位为：在扩大内需，改变出口导向增长方式的同时，通过国内金融体系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降低在对外贸易、跨境投资与外汇储备管理方面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因此，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由近及远分可定位为三个层次：人民币国际化、区域货币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在这三个层次之中，人民币国际化是近期内中国应重点推进的领域，而外汇储备的有效运用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因此，基于国家战略的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的模式创新可以以外汇储备的运用为抓手，建立起外汇转融通机制，构建外汇储备运用的新渠道，重点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一）建立利用外汇的转融通机制

如前所述，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为金融业“走出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潜在

的资金来源。为了充分利用外汇储备来支持金融业“走出去”国际化战略，需要在外汇储备与金融业之间建立有效的转融通渠道。

1. 外汇储备注资金融企业。这一外汇储备利用渠道有三种可能的方式：财政注资、外汇储备管理局直接注资和通过其他国家投资平台注资。这三个注资主体实际上对应着对于外汇储备中投资增值部分管理权责的不同划分，但是在本质上则是相同的，即在国有金融企业获得资本金的同时，政府或其代表机构增加了对其的股权。就目前来看，对于上述外汇储备利用方式讨论较多的是“汇金模式”。“汇金模式”是中国参考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而形成的一种管理和使用外汇资产投资的模式，其核心在于合理运用国家外汇资产投资于国家重点金融企业，为其提供稳定长期融资服务。汇金公司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并不干预其控股的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在今后建立外汇储备与金融企业之间转融通渠道时，也可以参考汇金模式，由中国投资公司或类似政府投资平台向国有银行等金融企业注入资本金，为其提供长期稳定资金，但投资公司并不参与国有银行的管理，只是从中获得与注资相应的股权收益。

2. 发行定向债。在利用外汇储备促进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金融债券同样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其中的具体过程是，商业银行等金融企业向中国投资公司或其他政府投资平台发行一定数量的外币定值债券，利率参照同期美国国债利率及债务规模与期限协商确定，获得的资金可以定向使用，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运用外汇储备购买定向债券的政府投资平台只获取债券利息，不干涉商业银行等金融企业的具体经营决策。由于债券筹资的灵活性和可控性较强，更利于满足商业银行等金融企业长期性、低成本性和集中性的外汇融资需求。

3. 委托贷款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外汇储备管理当局或政府投资平台与商业银行签订委托贷款协议，前者提供资金，由后者办理相应的外汇贷款业务并收取代理费。委托贷款模式主要适用于由政府主导的具有高度战略性与政策性的海外投资项目。与前两种外汇储备利用模式相比，委托贷款模式中商业银行的主导性相对较低，尽管商业银行可以在项目选择上进行推荐和提供建议，但在操作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自身作为商业银行的专业技能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委托贷款属于表外业务，代理费也属于中间业务收入，这种模式对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压力较小，项目风险也主要由外汇储备管理当局或政府投资平台承担，因此具有较大的安全性。

4. 转融通渠道的选择与配合。通过上述任何方式建立起来的外汇储备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转融通渠道，都有助于形成外汇储备管理当局或政府投资平台、金融企业（尤其是商业银行）、用汇企业之间规范、可持续的资金融通链条，都需要金融企业予以重视，根据不同的项目性质加以选择和配合，发挥其最大效能。在这其中值得强调的是，商业银

行在外汇储备利用上不能混同于银行一般性的业务，不能够仅仅以短期商业利益为核心，而是必须发挥自己在境外业务开拓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应的外汇储备转融通渠道选择也应当与此相配合，争取成为国家外汇储备的重要管理与投资平台之一。

基于上述考虑，对于国家定向用途的外汇部分，可以探索中央的政府机构（国资委或人民银行）考虑再成立一家类似汇金的公司，由这家公司充当投资平台，从央企或国有金融企业的海外投资计划中筛选合适的项目，在央企或国有金融企业负债率较高或实力不足的情况下直接将外汇储备作为资本金注入从而获得股权，而该笔以外汇形式注入的资本金必须定向投入到海外投资项目（如非洲铁路建设项目、南美能源开发项目等）中去，不允许在国内结汇（见图 1）。注资后，投资平台公司持有央企股权；央企或国有金融企业增加了资本金，获得并购或放贷所需外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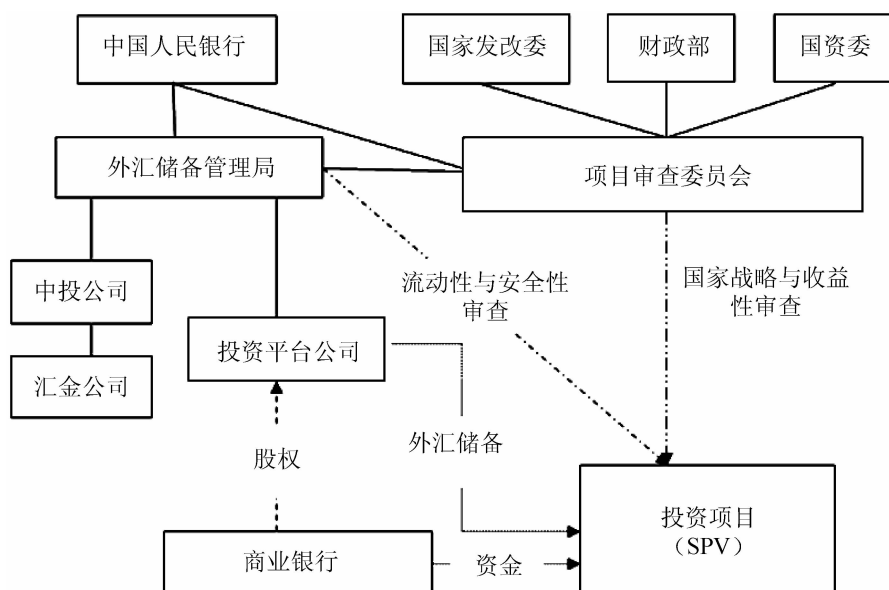


图 1 外汇储备运用新渠道的模式创新

（二）探索外汇储备运用新渠道

在通过外汇储备转融通渠道获得资金之后，金融企业就可通过多种方式开展“走出去”业务。在具体业务模式的选择上，可以采用向境外投资项目提供优惠贷款、发行定向债等债权方式、定向增发的股权方式、直接投资、股权收购方式以及其他各类金融创新方式等，在为境外投资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的基础之上，为“走出去”项目与相关企业提供国别风险、政策环境、市场需求、项目可行性分析、融资方案设计等全方位服务。

1. 基金股权投资模式。如前所述，在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如果国有金融企业能够获得部分官方外汇资产的管理权，将能够大大缓解金融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

并且使相应部分外汇资产获得更高收益。实现上述意图的一种模式是可以金融企业成立的专业公司与央行对接，获得外汇资金，再通过成立各种投资基金进行股权投资。目前，国内企业“走出去”项目的股本投资需求迫切，国际上与中国合作建立双边和多边投资基金的愿望十分强烈，中国金融企业可以探索采用“项目贷款+股权投资”模式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性外汇项目，但此类项目模式资金需求量大，单靠金融企业自身市场化方式筹资难以满足其资金需求，一些国有大型金融企业专门负责投资业务的子公司的资金来源也很有限。

鉴于上述情况，为解决股权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可以探索央行在运用外储委托贷款的同时，开展委托投资业务，参与政策性外汇投资项目。国有大型金融企业凭借信用和管理能力，从外汇储备获得长期借款并委托机构旗下的金融投资公司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国家批准、外汇储备管理局认可的政策性项目。金融企业向外储借款提供本金担保，并支付借款利息。外汇储备管理局则对项目进行跟踪和监管。这一模式的资金流向示意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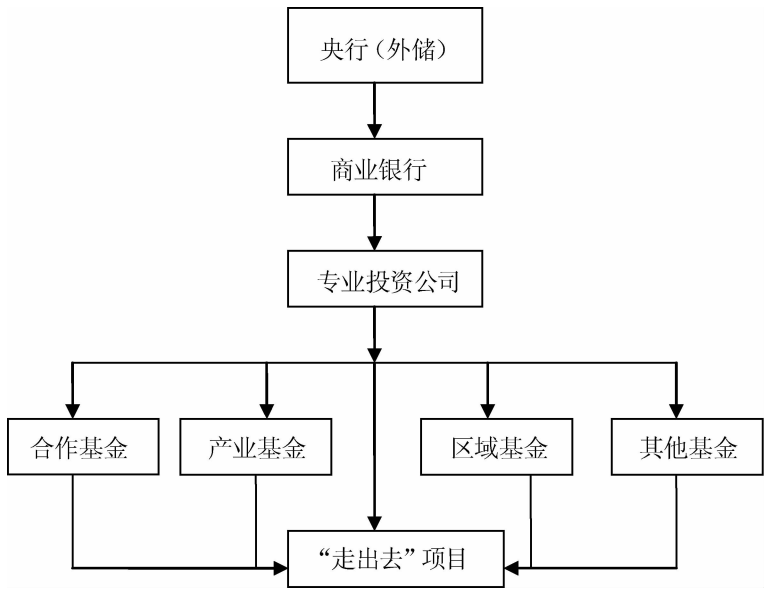


图2 “走出去”项目基金股权投资模式

2.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模式。利用“走出去”项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基本思路是依托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和提高特定区域对于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在这种项目模式下，中国金融企业向特定国家发放人民币贷款，接受国运用贷款购买中国产品。由于中国对外人民币贸易融资对象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体，所以需要政府建立相应风险防范机制以保证这类金融活动的持续展开。这一模式的资金流向示意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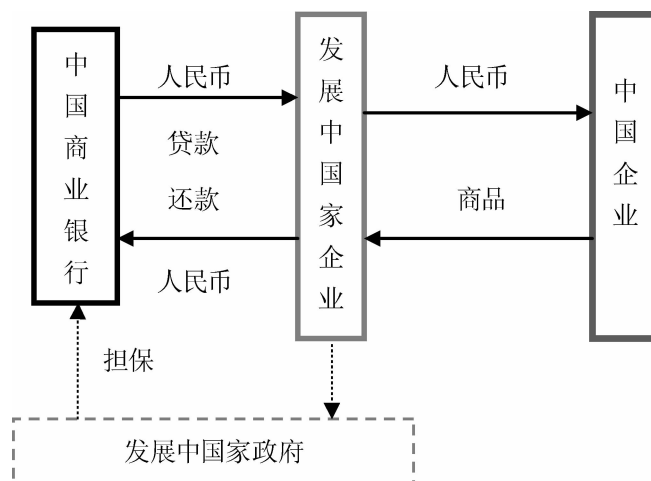


图3 “走出去”项目中人民币国际化模式

3. 产能过剩解决模式。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国一些传统产业部门乃至部分新兴产业部门已经进入或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这些部门日益面临国内需求升级、工资成本不断提高、市场饱和的压力，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与此同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某些产业仍具有技术与管理优势，因此，通过“走出去”项目，将生产能力转移到更具比较优势或者具有市场需求的发展中国家，则是解决产能过剩的一个有效途径。在这种项目模式下，中国金融企业向特定国家发放贷款，接受国运用贷款向中国企业购买配套设备。如果贷款是以人民币发放的，那么它还兼有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效果。这一模式的资金流向示意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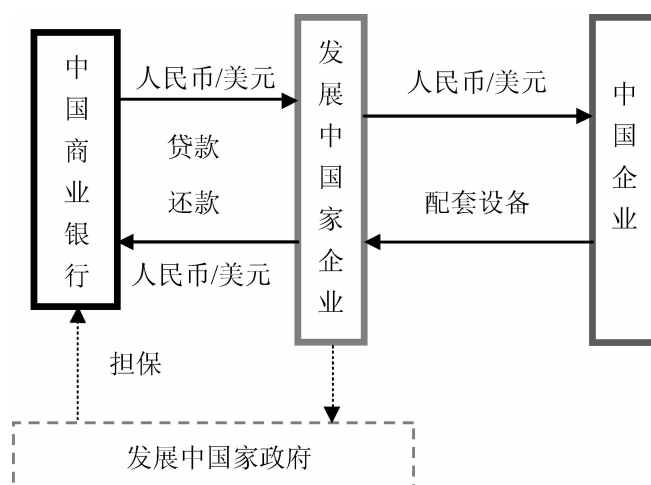


图4 “走出去”项目中产能过剩解决模式

4. 能源矿产资源战略模式。维护中国的能源与资源安全是“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金融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与能源企业通力合作，成功运作了一批重

大国际能源资源合作项目。如 2009 年国家开发银行与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等国签订 600 多亿美元贷款换石油的协议，每年可获得 7500 万吨原油保障；与委内瑞拉、澳大利亚等国签订了 15 亿美元贷款换资源协议，每年可获得 1600 万吨廉价优质铁矿石，对于实现中国铁矿石进口多元化，打破世界铁矿石寡头垄断，提升中国钢铁企业谈判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金融企业应多支持国内企业开发国外资源项目，构建利用中国市场和资金优势获取境外能源资源的新模式。在能源矿产的“走出去”项目中，如果加以适当的金融安排，如采用人民币进行贷款，进口中国的加工设备，那么就可实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扩大出口等多重目标。这一模式的资金流向示意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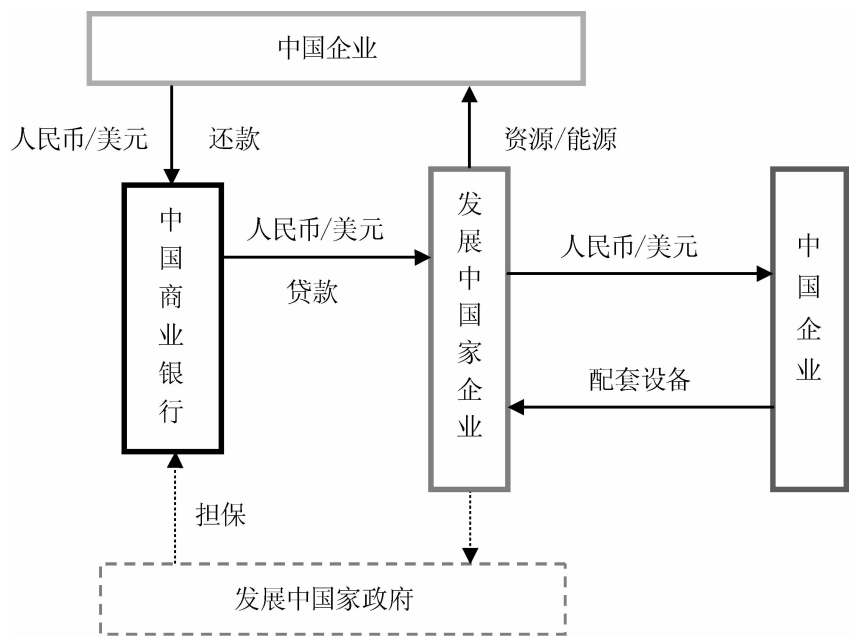


图 5 “走出去”项目中矿产资源战略模式

四、路径选择

中国金融业要进一步实施国际化战略，利用外汇储备“走出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就要根据自身特点与发展需要，制定明晰的境外业务发展战略，选择合适的行业领域和地区，实现国内业务和境外业务的合理衔接和有效联动、境外业务的优化布局 and 所需资源的有效供给。

（一）行业领域选择

行业领域的选择要根据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新特点和世界各特定行业市场的竞争状况，同时考虑到充分发挥中国现有产业基础的比较优势及现阶段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应将能源及资源类、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成熟技术的一般制造业及服务类境外投资

作为金融企业利用外汇储备资金“走出去”的重点领域。

在能源及资源类境外投资方面，应将重点放在石油业、采矿业和林业；高新技术类境外投资方面，一是要在境外技术创新密集区设立研发中心。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和德国建立了以研发和技术转让为主要目的海外企业，通过境外产品开发来推动国内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二是跨国并购高科技企业，通过直接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快速获得其技术；成熟技术的一般制造业境外投资方面，应把轻工纺织、机电产品、化学工业等在国内较为成熟的制造业作为对外投资的重点，本着建立国际生产体系的目标，发挥产业比较优势，在适合制造业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业境外投资方面，要抓住一些国家放宽金融门槛的机遇，在具有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险、研发、销售等领域加快境外投资，优化服务业结构。除了金融产业之外，目前应大力对外开拓发展的服务行业，这些行业有建立在人力资本输出基础上的工程承包业、交通运输、中医医疗保健、餐饮服务业。

（二）地理区位选择

在国际化进程中，地理区位选择与产业领域选择密切相关。金融业“走出去”战略区位选择中不仅要考虑自身和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机遇，而且更要考虑中国在不同地区的战略利益。考虑到中国的地缘利益、综合国力和当前金融企业的自身条件，在国际化战略的地理区位选择中应以东盟、中亚、南亚等近邻和拉丁美洲、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为主。

中国对亚洲发展中国家，应发展对东盟和南亚成熟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发展对海湾和中西亚地区资源寻求型为主导的投资；对拉美的投资应主要集中在矿产、能源、木材、农产品等领域，以中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协助拉美国家建造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开采石油、有色金属等，以换取等值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另外，在家电等制造业和电信业境外投资方面也要有所突破。对非洲投资的重点领域应该包括资源开发型投资、以家电为主的制造业投资、以电信技术为主的信息产业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选择性投资。金融业“走出去”需要在上述这些发展中国家积累业务经营和资金实力，等条件成熟后再加入金融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

五、对策建议

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是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相比较如火如荼的实体经济“走出去”，金融服务及相关配套措施对实体经济“走出去”后的后续支持相对滞后。

（一）完善法律法规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立法滞后造成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力等问题。为保障海外投资政策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支持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建议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海外投资法》等，以便明确牵头单位，协调各部门、企业及金融机构，将现有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体系、监管和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从而为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创造一个和谐有序的市场环境。

（二）推进外汇管理简政放权

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变，相关部门应当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推进外汇管理简政放权，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如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适当延长境内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出口收汇核销期限；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放宽境外放款在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方面的要求；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非贸易项下资金有效运作和高效管理等。

（三）建立对外产业投资基金

一是针对特定的区域（国家）、特定的市场设立若干类似中非发展基金的股权投资基金，直接对民营企业境外的项目 and 公司进行股本投资，基金可以采取国家、企业、银行、专业投资机构相结合的股权结构设计，实行商业化操作。二是设立对外并购基金（VC 或 PE），通过股权并购，在国际上获取知识产权、品牌、市场份额和资源。基金可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以民间资本为主，混合所有制形式，实行商业化运作，进行专业化投资。

（四）建立风险防范机制

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加快海外扩张的倾向，容易因扩张过快、消化不良而导致潜在风险。为避免金融机构在海外盲目扩张，防止在部分海外国家或地区出现过度集中和同质恶性竞争的现象，可探索成立由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外管局、工商联等有关单位组成的项目审查委员会及专家组等联席机制，对相关金融机构提出的海外投资或贷款项目进行预审与风险评估，建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以防控金融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可能风险。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 战略与对策研究

李罗莎

摘要：以自贸协定为标志的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贸和政治格局。中国正进行着自贸区国家战略布局。本文提出，把推动自贸区建设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压舱石、推进亚太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建设“一带一路”、发展跨洲自贸区，作为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把中国自主发展高标准自贸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或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与 TPP 融合、重点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努力构建中美自贸区、加快推进中欧自贸区，作为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途径。建议国家战略顶层设计与国内综合改革试验区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自贸区 自贸协定

作者简介：李罗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第三次浪潮，是以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自贸协定）为基础。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世界签署的自贸协定数量不断攀升，截至 2014 年 1 月，全球共签署双边或

区域自贸协定 583 个，正在实施的自贸协定 381 个，这些自贸协定构成了全球相互交织的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网络。常用的英文缩写 FTA，既可表示自贸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也可表示基于自贸协定的自贸区（Free Trade Area）。目前，全球 FTA 基本目标都是推动不同关税区间贸易自由化，短期目标是在世界局部形成不同关税区间共同产品市场。

当前，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几个重要自贸协定谈判，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日韩 FTA，这些自贸协定集聚了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一旦达成，对世界贸易规则、多边贸易体系、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以自贸协定为基础的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通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降低交易和流通成本，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二是通过促进国际投资，优化全球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三是成为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全球市场和产品生产一体化的重要步骤；四是可能导致世界共同要素市场和共同货币的产生；五是对世界政治格局将可能产生积极影响。

一、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针和自贸区战略

（一）大政方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通过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战略目标。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政方针是：坚持对外开放，继续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主动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扩大投资合作空间；开始在新启动的自贸区谈判中纳入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一是自贸协定；二是对外投资，中国已跻身世界三大投资国，累计签订了 150 多个双边投资协定；三是货币金融，中国与全球超过 20 个国家及地区央行和货币当局，签署了总规模超过 2 万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还在东亚“10+3”（东盟与中日韩）机制下推动共同（应急）储备库、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

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特点：一是不仅与亚洲和广大新兴经济体合作，也与发达大国强化贸易关联，不仅推动自贸区建设，也积极发展多种形式一体化合作，如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二是正由国际规则被动接收者，逐渐转变为规则修

订者和创设者；三是正由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优惠规定享有者，逐渐转变为公共产品重要提供者。

（二）自贸区战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从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到建设世界上最长、最具潜力的“一带一路”，中国正在进行着自贸区战略全面布局，开拓一条条全新的对外“大通道”，以更广泛的贸易投资对外开放，“倒逼”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

1. 自贸区建设总体情况。截至 2013 年底，中国正在建设 18 个自贸区（见表 1），涉及 31 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对外贸易总额的 1/3。其中，已签署的 12 个自贸协定，涉及 20 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正在谈判的 6 个自贸协定，涉及 22 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澳大利亚和挪威的自贸谈判，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和 RCEP 协定谈判，重点任务是推进中韩、中澳自贸区谈判。此外，中国还正在推进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2013 年，中国与东盟成员、新西兰、巴基斯坦、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等 15 个自贸伙伴双边贸易额达 475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比对全球出口增幅高出 4 个百分点。

2. 中韩自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韩国是第十四大经济体，中韩自贸区于 2012 年 5 月启动谈判。2014 年 11 月 10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北京举行会晤，在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下，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和韩国通商产业资源部部长尹相直，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结束中韩自贸区实质性谈判的会议纪要。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涉及贸易额最大、综合水平最高的自贸区。

就贸易而言，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家，韩国是第九大货物贸易国家，2013 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 2740 亿美元，而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作为全球前四大货物贸易经济体之间并无自贸协定，因此，中韩自贸协定是一个贸易额最高的自贸协定。协定涉及两国产品税目 90%、贸易额 85%都要实现自由化，即经过一个过渡期后都将降为零关税。且中方首次承诺，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方式开展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双方也首次在协定中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 17 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21 世纪经贸议题”，实现了“利益大体平衡、全面、高水平”目标。因此，中韩自贸区是一个综合水平最高的自贸区。

3. 中澳自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中澳自贸协定于 2005 年 4 月启动谈判，2014 年 11

表 1 截至 2013 年底中国自贸区建设总体情况

	自贸区	当前进展
已签署 协定的 自贸区	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及其补充协议	2003 年 6 月签署,2004 年 1 月开始实施,共签署了 6 个补充协议
	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及其补充协议	2003 年 10 月签署,2004 年 1 月开始实施,共签署了 6 个补充协议
	中国—东盟自贸区	2002 年 5 月启动谈判,2002 年 11 月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 年 11 月签署《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5 年 7 月实施。2007 年 1 月签署《服务贸易协议》,7 月实施。2009 年 8 月 15 日签署《投资协议》。2010 年自贸区如期全面建成
	中国—智利自贸区	2004 年 11 月启动谈判,2005 年 11 月签署《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货物和合作),2006 年 10 月实施。2008 年 4 月签署《中国—智利自贸区服务贸易协定》,2009 年实施。正开展投资谈判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	2005 年 4 月启动谈判,2006 年 11 月签署《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货物和投资),2007 年 7 月实施。2009 年 2 月签署《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服务贸易协定》,10 月 10 日实施
	中国—新西兰自贸区	2004 年 11 月启动谈判,2008 年 4 月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2008 年 10 月实施
	中国—新加坡自贸区	2006 年 8 月启动谈判,2008 年 10 月签署《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2009 年 1 月实施
	中国—秘鲁自贸区	2007 年 9 月启动谈判,2009 年 4 月签署《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2010 年 3 月 1 日实施
	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区	2008 年 11 月启动谈判,2010 年 4 月签署《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2011 年 8 月实施
	中国—冰岛自贸区	2007 年 4 月启动谈判,2013 年 4 月签署《中国—冰岛自由贸易协定》,2014 年 7 月生效
	大陆与台湾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2010 年 6 月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瑞士自贸区	2011 年 1 月启动谈判,2013 年 7 月签署《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2014 年 7 月生效

续表

	自贸区	当前进展
处于谈判阶段的自贸区	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	2005 年 4 月启动谈判, 已举行 20 轮
	中国—海合会自贸区	2005 年 7 月启动谈判, 已举行 5 轮谈判, 2009 年后谈判暂时中止
	中国—挪威自贸区	2008 年 9 月启动谈判, 已举行 8 轮
	中国—韩国自贸区	2012 年 5 月启动谈判, 已举行 12 轮
	中日韩自贸区	2012 年 11 月启动谈判, 已举行 4 轮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2012 年 11 月启动谈判, 已举行 4 轮
处于官方联合研究阶段的自贸区	中国—印度区域贸易安排	2005 年 4 月启动研究, 2007 年 10 月结束研究
	中国—哥伦比亚自贸区	2012 年 5 月启动联合可行性研究

资料来源：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

月 17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会晤，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和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长安德鲁·罗布，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实质性结束中澳自贸协定谈判意向声明。中澳自贸协定成为中国继中韩自贸协定后，与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的另一个全面、高水平自贸协定。

中澳经济互补性非常强，中国在制成品方面向澳大利亚出口相对较多，澳大利亚在基础原材料方面对中国出口相对较多。中澳自贸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十多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等“21 世纪经贸议题”。协定达成五年后，澳大利亚对中国进口全部产品关税都将降为零，中国对澳大利亚绝大多数产品关税最终降为零。在投资领域，目前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近 600 亿美元，是澳大利亚非常重要的投资来源地，双方在协定生效日起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审查门槛，增加企业投资市场准入机会、可预见性和透明度。在服务领域，彼此向对方做出涵盖众多部门、高质量的开放承诺。对澳大利亚关心的重点领域，中国已决定给予最惠国待遇。因此，中澳自贸协定实现了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目标，协定签署将实现两国经济优势互补和互利双赢。

二、中国国情与新型区域经济一体化高标准比较分析

（一）新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高标准规则要求

以 TPP 和 TTIP 为代表的新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致力于制定高于 WTO 标准“面向 21 世纪的规则”，成为推行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平台。谈判议题从边境措施延

伸到边境后措施，包括货物贸易完全取消关税，服务贸易和投资负面清单，还就知识产权、竞争、人权、劳工、环境、国营贸易、监管一致性等非传统贸易议题展开谈判。

新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高标准规则要求：第一，新贸易规则体系关注贸易品制造的所有环节，与新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相吻合，每个环节都成为未来贸易协定所涵盖的内容；第二，新贸易规则关注的不仅仅是贸易，而是“贸易—投资—服务”三位一体的融合，TPP是新贸易规则，TTIP是新投资规则，“诸边服务业协议”（PSA）则是服务贸易规则；第三，新贸易规则触角越来越多地伸向国内，国内市场准入条件及国内竞争环境等都成为新型国际区域一体化组织关注的议题。

（二）中国目前国情适应高标准规则要求还存暂时困难

中国目前现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在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和政府采购等“新议题”领域，适应高标准规则要求还有三个暂时困难。

第一，中国自贸区开放水平尚较低。中国货物贸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取消关税产品税目数和贸易量基本达到90%的标准，但在石化、机械、电子等重点行业大幅降税空间很小。在金融、电信、专业服务等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尚难接受负面清单管理。投资方面，中国还没有取消准入前国民待遇限制。

第二，中国在“新议题”上灵活性较小。如，发达国家提出劳工、环境、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等“新议题”，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小康社会有契合之处，但与中国现行体制、机制及相关法律存在冲突。

第三，中国政府一些部门利益和思想不解放仍为主要问题。一些政府部门由于部门利益和思想不解放或惯性思维而缺乏改革动力，使得中国现行体制、机制及相关法律改革停滞或拖延。

（三）高标准规则与中国深化改革目标一致

新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TPP、TTIP、PSA，诸多主张与中国深化改革目标一致。一是降低服务贸易壁垒规则。大力发展服务业恰是中国下一步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更加开放和充分竞争的市场有助于中国服务业大发展。二是“竞争中性”对国有企业限制和对中小企业发展促进规则。国有企业在若干竞争性领域退出及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也正是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重点。三是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则。中美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以及即将开始的中欧BIT谈判，都是中国准备实行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则的体现。总之，TPP、TTIP、PSA的诸多规则与中国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一致。历史经验证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的成功之道。当前，中国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试验TPP、TTIP、PSA规则的一项重大举措。

三、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一）战略机遇

第一，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贸易最具活力的地区，其对外贸易额占全球比重的 46%，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的 57%，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亚太区域合作和自贸区建设走在世界前列，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对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第二，中国是亚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截至 2013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60%是与亚太成员的贸易额，实际利用外资的 83%来自亚太成员，对外直接投资的 69%流向亚太成员。此外，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参与 APEC 的合作，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八个是 APEC 成员，2014 年 APEC 中国峰会提出了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路线图。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将为亚太地区创造巨大商机。第三，中国经济具备更大发展实力，物质技术基础更加坚实，城镇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政治优势充分发挥，这都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广阔道路。

（二）战略挑战

第一，全球化使几乎所有国家的收入分配趋于两极化，而自贸协定可能加剧这一趋势，由此决定了产业重组的必要性。重大自贸协定实施，一般使多数经济部门产值持续增长，但可能使少数产业产值下降，并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须采取相应政策措施来应对负面影响。第二，内部和外部经济必需达到再平衡。任何新自贸协定的实施，都要对内部和外部经济的不平衡做出实质性调整。第三，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资源环境约束日渐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科技创新能力亟待提高。

四、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

（一）战略选择

第一，支持 WTO 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双边贸易协定固然重要，但全球重大问题最好还是采取多边谈判解决，多边贸易协定更符合中国利益。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应坚持多边合作，支持 WTO 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尽快使多哈回合谈判回归正轨，可考虑重命名多哈谈判或开展 WTO 诸边全新谈判。积极推动通过多边谈判解决全球重大问题，包括网络间谍、汇率、劳工和气候变化等。此外，也可探讨在 WTO 多边框架下的诸边谈判，如 WTO “政府采购协定”（GP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信息技术协议”（ITA II）等。诸边往往就一项专门议题谈判，容易取得成功，也会产生迈向多边协定的推力。

第二，以开放态度参与新型国际区域一体化组织。当前，国际新型区域一体化组织，如 TPP、TTIP、PSA，在高标准规则制定方面走在世界前沿。这些高标准规则，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等“新议题”领域。中国目前国情难以适应这些“新议题”的国际高标准规则，但从长期和战略视角看，国际高标准规则对中国总体是有利的。因此，中国要以开放态度参与国际新型区域一体化组织，从而能更快地融入国际规则制定潮流中。如，TPP 核心规则为美式范本，其竞争中性原则、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此前中国自贸协定谈判均未涉及过，但中国积极主动开展中美 BIT 谈判，有助于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又如，TTIP 很大程度上受欧式范本影响，而中国将积极主动开展中欧 BIT 谈判，有助于熟悉欧洲协定范本。此外，中国还应积极主动参加 WTO 诸边贸易规则制定，如 GPA、ITA II、PSA 的规则制定。

第三，将推动自贸区建设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压舱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欧大国进行了转向注重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调整，美欧 TPP 和 TTIP 谈判，就是把发展贸易和自贸区建设作为其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载体。中国为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调整，维护自己发展战略机遇期，提出与美欧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实质是利益命运共同体，而发展贸易和自贸区建设则是成为利益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为此，中国应努力推进启动与美欧大国的自贸协定谈判，使自贸区建设成为构建中美、中欧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载体和压舱石。

第四，推进亚太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对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需求巨大，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加速推进亚太区域内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实现亚太区域内大市场、大联通、大发展，可以为亚太经济一体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014 年 APEC 中国峰会，围绕“共建面向未来亚太伙伴关系”主题，提出了建设“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和“亚太互联互通”重要议题，与 21 个 APEC 成员一起，加速推进亚太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共同构建亚太区域一体化繁荣发展美好蓝图。

第五，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应在稳固与东盟和 APEC 成员在亚太区域合作的基础上，与世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治体制国家和地区，积极发展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特别是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中之重，选择“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国家，如蒙古、俄罗斯等，应尽早商谈中蒙、中俄自贸协定，开启双边自贸区建设。

第六，积极发展跨洲自贸区。目前，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打破了狭义地域相邻概念，超越地缘界限跨洲区域合作日渐扩大，出现区域自贸区开始向跨洲自贸区发展的大趋势。自贸区地理空间迅速扩展，跨洲自贸区渐成风潮。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展跨洲自

贸区。如，选择恰当时机，与欧洲最大自贸区欧盟（EU），以及美洲最大自贸区北美自贸区（NAFTA），以单对多方式缔结 FTA，以便在世界经济格局变换中取得主动权。

（二）战略途径

第一，自主发展中国高标准自贸区。在新一轮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美欧通过制定贸易和投资高标准规则，建立高质量自贸区。这一趋势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来说，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适应。但毋庸置疑，不断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标准，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中国应通过自主发展高标准自贸区的战略途径，顺应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体系，加速提升已有自贸区标准。如，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在中韩、中澳、中加、中日韩等自贸区谈判中，以自主高标准姿态，取得自贸协定谈判实质性进展。

第二，加入 TPP 或积极推动 RCEP 与 TPP 融合。当前，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亚太成为各方利益争夺的焦点，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两条发展路径竞争和可能融合中，进入了关键阶段。一条发展路径是美国主导的 TPP “美国路线图”；另一条发展路径是东盟开启 16 的国 RCEP “亚洲路线图”。短期看，两条路径具有竞争性；长期看，两条路径具有融合可能性。中国应通过加入 TPP 或积极推动 RCEP 与 TPP 融合的战略途径，强化建设 FTAAP 的努力。首先，在加强与 TPP 沟通交流的基础上，中国适时提出加入 TPP，这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其次，在提出 FTAAP 路线图的基础上，推动 RCEP 与 TPP 两条路径融合，并轨为一个协定，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之一。

第三，重点建设 FTAAP。1994 年，APEC 领导人在印尼茂物会议上提出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与投资”目标，自此“茂物目标”成为 APEC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方向，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别不迟于 2010 年和 2020 年实现这一目标。2006 年，APEC 领导人将“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写入宣言中。2010 年，APEC 领导人将“10+3”、“10+6”（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TPP 确定为实现 FTAAP 的三种可能途径。中国应通过强化“茂物目标”具体落实，以我为主，提出启动 FTAAP 可行性研究、时间表和路线图，为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实质性贡献。

第四，努力构建中美自贸区。中美分别是当今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是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中美两国所具有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决定了中美关系是对全球格局和全球性事务具有重要影响的特殊双边关系，不仅事关两国和人民利益，而且对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具有重大影响。2013 年，中美两国元首习近平和奥巴马会见，决心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应通过努力构建中美自贸区战略途径，向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重要内涵。两国可先从 BIT 谈判开始，在适当时机，两国应明确构建中美自贸区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路线图既要强调全面和高标准目标，又要强调最大程度灵活性；时间表可以考虑为，2014 年两国智库联合完成可行性研究，2015 年两国政府启动正式谈判，2020 年达成中美 FTA。

第五，加快推进建立中欧自贸区。2010 年，欧盟公布以签署自贸协定为拓展贸易增长空间重要途径的新贸易战略。为此，2011 年以来，欧盟先后与韩国、香港、中美洲国家、秘鲁、哥伦比亚签署了自贸协定；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加拿大和日本正在进行自贸协定谈判；同时，筹划与独联体及埃及、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进行更全面的自贸协定谈判。约至 2015 年，欧盟与自贸伙伴贸易额将覆盖其对外贸易的 50%。中国应抓住欧盟实施新贸易战略的历史机遇，积极推动中欧自贸区研究，虽立即开展中欧自贸区谈判条件尚不成熟，但必须抓住机遇，加速推进建立中欧自贸区进程。

五、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国家战略顶层设计

第一，顶层设计的意义。应自上而下把控中国区域一体化方向和整体布局，回答中国自贸区发展战略问题，包括战略目标，实现战略目标日期，评估今后十年总体贸易前景及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地位，分析自由贸易协定对缔约国及地区其他主要部分、全世界的影响。

第二，顶层设计的方法。应选择一些各自独立的关键议题，把这些议题纳入新一代高标准自贸区协议文本。编制顶层设计清单可参考 TPP、TTIP 等新议题范围，确定哪些议题可纳入全面协定谈判，哪些议题内容可达成单独协议。

第三，顶层设计的内容。应包括：一是促进“10+3”尽快达成协议；二是促进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的“中亚自贸区”尽快达成协议；三是选择适当时机，推动“10+3”、中亚自贸区、南亚自贸区的合并谈判；四是积极关注亚洲与欧洲之间、亚洲与美洲之间大型 FTAs 协议动态，按照对中国有利、时机恰当原则，积极促成“亚欧自由贸易关系”“亚美自由贸易关系”形成；五是在亚欧、亚美两大世界自贸协议尚未形成前，积极促成亚欧、亚美有关关税主体间局部自由贸易框架，推进亚欧、亚美相互联络。

第四，顶层设计的重点。依据中国双边、区域自贸协定“依托周边，拓展亚洲，兼顾全球”的总体战略布局，亚太地区应占据顶层设计重点地位。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中国应对维护亚太地区经济繁荣稳定和政治安全尽自己的义务，同时也要发展自身经济，保证自身政治与社会稳定。目前，亚太各国顺应国际潮流，纷纷参与双边

或区域自贸协定谈判与签署，原有平衡格局被打破，新的矛盾与冲突出现，同时也出现新机会。中国应加强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政治经济联系，同时加强与美国的对话与沟通。

第五，顶层设计的策略。应采用渐进式，目标可以是一项协定或多项协定，可以作为单独协定，也可以作为未来更广泛协定的一部分。在分拆议题清单时，选择最可能实现的议题，采用建筑构件和踏脚石概念。而作为单独协定义题，更适合范围更广的多边谈判，而不纳入双边谈判。此类议题最明显例子是网络和汇率，应把这类议题归为单独协定内容。

（二）国家改革试验区实践

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服务贸易试验区等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为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探索新途径，更是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举措。要充分发挥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对“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先行先试职能。运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服务贸易试验区等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实现 TPP、TTIP、PSA 规则在中国境内先行先试，获取经验。

第一，积极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及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及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新型贸易投资规则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其难点在于负面清单的确定及相应的谈判。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实践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同时也能够为中美 BIT、中欧 BIT 及未来中美 FTA 谈判，提供重要经验。

第二，加快扩大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强调营造投资者平等准入市场环境，已成为当今贸易领域一个重要趋势。由于货物贸易进一步开放空间已很有限，21 世纪国际新型贸易规则无不将服务贸易开放作为规则制定的重要内容。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实践以服务业开放为重要内容，与当今世界贸易规则发展方向相符。

第三，重点创新金融监管制度。跨境融资自由化是国际投资规则强调的焦点。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在先行先试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等核心内容，并建立与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目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相继发布落实试验区总体方案支持意见，中国人民银行也正在形成试验区金融政策细则。

（三）强化战略顶层设计与改革试验区实践紧密结合

在新的国际背景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融入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改革开放，已从经济体制扩展到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文化体制，面临更加复杂、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局面。这个时期改革开放，更需要在局部地区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再全面推广。为此，2005 年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已经陆续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经济特区等一批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成为了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对策，就是要把国家战略顶层设计与国内综合改革试验区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实践经验，才能为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和目标，提供符合实际、正确有效、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和路径。

为强化顶层设计与改革试验区实践紧密结合，首先，应建立领导小组。建议由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统一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下设办公室，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联合组建。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同时负责强化顶层设计与改革试验区实践紧密结合，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其次，是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先行先试。对于一时看不准、吃不透利弊影响的重要规则，可配套及时调整和纠错机制，同时探索、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实施先行先试。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对于改革试验区在授权范围内任何改革和创新的先行先试，都应该授予“合法性”，这必将会大大减少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政治风险。

（四）加速中国产业与贸易结构调整

美欧是中国主要经贸伙伴，如果不能适应美欧发起的 21 世纪高标准新规则自贸区建设谈判攻势，中国将在未来与美欧合作甚至国际经贸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必须加速中国产业与贸易结构调整，提升产业高标准，积极适应发达国家贸易投资新规则。中国不应将美欧启动国际高标准新规则自贸区谈判视为威胁，而应将国际贸易投资高标准新规则出合作为压力、动力和机遇，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和贸易投资调整潮流中及早谋划和应变。

（五）促进国内服务业迅速发展和自由化

推进中国服务业迅速发展和自由化是项重大目标。这个目标实现可以是双边协议谈判内容，也可以通过 TISA 谈判进行。服务业自由化优先议题，可以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外国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和竞争政策等，而排除服务贸易壁垒应当采用“负面清单”方式，以及一个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

（六）深化新一轮全球价值链合作

全球价值链形成是各经济体贸易与产业分工合作发展到新高度的重要标志，也为贸易投资自由化深入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亚太地区是全球价值链分布范围最广、发展水平

最高的地区之一。中国应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营建有利于新一轮全球价值链合作的政策环境，致力于打通亚太地区供应链联接阻塞，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货物、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大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实现亚太地区共同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鸿：《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东亚经济合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2. 何永江：《竞争性自由化战略与美国的区域贸易安排》，《美国研究》2009 年第 1 期。
3. 谷源洋、郝忠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性选择》，《财经问题研究》2004 年第 2 期。
4. 王静、张西征：《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国际经济合作》2011 年第 4 期。
5. 东艳：《美欧借区域自贸协定做大文章》，《人民日报》2013 年 7 月 12 日。
6. 杨盼盼、何帆：《中国如何应对区域贸易谈判》，《当代世界》2013 年第 11 期。
7. 瀨能繁：《中国因素促美国与欧洲开启 FTA 谈判》，《日本经济新闻》2013 年 2 月 17 日。
8. 何帆、杨盼盼：《中国不应缺席 TPP》，《金融时报》（中文版）2013 年 6 月 18 日。
9.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韩美 FTA 协议》，www.motie.go.kr。
10. Deutsche Bank, 2013, “Economic Benefits of TPP Entry for China”, Deutsche Bank Markets Research.
11. Michael Froman, 2013,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the 21st Century”, Japan National Press Club.
12. Levin (D-MI), 2013, “Unveils Proposal on Japan-TPP”,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 Michael Froman, 2013, “The Ambitious Trade Agenda”.
14. Clayton Yeutter, 2013, “Yeutter and a TPP Timetable”.
15. Samuels International, 2012, The Nelson Report.

责任编辑：李蕊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及对策

程凤朝 刘 铭

摘要：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构建，随着企业制度改革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发展完善，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衍生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问题，并且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在深入分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广泛存在的股权结构失衡、董事会效能不彰以及权力拥有者与利益拥有者冲突三方面问题基础上，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混合所有制发展的要求给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股权结构 董事会 利益相关者

作者简介：程凤朝，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派出董事；
刘 铭，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发展部业务副经理。

一、公司治理理论基础

国内外实践表明，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是企业保持基业长青的根本。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经济发达体都高度重视公司治理问题，但是由于各国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过去、现在及将来都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通用的公

公司治理模式。我国由于国有企业转变为国有控股组织结构的时间较短，虽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与美、欧国家相比，在公司治理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如股权结构失衡、董事会效能不彰、权力拥有者与利益拥有者冲突等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以致影响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影响资本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解决这些问题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公司治理，从广义角度理解，是研究企业权力安排的一门科学；从狭义角度理解，是居于企业所有权层次，研究如何授权给职业经理人并针对职业经理人履行职务行为行使监管职能的科学。从实践来看，公司治理就是现代公司特有的一套制度体系，将董事会、管理层等公司各机构的权利、义务确定在合理范围内，以相互制衡，最终帮助公司各种力量达到对公司、对社会最有益的一种平衡状态。一个完整的公司治理系统应该具有多方面功能，涉及三会一层运转规程、激励约束机制、财务等信息披露制度，甚至公司破产机制等各个环节，以引导并保障公司各机构在被期望的道路上顺利运转。

二、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生活中，上市公司已经成为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一个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受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影响，绝大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大中型国有企业改组、改制而来，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在最近 20 年迅速发展壮大，但是资本市场发展至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仍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万德网统计，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合计市值占 A 股市值总额 22% 的前 10 大上市公司中，9 家为国有控股（详细数据见表 1）。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虽然同其他类型的上市公司一样，遵循我国公司法的要求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监事会，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但是上市公司并不等于现代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沿革与企业使命，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一些具有特殊性的突出问题。

（一）股权结构失衡

1. 国有股“一股独大”

国有股“一股独大”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整体经营效率偏低的制度性根源，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国家作为股东，为了保证其对企业的绝对控制力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保护影响企业市场化的进程。如政府作为其大股东经常通过行政等非市场化手段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人事任免加以影响，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的基本要求始终悬而未决；在上市公司经营不善、濒临退市或者因为想得

表 1 前十大上市公司（按市值）

证券简称	总市值（亿元）	类型	占 A 股市值比（%）
中国石油	14257.33	中央国有企业	4.35
工商银行	12408.37	中央国有企业	3.79
建设银行	10175.45	中央国有企业	3.11
农业银行	8087.37	中央国有企业	2.47
中国银行	7547.45	中央国有企业	2.30
中国石化	6190.17	中央国有企业	1.89
中国人寿	4395.16	中央国有企业	1.34
中国平安	3272.56	民营企业	1.00
交通银行	3185.87	中央国有企业	0.97
中国神华	3094.82	中央国有企业	0.94
合计	72614.56		22.17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到配股资格而需要重组时，作为股东的政府往往通过行政手段为上市公司提供种种政策便利。此外，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中对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和转让进行了严苛的规定，严格而漫长的审核批准流程影响潜在受让方的积极性，导致国有股权长期集中在国有企业法人手中。

其二，国家作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出资人难以直接管理企业，往往是通过授权一个机构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但因为缺少有效监督及信息不对称，被授权的行政机构或者国有企业法人缺少履行股东的权利与义务的积极性，也缺少有效履职的方式，从而形成出资人权责履行“缺位”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在对企业进行管理时过于行政化，管的过宽、管的过深，出资人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监事会、经理层和党组织的权责边界十分模糊，公司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混为一谈，不仅党组织作用难以发挥，《公司法》赋予董事会的权限始终不能落地。如此使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2. 中小股东消极履职

对比国有股“一股独大”，公众股权则高度分散于诸多个人股东之间。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个体私人股东所持股份与国有股份相比显得“微乎其微”。受股民价值观的影响，个人股东往往只关心股利分配和股票涨跌，如此悬殊的股权持有差距及个人股东的投机心理，使个人股东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缺乏有效的控制力与履职的主动性，缺少参

与治理公司的热情。他们通常只通过观察股票价格波动，抓住时机卖出股票以获得增值的资本或减少损失，对于股东大会则具有强烈的“搭便车”心理，除了获取可能影响股价的最新信息外，个人股东便没有其他参与股东大会的动机。为了节约较高的履职成本，经常会出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仅有国有股东和社会法人股东参加的情形，甚至只有国有大股东参加的股东大会也是时有发生。

（二）董事会效能不彰

董事会作为把提供资本的股东、债权人、客户、员工及经营层联系起来的关键纽带，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从表面上看，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虽然形成了“三会一层”分别行使最终控制权、经营决策权、监督权与决策执行权的治理机制，但是从实践情况看，由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严重不合理现象，在其现有公司治理模式下，董事会的作用得不到切实的发挥。

1. 执行董事过于强势，削弱了治理结构的制衡作用

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条件下，国有大股东毫无疑问地成为股东大会的最终决策者。出于“强化控制、便于管理”的目的，其往往“指定”董事任职经营层的重要岗位，董事长被冠以执行董事的头衔，是事实上的行政一把手，总经理、副总经理甚至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行政管理人员部分也是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作为获得国有大股东支持又贯穿董事会与经营层的当事人，掌握公司实际控制权固然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但如此“优越”的条件也使其轻易主导着董事会，把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变成了几个人说了算，甚至“一言堂”的“行政机关”。同时，由于岗位重叠以及权力重叠，易使当事人混淆对所担任的几个角色的职责边界，进而出现上市公司运营过程中责任边界混淆；这样就会出现由于管理层决策失误导致公司出现重大损失时，不能够清晰地界定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现象，较大地影响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在同样存在执行董事的美国企业中，执行董事比例一般较低，例如，在花旗集团 14 人的董事会中，仅首席执行官（CEO）米绍（Michael Corbat）一人为执行董事，并且不在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兼任任何职务。对比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一般近 1/3 甚至半数为执行董事。过多的执行董事大大削弱了董事会、经营层与股东大会之间相互制衡机制的作用，形成了“内部人控制现象”。同时，这样的“内部人”多由国有大股东选择，而受国有企业人事管理惯例的影响，对执行董事的选择往往依据一定关系选拔，在对公司做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出现“一边倒”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决策的客观公正性。

2. 独立董事过于弱势，应有作用未充分发挥

独立董事缺少独立性。独立董事的聘任通常是由大股东推荐或由大股东控制的董事

会推荐，更有很多因特殊目的被拉来的“情谊董事”。这样名义上的独立董事而实际上的不独立，使得独立董事在做公司决策时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同时，由于独立董事薪酬过低，又缺少相关的有效激励机制，使得独立董事缺少尽心履职的积极性。如下表所示，无论在哪种行业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都较低，远小于薪酬前三名的执行董事薪酬与薪酬前三名的高管薪酬。

表 2 A 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单位：万元）

行业	独立董事报酬	前三名执行董事平均报酬	前三名高管平均报酬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5.46	47.19	51.43
保险	17.00	46.00	44.11
材料	6.03	46.13	49.12
电信服务	11.14	84.67	80.94
多元金融	11.45	182.64	186.29
房地产	7.93	84.73	91.35
公用事业	6.22	40.42	48.21
技术硬件与设备	5.86	51.41	56.83
家庭与个人用品	11.25	34.32	30.07
零售业	6.16	65.44	67.04
媒体	6.53	58.41	65.52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6.37	53.39	56.65
能源	8.98	52.73	57.55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6.46	50.01	55.24
软件与服务	5.82	51.37	55.59
商业和专业服务	6.43	57.19	54.68
食品、饮料与烟草	5.94	47.54	56.53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	7.54	46.84	65.34
消费者服务	5.79	51.36	56.45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6.85	48.36	60.28
银行	27.50	143.17	227.29
运输	7.60	48.91	61.34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6.31	65.35	65.19
资本货物	6.03	45.23	49.35
总计	6.70	56.98	62.49

数据来源：根据上市公司 2013 年年报披露信息整理。

独立董事缺少必要的专业化知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上市公司运行面临许多不确定性，上市公司要良好地运行，公司管理人员需具备相关的、必要的专业化公司治理知识，才能做出既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又符合公司发展前景的有效决策。但是，当前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一般是社会知名人士，缺少公司治理方面的专业化知识，使得其难以对公司相关决策给出合理的评估和正确的建议。此外，独立董事往往身兼数职，使其一年中只有十几天或者更少的时间花在上市公司的运营情况、市场趋势的了解与分析上，不了解所任职的上市公司，使这些独立董事很难提供有价值的专业意见。除了上市公司自身在选择独立董事时的盲目之外，我国法律也并没有给独立董事的专业化制定严格的标准。

独立董事缺少多元化。受我国规章制约，目前国有控股上市独立董事只能聘请大专院校、中介机构非领导人士，而对一个需要法律、财务、估值、风险、投资、战略等各方面知识的上市公司来说，这样清一色的结构很难做到决策的科学化。

3. 董事会信息获取渠道不畅

现实中广泛存在信息不对称，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或者增加信息的流畅，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减少经理人的寻租行为。同时，保持信息的流畅也是公司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的“大脑”，必须对上市公司内外部信息保持充分了解，才能做出符合本公司情况的正确决策。董事会可以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内部与外部渠道获得公司经营活动、管理方式、面临风险等方面信息，不仅能保证董事会决策的正确性，也可以通过诸如非正式沟通等形式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但是，细观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信息获取方面的状况，会发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国有股东招聘市场化的股权董事，委派其在控股机构担任董事并全日制坐班，要求其定期听取经营、风险、资产负债等情况汇报，并为其在遇到法律、财务、估值等难题时提供必要且及时的援助，以便其履职。另一种则是采取聘请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平时对非执行董事在企业的时间、贡献等无特殊要求，仅在开董事会及专业委员会时出席。企业在对待此类董事时，除开会资料外，基本不会提供其他信息，谈不上与管理层的沟通，更谈不上与债权人、客户和员工的交流。显而易见，第一种情况更为科学，但是除了中央汇金公司在向控股企业派出董事时采取第一种做法外，大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仍采取第二种做法。

4. 并不积极的董事会文化

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给公司带来好的经济回报以及发展前景。公司治理的重中之重是董事会治理，董事会治理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则是被称为软实力的“董事会文化”。健全的董事会需要积极向上又行之有效的董事会文化。所谓董事会文化是指董事会的核心价

价值观、董事行为规范与限制性行为。而文化的践行离不开董事个性的“张扬”，因为董事充分表达代表个人职业判断的意见，才有利于全面的分析决策事项，做到科学决策。但是，纵观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事会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缺点，即融洽有余，异议不足。由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特殊性，执行董事一般都是党委成员，重要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通常都需要党委会讨论通过。所以，董事会召开时，执行董事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股权董事虽积极发言，但是基调也基本一致，独立董事由于信息获取不如前两类董事那么充分，所提建议也比较有限。几方面原因综合，导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事会运行缺少活力，难以形成开放、积极、个性张扬的董事会文化。

（三）利益相关者之间冲突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公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企业价值观。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于企业存在意义的认识也千差万别，模糊的公司治理目标影响其经营管理活动的方向与准绳，最终影响其与利益拥有者之间的和谐共处，这也是近几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权力拥有者与利益拥有者之间冲突频现的主要原因。

1. 权力拥有者与中小股东之间冲突

权力拥有者与股东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体现在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蚀方面。由于缺少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国有股份“一股独大”条件下，中小股东的利益容易受到大股东控制下的董事会与经营层的侵蚀，小股东自身利益很难得到保护。

2. 权力拥有者与债权人之间冲突

权力拥有者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表现在对债权人利益不能给予必要的保护。在企业持续经营时，由于权力拥有者在国有控股股东的强势掌控下，控制着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债权人很难取得完整、有效、及时的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同时，相比于债权人，权力拥有者具有信息上的优势，从而可以获得信息租金；权力拥有者同时又具有从事道德风险项目的倾向，例如从事高风险项目、进行资产替代等。尤其是当上市公司需要进行债务融资或者要求上市公司支付利息或归还债务时，债权人可能依据企业所提供粉饰后的信息作出错误决定，从而致使自身利益遭到侵害。此外，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赋予债权人如同出资人一样的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债权人不能同德国等国家的债权人一样占据董事会席位，也大大削弱了其对企业的管理需求的实现。

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破产时，债权人的利益更容易受到侵害，因为债权人难以全面了解企业的的经营状况，同时我国《破产法》对企业由于资不抵债而破产的时间未进行限制，致使债权人可能因不了解本来已达到破产边缘的企业的实际情况而未提出破产申

请，企业在权力拥有者的控制下又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申请破产的情况下，企业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债权人损失扩大。即便是债权人申请破产，其在后续的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合法权益也难以实现。

3. 权力拥有者与员工之间的冲突

关于员工利益，虽然在《公司法》中规定了应该依照《工会法》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公司应该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在改制和其他重大事项决策时应就与职工相关事宜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听取职工意见和建议。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工会仅有建议权，并没有被法律赋予必要的决定权和否决权，工会对相关事项的讨论常沦为“走过场”，很难征求到不同意见，职工董事在行使权利时亦面临同样问题。除此以外，职工很难有机会与途径表达诉求，所以在与董事会、经营层为代表的权力机构发生利益冲突时，利益受到侵害。

4. 权力拥有者与客户之间的冲突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通常都由大型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在计划经济商品供不应求的时代根本不需要考虑客户的诉求，企业管理者习惯性地漠视客户利益。虽然经济制度发生改变、企业市场化进程加快，但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依靠行政力量赋予的优质资本却被完整地继承下来，故而常在所处的行业处于垄断地位。更有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因所处的行业较为敏感，受到政府的政策保护而形成较高的行业壁垒。正是这种缺乏有效竞争的市场，使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权力拥有者不懂得设身处地地为客户着想，产品开发、更新速度慢，服务意识较为低下，在重大事项决策及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漠视客户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

虽然近年来在监督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要求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已经认识到与高度市场化的企业在服务意识上的差距并逐步改进，但是客户利益被侵犯的案例还是屡有出现，并且广大消费者在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纠纷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没有平等的话语权，不得不借助媒体或使用极端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客户的利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声誉也在负面舆论中被损害，形成“双输”的局面。

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建议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精神，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其良性发展是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当务之急。

（一）“多管齐下”优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1. 股东权利行使去行政化

从 2013 年末开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政府作为股东的行为，使其正确行使股东权利。政府作为股东时应充分认识自身的权利与义务，摆正自身作为股东的位置，避免将企业视为是“下级单位”，通过行政手段对其经营管理进行干预，而是按照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改变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通过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经济主体。在此基础上，理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关系，上级党组织和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重点管理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党组织，探索由规范运作的董事会管理经理层、决定经理层成员的聘任或者解聘、考核评价及报酬等事项。特别是企业中的党组织要把握定位，支持董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而非业务管理作用。

2. 引入民间资本和战略投资者，发展混合所有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问题，突破性地提出，“认真研究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政策措施，根据放宽市场准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要求，推动企业在改革上市、兼并重组、项目投资等方面，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和战略投资者，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民间资本及战略投资者比国有股东更为坚持价值投资，比社会公众股东更为重视公司治理，且对公司治理有深刻的理解，适当地引入可以督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重视公司治理，提高运营效率，进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但是，引入民间资本及战略投资者并不是无条件的。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来说，应该努力增强自身管理经营与业务发展水平，以期增强实力雄厚的民营资本及战略投资者的投资意向。

仍以市值排名前 10 的上市公司为例，9 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均在 75%（见表 3），而同期 A 股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程度均值约为 58%。在如此的股权结构下，策略性地适当转让部分国有股权，不仅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而不会动摇国有控股的根本地位；更可以让利于民，使广大私有资本共享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红利；同时替换出的国有资金可补充养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总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适应市场化改革需要，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推动产权流动和重组，吸收民间资本和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一举多得，意义深远。

3. 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

对于机构投资者，应该通过积极递交股东会议案、委托投票权争夺等方式充分、合理使用股东职权，影响上市公司重大事项决策，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表 3 市值前 10 大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

证券简称	股权集中度(%)	类型
中国石油	98.07	中央国有企业
工商银行	97.19	中央国有企业
建设银行	97.37	中央国有企业
农业银行	94.62	中央国有企业
中国银行	97.40	中央国有企业
中国石化	95.70	中央国有企业
中国人寿	94.82	中央国有企业
中国平安	33.44	民营企业
交通银行	75.98	中央国有企业
中国神华	92.12	中央国有企业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从而获取长期收益。对于上市公司本身，则应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重视。机构投资者作为坚持价值投资为导向，并重视公司治理的重要股东，比国有控股股东和公众股东具备更丰富的管理经验、更市场化的理念。主观上接纳机构投资者，积极征求并听取其关于公司运营管理方面的建议，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及上市公司本身的长期利益，且相对于控制权市场能显著减少社会资源浪费。

（二）重构董事会

1. 优化董事会结构

目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执行董事比例过高、外部董事来源单一等问题，使董事会对经营层的选聘和监督几乎变成了理论上的一厢情愿，也使董事会很难从外部董事中获得全面、科学的决策建议，因此调整、优化董事会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降低执行董事比例。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保留一定比例的执行董事是必要的，但是为避免执行董事依仗占有董事席位的优势，通过利于所代表的大股东或经营层利益的议案，给其他股东或公司带来损失，应完善《公司法》中关于执行董事的规定，限制其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如董事长不可由执行董事担任，执行董事不应在专业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等。

关键岗位分设。对董事会及经营层的关键岗位要严格执行分开设置，尤其是具有法

人代表权的董事长与具有最高经营执行权的总经理不能由同一人担任，以保证两个岗位的相互独立，降低执行董事对董事会的控制力以加强董事会与经营层之间的独立性。

鼓励多元化的独立董事。如前所述，现有独立董事的来源过于单一，拓宽独立董事的选聘范围，可以为董事会提供更全面、更为市场化的信息，更有效地帮助或引导董事会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提升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经营层等机构的战斗力，同时也使其联系更为紧密。如借鉴美国、新加坡、香港已有的实践经验，离开公务员队伍或国有企业的人员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担任独立董事，以充分利用其丰富的管理经验与过硬的职业素养。

此外，可考虑股权董事的职业化，使其将董事工作作为主业，集中精力研究公司治理，提高专业性与职业性。

2. 提高董事会质量

提高董事会质量需要从提高独立董事独立性与专业化、完善独立董事激励约束机制及建立对董事的问责机制等几方面进行。

提高独立董事独立性与专业化。一是政府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上市公司，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独立董事聘任机制，保证独立董事产生程序的独立、合规。二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也应该摆正对待独立董事的态度，理性看待独立董事这一角色，选择在各个领域具备专业知识的多元化的独立董事，将其作为上市公司的智囊团，运用其专业知识、丰富经验与先进的思想指导企业决策，监督企业行为，使独立董事回归其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发挥其应该起的作用。

完善独立董事的激励约束机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应当建立并完善独立董事的激励约束机制，不能简单地以“年薪制”笼统而论，而应当把独立董事的薪酬同公司绩效联系起来，以增强其认真履职的积极性，减少其渎职的可能性。同时，应当根据公司相应的管理制度、独立董事的性质，建立科学的独立董事管理制度。

同时，完善董事消极履职的问责机制，情节轻微的可以通过董事再培训提高其对自身权责的认识，强化其履职的积极性与有效性。对于董事因消极履职已经给所任职的上市公司或股东造成经济损失或名誉损失的，则根据损失大小决定是否取消其董事资格，并要求其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情节严重的则对董事个人提起法律诉讼，以最大限度挽回上市公司与股东的损失。

营造独立正直、平等参与、积极开放的董事会文化，并影响管理层的决策和执行行为，最终形成企业全体员工共同认可的统一价值观，提高企业凝聚力与战斗力，真正做到将文化转化为生产力。

3. 保障董事信息渠道的通畅

规范管理层向董事汇报的频率与途径，并保证董事根据需求不定期要求企业就特殊问题进行说明的必要权利，确保董事可以深入到公司的最底层，了解业务的实际情况及普通员工的诉求，以便助其解决经营管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对于董事会成员与管理层的非正式沟通，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手段加以保证，例如，每周或每旬定期共进早餐，基于共同爱好的聚会，不定期地进行电话问候等等，同时注重沟通的话题需富有实质性而非礼节性的问候，对董事会提高决策与经营层提升执行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构建和谐的多方关系

1. 政府通过法律引导企业树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目标

鉴于目前我国并未形成完整的股东、债权人、员工及客户等利益拥有者的社会保护机制，且对董事会、经营层等权力拥有者的内外部监督也并未起到充分、有效的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仅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容易激化上市公司权力拥有者与利益拥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故而应该树立全面、科学的公司治理目标，以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最终促进企业和谐发展。首先，应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相关者利益均衡这一公司治理目标；其次，就股东、债权人、员工、客户利益制定较为详细的保护机制，就董事会与经营层的权力制定严格的限定条件。

对于债权人利益保护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完善企业破产制度，使在企业破产程序内对债权人的保护条款更具操作性，避免形式化、表面化，以便企业可以“不打折扣”地严格落实。二是建立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如企业在对影响债权人根本利益的重大事项进行讨论或决策的时候需征求相关债权人的意见，允许主要债权人（商业银行等）派出代表列席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保证债权人对企业必要的监督，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三是完善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督促债务企业对债权人定期提供企业经营的基本信息，并负有保证所提供信息及时、准确，以及接受债权人就企业运营情况、资产状况及偿债能力等相关信息的质询与监督的义务。

关于员工利益的保护则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是保证职工参与企业管理途径的畅通，借鉴德国先进经验，引入职工董事概念，合理确定职工董事任职的基本要求以及董事会中法定职工代表的最低比例，保证职工可以顺利参与企业管理。二是提高职工代表大会的地位与话语权，赋予职工代表大会关于员工根本利益的重大事项的投票权，而不仅仅是建议权，促使企业提高对员工利益的重视程度，缩小管理层与员工所代表的利益可能存在的分歧。三是完善员工激励约束机制，广泛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制定完善的激

励约束机制，使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紧密联系，调动员工积极性，促使其为与企业共同的愿景而努力工作。

相较对债权人及员工利益的保护，目前我国对于客户利益的保护更为薄弱。所以，对客户利益的保护则在更大程度上依靠法律的强制性，需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强调忽视客户利益后果的严重性，为企业划定清晰的行为边界。同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作为人民的企业不应仅靠法律约束自身行为，更应该从主观上自发地重视客户，将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产品作为企业一切经营管理活动决策的前提，以期达到买卖双方共赢的良好结果。

2. 关注企业伦理建设，重视权力拥有者与利益拥有者的均衡发展

我国企业从 30 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开始真正进入市场化经营时期，到现在培育出多个可与世界知名企业比肩的民族企业，发展不可谓不迅速。如此迅速的发展，对我国企业来说是成就也是风险，既显示了我国企业超凡的成长潜力，也使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深层问题过早地暴露出来，脆弱的企业伦理意识便是其一。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一般处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客户群体庞大，一旦企业伦理建设不当，造成利益拥有者的关系失调，进行纠正或者关系重建的成本高昂。同时，由于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处行业较为敏感，市场化程度较低，受政策保护，其企业行为在社会公众心里一定程度上体现政府或国有大股东的意志，出现企业伦理问题后更易经过舆论渲染激发社会公众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政府的负面情绪，严重影响企业发展甚至社会稳定，得不偿失。故而遵循道德规范、构建适合企业的伦理体系，不仅可以有效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也能有效平衡企业的短期利益与中长期利益关系，在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支持的同时，利于构建和谐的市场与社会。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问题是在社会经济、资本市场及社会公众意识的逐渐成熟中逐渐凸显的，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法律环境逐渐完善及现代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等变化而愈显复杂，所以，对待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也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阿道夫 A 伯利、加德纳 C 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2. 宁向东：《公司治理理论》，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0 年版。
3. 冯根福：《关于健全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几个关键问题与思考》，《当代经济科学》

2001 第 6 期。

4. 余颖、唐宗明、丁亚明、余和平：《公司治理：本土企业的解决方案》，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席酉民、赵增耀：《公司治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6. 薛有志等：《执行董事、多元化程度与公司绩效的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0 年第 4 期。

7. 叶德磊：《公司治理：基于国内文献统计的一个研究评述》，《管理学家·学术版》2012 年第 12 期。

8. 王国亮：《基于组织效率与风险的我国国有独资公司治理模式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出版社 2011 年版。

9. 仲继银：《董事会与公司治理》，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 年版。

10. 周瑜胜：《公司控制权形成、特征、作用及转移：结构与嬗变——国内研究透视与展望》，《经济研究导刊》2012 年第 6 期。

11. 蔡吉甫：《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关系研究》，《产业经济研究》2007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上接第 60 页）

第二套组合拳：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大中亚地区探讨自贸区、双边投资协定、区域与次区域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议题时，都可以将基础设施投资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纳入一并考虑。一方面，我们的国际协定要积极为亚投行开拓和创造业务机会。另一方面，亚投行在境外也要和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商业银行以及中国的国有与民营企业密切合作，通过团队作战来促进区域经济整合，更好地服务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第三套组合拳：将亚投行的发展和全球金融秩序中谋求更大话语权的其他努力结合起来。将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发展好，并在未来择机扩大两家银行的资金规模，进一步提高二者的投资能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在继续坚持谋求 IMF、世行和亚行的改革之外，进一步扩大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资金规模，向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版 IMF 目标迈进，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责任编辑：李蕊

加快推动两岸中小企业交流合作

——第五届两岸中小企业合作发展论坛综述

周小柯

摘要：2014年9月17日—18日，“第五届两岸中小企业合作发展论坛”在河北邯郸冀南新区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200余位产官学研各界专业人士参会。推动两岸中小企业交流合作对深化两岸产业合作、促进两岸经济蓬勃发展以及增进两岸人民福祉有深远影响；两岸中小企业交流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面临一些需要克服的现实问题，总体上合作发展前景广阔；休闲文创和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和节能减碳以及农业生物技术和医疗养护等产业，将是两岸中小企业合作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两岸中小企业 交流合作 发展

作者简介：周小柯，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一、推动两岸中小企业交流合作意义重大

“第五届两岸中小企业合作发展论坛”顺应台资由大陆沿海地区向中原地区转移的趋势而设立，已展示两岸产业在大陆中原地区合作发展的新契机，为两岸中小企业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搭建了优质务实的平台，深得广大中小企业的肯定。

海协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郑立中认为，中小微企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生力军。2010 年，两岸两会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为两岸经济合作奠定了制度基础。当前正值中国大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两岸中小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抓住机遇、锲而不舍、改革创新、精诚团结，实现互利双赢，共同为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不懈努力。

台湾中华两岸企业发展联合会总会荣誉总会长、台湾工商企业联合会理事长赵守博认为，中小企业如何更好发展是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台湾，中小企业是经济的骨干和命脉；在大陆，中小企业如果能够更加蓬勃发展，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创造的庞大经济力量和经济建设成果一定可以让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农村地区的每一个民众分享，可以为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提供更多好的就业机会。

台湾财团法人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执行长陈德昇认为，两岸中小企业合作具有非常高的战略意义。台湾的发展经验表明，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所得分配和就业效果非常明显；中国大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如果要解决分配问题，仅靠转移支付效果有限，促使中小企业健全、持续发展，对中国大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两岸中小企业合作发展前景广阔

陈德昇认为，两岸中小企业各有优势，具有强强合作的特性。随着时间推移，大陆在资金和土地资源等方面是强项；台湾在管理和竞争能力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推动两岸共同市场，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开展两岸产业合作，更重要的是促使两岸企业携手“走出去”，共同创造品牌，开拓国际市场。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副司长韦向群认为，两岸中小企业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台湾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中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在电子、信息技术、工业设计等领域具有管理、技术开发和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经验；大陆近年来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减轻企业负担、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 2014 年实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以后，新注册中小企业出现了井喷式增长。近年来，大陆经济不断增长、市场不断开放以及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为两岸中小企业的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下一步，大陆还将继续不断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为两岸中小企业的合作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经济局局长徐莽认为，进一步推进两岸中小企业合作，离不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面，只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保持前进势头，两岸中小企

业合作的空间和环境才会越来越好；两岸中小企业合作也离不开大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随着大陆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企业发展的法制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等会进一步改善，使得两岸中小企业合作势头更强、前景更加美好；同时还需要两岸企业界朋友真诚合作，有信心、有互信、有诚意，不断通过交流增进了解，明确合作方向。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秦志辉认为，两岸中小企业合作面临三个方面的新形势：一是转方式、调结构成为各经济体的主要任务，两岸都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且在规划发展方向上有很多是一致的，未来合作空间非常大；二是携手合作是各经济体实现持久发展的现实动力和必然选择，两岸同根同源、地域相近、语言相通、资源互补，携手并进为彼此的发展转型提供了良好契机；三是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成为时代的主题，大陆中小企业在制造领域具有良好基础，但在管理和市场拓展方面存在不足，而台湾中小企业恰恰在这方面有其多年形成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因此在创业创新背景下，两岸要素禀赋可以实现互补。

三、两岸中小企业合作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陈德昇认为，两岸的企业文化存在差异，经营策略有所不同，还面临体制和人员上的矛盾；台湾中小企业不仅仅需要优惠政策，更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这些方面，两岸政府部门和企业界可以作出更多努力，让来自法制层面、文化层面的困扰得到克服，两岸合作会更加顺利。

法蓝瓷集团总裁陈立恒认为，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时代才是中国人的时代。然而，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2012年全球文化市场中，美国占43%、欧盟占34%、日本约占10%、韩国占5%，两岸文化产品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比重还很低。让两岸文化产品走向世界，需要两岸中小企业合作来推动。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两岸文化创意产业自贸区，同时做好两岸该有的法制规范，让物财权得到保障，让市场渠道更顺畅，让行政体系发挥更大的帮助作用，两岸连接1+1肯定会大于2。

秦志辉针对两岸中小企业进一步合作发展面临的宏观瓶颈，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加强专题调查研究。包括针对有关政策或重要议题进行专案研究，作为拟定中小企业辅导政策的依据；加强两岸中小企业交流合作总体规划、信息统计和综合分析等工作；对两岸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调查与统计分析，建立合作服务体系。第二，积极构建两岸中小企业合作交流平台，一是加强两岸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二是借鉴台湾模式，建立企业互动网络，提供两岸中小企业策略联盟、同业合作以及异业交流的契机；三是定期举办两岸中小企业跨行业的交流活动。第三，共建中小企业合作园区，

推动两岸中小企业集聚发展。

台湾屏东商业技术学院教授、中华青年创业协会总顾问郭冠樟提出并阐述了建构两岸中小企业创业孵化体系。他认为，台商在研发创新、管理能力和行销能力方面具有优势，两岸可以采取减少重复投资、加强金融和物流支持、制定共同行业标准、构建创业孵化平台等策略，实现双赢。构建两岸中小企业创业孵化体系，一是共同组织华商协会，二是成立两岸投资的教育训练中心，三是协助企业拓展实体流通网络，四是协助企业善用虚拟网络。

四、两岸休闲文创和现代服务业的合作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化》杂志副主编王晓红认为，休闲文创是两岸产业合作的一个重点领域，也是彼此思想火花碰撞最多的一个领域；两岸血脉相通、文化相通，共同弘扬中华文明也主要体现在文化上。随着大陆以自贸区为代表的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将进一步提高，未来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在大陆发展或者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相互投资与合作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机会也越来越多。两岸文化创意企业可以联手共同开辟国际市场，这既是促进两岸文化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可行路径。

台湾兴国管理学院财经法律学系主任李礼仲认为，现代经济已进入创意主导和提升经济发展的创意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经济部门。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2003 年，欧洲文化创意部门收入总额 6540 亿欧元，超过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 5410 亿欧元；欧洲文化创意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经超过房地产业、化学相关产品业；1999 年—2003 年，欧洲文化创意产业部门产值的成长率为 19.7%，比同期欧洲经济发展高出 12.3%。

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经济社会编辑室副主编于春晖认为，大陆文化创意产业面临几个方面的“势”：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常态，7%~8%的区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速；二是产业结构的新变化，从 2013 年起第三产业超越第二产业，意味着工业化已经从中期向中后期过渡；三是巨大的市场需求，目前大陆人均 GDP 已经超过 6000 美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文化休闲和创意产业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四是文化资源丰富，两岸同源同根，有历史悠久、绵绵不绝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源非常丰富；五是人才资源丰富，两岸年轻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既对文化休闲娱乐有需求，又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活力，是两岸合作发展文化休闲产业的

宝贵资源。上述大趋势下，两岸携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有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基础，还有市场需求支撑和人才资源保障，前景非常光明。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贸易》杂志副主编郭周明认为，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以来，大陆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目前仍面临一系列发展困境和现实障碍。发展困境方面，一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二是文化产品总体上的竞争力不足，文化产业贸易结构性逆差严重，出口主要集中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或创意密集型产品处于持续逆差状态；三是物质实力明显提升，但文化软实力还明显不足。现实障碍方面，一是文化管理思维和体制还比较落后；二是集聚优势不明显，发展文化产业园区的经验不足；三是文化审批比较多且比较严格，如何在文化安全维护与创新力激发之间形成合理平衡，是一个现实问题；四是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政策支持体系；五是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六是产业链条短且创新不足；七是文化人才储备不够，缺乏国际化、高精尖的文化创意人才。面临新的形势和现实困难，要更好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有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要两岸联合。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创意、研发、管理和国际化行销等方面的优势，大陆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市场优势和潜在人才优势，未来发展需要两岸联合，共同传播中华文化，同时实现企业家经济和价值追求。

台湾中华证券柜台买卖中心委员王智弘认为，资金来源是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传统的合法融资渠道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政府补助也远远不够。台湾2014年设立了“创柜版”，主要目的就是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和能量协助中小企业发展。利用这个平台，一方面可以让文创企业接触资本市场，学习成本管控；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台湾文创企业“走出去”，包括与大陆文创企业联合开辟国际市场。未来两岸中小企业在休闲文创及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合作发展，可以遵循“四个方法、三个阶段、一个目标”。四个方法：一是寻找合作方向，以两岸能互补的项目优先；二是寻找创意题材，通过集中焦点凸显主题；三是寻找有效做法，使创意融入人们衣食住行及娱乐等日常生活；四是寻找资金，即通过现有渠道和资本市场获得资金。三个阶段：一是发想阶段，即积极发挥，构想出不同创意；二是发现阶段，即从众多创意中发现能够合作的机会；三是发展阶段，即将合作机会发展为商机。一个目标，即实现“两岸企业一家亲、携手发展百业兴”的目标。

五、两岸装备制造和节能减碳产业的合作发展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台资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明认为，两岸在装备制造及节能减

碳领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装备制造业在两岸都是产业规模大、产品种类多的骨干产业，而且两岸之间发展的层次性比较明显、互补性强，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节能减碳是两岸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大陆当前整体上的节能减排压力很大，将台湾的绿色节能技术与大陆的节能减排需求相结合，对现有产业进行改造提升，具有很大的市场机会。

台湾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副处长林英杰认为，装备制造和节能减碳在台湾都是非常重要的产业，也是与大陆合作的重点领域。2013 年，台湾装备制造业企业数量 1 万 8 千多家，就业人口 23.8 万人，实现产值近 9000 亿元新台币，估计两年内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兆元产业。2009 年以来，台湾在推行绿色能源产业提升方案，里面有 7 个重点项目，其中 2 个最主要的是太阳能和发光二极管（LED），被称为光电双雄；另外 5 个分别是风力发电、升值能源、电动车、新能源与燃料电池、能源资通讯，被称为五大风火轮；这几个项目近几年内预计投入 300 多亿元研发经费，2015 年也可望达到兆元产业。

台湾大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叶岸认为，节能减碳是一个与人们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产业，不仅仅是产业和企业的事情，还应从个人日常生活习惯改变做起。目前，大陆碳排放总量为世界第 1 位，台湾碳排放总量虽占世界第 18 位，但人均排放量世界最高，因此节能减碳两岸企业、两岸同胞都不能置身事外。

六、两岸农业生物技术和医疗养护产业的合作发展

台湾财团法人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顾问许夏芬认为，有机农场加观光和后续的特色生物技术产品开发，是台湾目前发展农业生技产业的主要模式。发展有机农业与应对环境污染和水污染等有关，有机农场可以通过采用适宜技术，对温度、湿度、水质进行控制，把重金属含量降低，将不必要的元素去除，并解决农药残留问题；有机农场生产的蔬菜果蔬，可以利用萃取、发酵等技术开发各种生物技术产品。

福建省台湾农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福建省农科院农业经济与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曾玉荣认为，生物技术产业是 21 世纪的新兴产业，也是两岸都高度重视发展的产业。两岸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台湾的优势主要在生物制药、疫苗等应用层面，局限在于岛内市场狭小；大陆的优势主要在与粮食和国计民生相关的基础性领域，不足表现在基础理论研究跟产业化脱节、投资在产业上中下游的分布不协调、缺乏强力有效的宏观调控、企业规模小以及在应用开发上相对薄弱等方面。未来促进两岸农业生物技术的合作发展，一是要加强政府引导，在合作范围上发挥规划作用，扮演产业推动者角色；二是要做好产官学有机结合；三是要建立适合生物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机制；四是要发挥产业基地的

集聚效应；五是要与国际上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相结合。

中国农业科学院海峡两岸农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一夫阐述了两岸农业分工合作的现状、趋势、问题以及推进合作的思路。他认为，两岸农业合作包括传统领域和生产要素领域两方面，未来双方合作潜力的发挥将主要集中在要素领域，包括资金、技术和人员的交流合作。随着两岸在农业领域制度化合作进程的不断推进，双方合作会更加开放，整体上不断融入到经济一体化中；合作会更加深入，从目前单一的生产项目向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分工合作发展。目前，两岸农业合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大陆部分地方对台湾农业品种技术引进存在盲目性；二是在引进项目、品种和技术时，往往没有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造成有害生物侵入现象比较严重；三是有些地方重技术引进，但后期配套生产和销路没有解决好。未来推进两岸农业合作，从宏观层面来看，要以更宽的视野将两岸农业合作纳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就微观层面而言，一是推动技术进步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二是更加重视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市场定位和产品流通渠道建设，三是注重在管理经验等软实力方面进行合作。

台湾嘉义市两岸企业发展协进会常务理事苏超麒认为，未来一段时期两岸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农业生物技术及医疗养护都属于健康产业，将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农业生物技术方面，台湾有很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农产品直接萃取是其强项，但岛内市场不够，大陆市场广阔，两岸合作将会有很好的机会。医疗养护方面，大陆保健产品网络渠道的销量目前正以 10 倍速度成长，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发领域。

七、探索建构两岸中小企业交流合作核心基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围绕“京津冀和中原经济区的耦合与冀南新区的发展”，阐述了四个观点：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邯郸市和冀南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二是邯郸市为中原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合作受到国家重视和社会各界关注；三是邯郸市发展定位是晋冀鲁豫交界地带的中心城市；四是新区在中国是一个特殊概念，是新的产业聚集区、新的发展规划区和新的政策特区，冀南新区是晋冀鲁豫地区的支撑点，是邯郸市的经济增长极。邯郸市和冀南新区为京津冀和中原经济区的双向门户，既能得到中原经济区的政策优惠，又可得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促进，还位于南北的发展主轴之一京广线上，有条件加快发展。

台湾中小企业荣誉指导员中区主任委员游富祥，从台湾经验角度阐述了建构两岸中小企业交流合作核心基地的要件与构想。一是鼓励建立产业群聚交流机制，推动中小企

业形成产业集群，共同产销合作，共同采购资源，共同开展教育训练和技术转移推广；二是协助中小企业进行研发活动，包括协助中小企业执行研究发展技术、利用专业辅导机构开展实时技术辅导、协助中小企业开发产品及技术转移等；三是鼓励大学与中小企业合作，培养具备务实观念的高等教育人才，协助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四是畅通资金渠道，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五是提供产业相关信息，使中小企业在第一时间获得最完整的信息；六是建立行政人员服务导向的观念，简化行政手续，提升行政效率。

李保明认为，冀南新区在探索构建两岸中小企业交流合作核心基地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一方面是成本洼地，新区及周边区域劳动力资源丰富，对发展制造业是一个很大优势；另一方面是价值高地，冀南新区作为“双向门户”，为中原经济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政策叠加区，有良好条件接受发达地区的辐射。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殷存毅认为，两岸中小企业交流合作与冀南新区的关系可以概括为“黑与白”的耦合。从经济学角度看，“黑”产业以能源和装备制造业等重型产业为主，代表经济的资源；“白”产业主要指民生产业、文创产业和服务业，代表生活的品质。冀南新区欲在推动邯郸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白”产业不可或缺。然而，由于历史基础等因素，冀南新区“白”产业相对薄弱，台湾恰在这方面拥有优势。因此，“黑”加“白”等于冀南新区加上两岸中小企业，等于冀南新区优势加上台湾中小企业优势。如何推动“黑与白”的耦合，一方面是培训人才，可以考虑引入台湾人力资源培训机构，打造人才培训基地，重点培养文创产业、民生产业、服务业所需人才以及制造企业所需的熟练技工；另一方面是平台建设，要抓住两岸中小企业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机遇，积极争取更加厚实的政策支持力度以及先行先试的特殊权，将两岸中小企业合作基地建设作为体制机制实践创新的新平台和有力抓手。

责任编辑：刘英奎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4年11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世界经济增长乏力

2014年11月9日，世界经济论坛召开全球议程峰会发布了《2015年全球展望》报告。报告指出，收入差距和失业问题位列2015年全球亟须关注的十大趋势榜首。收入不平等加深、失业率攀升、领导力缺失、地缘战略竞争激化、代议制民主式微、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严重、恶劣天气频发、民族主义情绪加剧、水资源压力增大和健康产业重要性上升，是2015年需要关注的十大趋势。

收入不平等加深和失业率攀升这两大问题高居榜首表明，与前几年相比，人们普遍认为这两大问题每况愈下。经济增长乏力和就业形势黯淡的恶性循环，使得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严峻。自2010年该报告始发以来，地缘战略竞争和民族主义情绪首次上榜，反映出国际政治日益分化，以及部分人对全球化出现抵触情绪。环境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环境污染、极端天气、水资源等问题，都有可能加剧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动荡。健康问题列入十大趋势，体现出国民健康与经济健康之间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反映当前医疗卫生体系在应对人口变化、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爆发时面临诸多困难，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关注运用科技提升健康服务。

（二）2015年—2016年全球经济将逐步复苏

2014年11月2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报告，预计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将会逐步改善，但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及此前预期，欧元区经济则将面临停滞和

日益增强的通缩风险。全球各国在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两方面都将出现显著分歧，这将给债券和外汇市场带来波动。其中，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高于欧元区和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则将稳步复苏；俄罗斯经济预计将在 2015 年陷入停滞状态。

OECD 预计，2014 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达 3.3%，2015 年将达 3.7%，2016 年将达 3.9%。虽然大多数预期都维持不变，但日本经济增长预期遭到下调，2014 年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一半以上，2015 年增长预期被下调至 0.8%。不过，OECD 依然预计日本经济将会复苏，原因是企业盈利仍旧处于较高水平，且日元的走软将有助于提升出口。OECD 对欧元区经济感到担心，称其“可能已经滑入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停滞陷阱”。如果增长陷入停滞或通胀预期进一步下降，欧元区将面临通缩风险，预计 2015 年欧元区通胀率将为 0.6%，2016 年将为 1.0%，这一预期与欧盟预期相比略显悲观，远低于欧洲央行 2% 的通胀目标。与此同时，预计美国经济增长将获得更大动能，2015 年增长速度将达 3.1%。英国 2015 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小幅放缓至 2.7%，这一预期高于长期平均值，但仍低于英国央行在 2014 年 11 月预期的 2.9%。对英国经济来说，持续表现疲弱的生产力仍是一种重大风险。OECD 还称，英国央行应在 2015 年中期开始加息，以阻止通胀率过度上升。另外，虽然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加深，但到目前为止几乎并未对大宗商品市场造成影响，不过这种风险仍旧存在。

（三）世界经济发展将处于不稳、不高、不强状态

2014 年 12 月 1 日，国际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在年度经济预测报告上称，2015 年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摆脱“低通胀”状态，世界经济或将呈现“三不”局面。摩根士丹利首席世界经济学家 Joachim Fels 称，世界经济发展将处于“三不”和“不同步”的状态。“三不”指的是“不稳、不高、不强”，“不同步”指的是美国经济发展势头相对强劲，而欧洲、日本等国家经济不振。与“三不”相呼应，Joachim Fels 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的通胀率低于目标的状况概括为“三很”，即“很广、很久、很糟”。他表示，通胀率越是长时间无法提高，投资者对银行的信任就越少，最糟的情况会是“低通胀状况将根深蒂固，甚至演变为通货紧缩”。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专家组还预测，2015 年国际原油价格将反弹回每桶 85 美元左右。此外，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将进一步衰退；美联储在 2016 年以前不会调高利率。

（四）世界经济将继续缓慢增长

2014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了《2015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报告显示，2014 年全球经济增长幅度为 2.6%，略高于 2013 年的 2.5%，增长

幅度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金融危机之后，有关国家的结构调整仍然没有结束，拖累着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乌克兰危机和埃博拉疫情等新挑战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展政策和研究司负责人洪平凡在发布会上指出，2014 年世界经济增长缓慢，预计 2015 年和 2016 年世界经济略有起色，将分别增长 3.1% 和 3.3%；同时，包括地缘政治冲突在内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将会阻碍世界经济增长。他认为，许多国家大量人口长期失业特别是青年失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种状况只是稍有改善；全球通货膨胀仍处于良性范围，只有十几个国家面临较高通胀，而一些欧洲国家则面临通货紧缩；世界贸易在过去几年里处于疲软状况，虽然贸易增长将有所回升，但预计不会回到金融危机前 20 年的水平。

报告认为，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2014 年经济增长比 2013 年有所改善，预计美国经济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将分别增长 2.8% 和 3.1%，高于 2014 年的 2.3%，而欧元区 2015 年—2016 年的增长幅度较小。东亚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预计 2015 年—2016 年的增长将维持在 6% 的水平，东亚经济将保持强劲的居民消费，出口也将有所改善。

报告呼吁继续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推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促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加快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国际金融组织的决策权改革），加强国际税务合作，化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有效控制埃博拉病毒流行。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2015 年—2016 年中国经济将进入“六”时代

2014 年 11 月 24 日，国际投行瑞银发布 2015 年—2016 年经济展望报告称，尽管未来中国稳增长政策会加码，美国经济稳步复苏也将支撑外需，但未来两年中国房地产下滑对内需的拖累幅度将会更大。因此，预计 2015 年—2016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入“六”时代。瑞银声称，为缓冲房地产下滑和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预计中国决策层将加快推进有利于增长的服务业改革，并扩大社保覆盖范围，以促进服务业消费和投资。房地产下滑，还会倒逼地方政府融资、资本市场和国企重组等领域的改革步伐加快。

瑞银表示，考虑到美元强势，预计人民币相对美元将小幅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预计将在 2015 年底达到 6.35 左右，2016 年底达 6.40，但这期间仍可能出现阶段性升值，且双向波动增大。

（二）2015 年中国 GDP 增长率将降至 6.8%

2014 年 11 月 25 日，日本野村证券发布了 2015 年亚洲宏观经济策略展望报告，预计

2015 年中国政府会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从 2014 年的 7.5% 调低至 7.0%，并预测 2015 年中国 GDP 增长率将从 2014 年预计的 7.4% 降至 6.8%，2016 年继续降至 6.5%。如果继续设定 7.5% 的增长目标，会向市场传递错误信号，即中国仍不顾产能过剩与债务压力继续一味追求增长。其次，为减少经济脆弱性，实现可持续增长，大范围的结构改革是必需的，降低 GDP 增长目标可以显示出政府对经济结构改革的决心。野村进一步指出，中国就业市场表现良好，有足够空间去容忍经济增长放缓。此外，平衡增长要求提升消费占 GDP 的比重，这就需要消费增长率超过 GDP 增长率，7% 的增长目标会减少经济结构转型的阻力。事实上，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过度投资使得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在下降，7% 的增长目标更符合实情。

野村称，当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随着劳动人口的缩减，潜在增长率在减少，中国需要适应这种新常态；第二，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对未来的一种透支，中国的投资过度依赖借债，资产错配凸显，环境破坏严重，现在已经到了为这种透支埋单的时候；第三，中国要加快改革，使民营企业、消费、服务业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在短期内会是非常痛苦的，效果的显现需要较长时间。虽然经济增速放缓带来各种痛苦，但野村也指出了让人欣慰之处，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均衡，改革进程也在加快。中国投资 GDP 占比下降，负债 GDP 占比也会下降。GDP 目标增速调低，会加快国企改革、政府预算改革以及产能过剩、利率自由化、环境保护等问题的解决。

（三）中国经济弱点源于房市和地方政府

2014 年 11 月 27 日，评级公司穆迪发布报告称，中国经济的脆弱点存在于房地产行业、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而且大部分弱点处于三者相连的地方。同时，中国增速放缓将延续至 2015 年以后，确定中国的主权评级为 Aa3，展望稳定，预计中国 2015 年实际 GDP 增速将在 6.5%~7.5%。穆迪认为，鉴于中国政府要摆脱依靠对债务刺激增长来实现经济再平衡，中国不太可能采取任何过激的信贷刺激措施。中国央行 2014 年 11 月 22 日下调基准利率与这一目标相符，中国政策的一个关键目标是促进就业增长。

责任编辑：李蕊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2012 年—2015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预测值	2015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4 年 10 月)				
世 界	3.4	3.3	3.3	3.8
发达国家	1.2	1.4	1.8	2.3
美 国	2.3	2.2	2.2	3.1
欧元区	-0.7	-0.5	0.8	1.3
日 本	1.5	1.5	0.9	0.8
发展中国家	5.1	4.7	4.4	5.0
印 度	4.7	5.0	5.6	6.4
俄罗斯	3.4	1.3	0.2	0.5
巴 西	1.0	2.5	0.3	1.4
世界银行(WB, 2014 年 6 月)				
世 界	2.5	2.4	2.8	3.4
发达国家	1.5	1.3	1.9	2.4
发展中国家	4.8	4.8	4.8	5.4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 2014 年 12 月)				
世 界	2.4	2.6	2.6	3.0
美 国	2.3	2.2	2.3	3.0
欧元区	-0.7	-0.4	0.8	1.1
日 本	1.5	1.6	0.3	1.2
印 度	4.5	4.7	5.6	6.3

注:IMF 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

表 2 2012 年—2015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预测值	2015 年 预测值
世 界	2.9	3.0	3.8	5.0
发达国家				
出 口	2.0	2.4	3.6	4.5
进 口	1.2	1.4	3.7	4.3
发展中国家				
出 口	4.6	4.4	3.9	5.8
进 口	6.0	5.3	4.4	6.1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 年 10 月。

表 3 2012 年—2015 年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预测值	2015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4 年 10 月)				
发达国家	2.0	1.4	1.6	1.8
发展中国家	6.1	5.9	5.5	5.6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 2014 年 12 月)				
世 界	3.0	2.8	3.1	2.9
美 国	2.1	1.5	1.7	1.3
欧元区	2.5	1.4	0.5	0.6
日 本	0.0	0.4	2.8	1.4
印 度	10.2	9.5	6.9	6.1

注: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消费者价格同比

上涨率(上年=100) 单位: %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3 年		2.8	1.5	4.3
	11 月	3.5	1.4	8.1
	12 月	3.5	1.5	7.7
2014 年				
	1 月	3.5	1.5	7.7
	2 月	3.2	1.3	7.3
	3 月	3.4	1.5	7.5
	4 月	3.8	2.0	7.5
	5 月	3.9	2.0	7.9
	6 月	3.9	2.0	7.8
	7 月	3.9	1.9	8.0
	8 月	3.8	1.7	8.1
	9 月	3.6	1.7	7.6
	10 月	3.5	1.7	7.1
	11 月	3.2	1.5	6.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工业生产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3 年		2.7	0.0	5.9			
	11 月	3.4	2.9	4.8	53.1	55.2	54.8
	12 月	4.1	2.9	5.1	53.0	54.9	54.4
2014 年							
	1 月	3.4	3.3	4.8	53.0	54.5	54.3
	2 月	4.0	3.2	4.9	53.2	54.6	54.6
	3 月	4.0	2.9	4.9	52.4	53.5	53.2
	4 月	3.3	2.9	4.7	51.9	52.9	52.6
	5 月	3.3	2.2	5.3	52.1	53.5	53.1
	6 月	3.3	2.2	5.2	52.6	54.0	54.1
	7 月	3.3	2.3	4.8	52.4	53.8	53.9
	8 月	2.0	0.9	4.8	52.5	53.7	53.8
	9 月	3.3	1.6	5.9	52.2	53.3	52.9
	10 月	3.3	1.6	5.1	52.2	53.0	52.9
	11 月				51.8	52.3	52.2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

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 年		2.3	1.8	-1.4
	1 季度	2.3	2.8	-2.7
	2 季度	1.6	1.3	-0.4
	3 季度	2.5	1.9	2.7
	4 季度	0.1	1.9	-6.0
2013 年		2.2	2.4	-2.0
	1 季度	2.7	3.6	-3.9
	2 季度	1.8	1.8	0.2
	3 季度	4.5	2.0	0.2
	4 季度	3.5	3.7	-3.8
2014 年				
	1 季度	-2.1	1.2	-0.8
	2 季度	4.6	2.5	1.7
	3 季度	5.0	3.2	4.4

表 7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8.3	3.3	2.3
	1 季度	9.1	1.3	1.7
	2 季度	4.4	4.8	4.0
	3 季度	3.1	2.1	-0.6
	4 季度	6.6	1.5	-3.5
2013 年		4.7	3.0	1.1
	1 季度	2.7	-0.8	-0.3
	2 季度	4.9	6.3	8.5
	3 季度	6.6	5.1	0.6
	4 季度	6.3	10.0	1.3
2014 年				
	1 季度	0.2	-9.2	2.2
	2 季度	9.5	11.1	11.3
	3 季度	7.7	4.5	-0.9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 年		2.3	1.8	-1.4
	1 季度	2.6	1.7	-1.8
	2 季度	2.3	1.8	-1.8
	3 季度	2.7	1.8	-0.5
	4 季度	1.6	2.0	-1.7
2013 年		2.2	2.4	-2.0
	1 季度	1.7	2.2	-2.0
	2 季度	1.8	2.3	-1.8
	3 季度	2.3	2.3	-2.4
	4 季度	3.1	2.8	-1.9
2014 年				
	1 季度	1.9	2.2	-1.1
	2 季度	2.6	2.4	-0.7
	3 季度	2.7	2.7	0.3

表 9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8.3	3.3	2.3
1 季度		11.1	4.0	3.1
2 季度		10.1	3.6	3.4
3 季度		6.6	3.1	2.4
4 季度		5.8	2.4	0.4
2013 年		4.7	3.0	1.1
1 季度		4.2	1.9	-0.1
2 季度		4.3	2.2	1.0
3 季度		5.2	3.0	1.2
4 季度		5.1	5.1	2.5
2014 年				
1 季度		4.5	2.8	3.1
2 季度		5.6	3.9	3.8
3 季度		5.9	3.8	3.4

注:季度数据经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3 年		0.9		7.4	219.1
	11 月			7.0	27.4
	12 月	3.3	2.0	6.7	8.4
2014 年					
	1 月			6.6	14.4
	2 月			6.7	22.2
	3 月	-4.5	0.7	6.7	20.3
	4 月			6.3	30.4
	5 月			6.3	22.9
	6 月	2.9	1.3	6.1	26.7
	7 月			6.2	24.3
	8 月			6.1	20.3
	9 月	2.3	1.0	5.9	27.1
	10 月			5.8	24.3
	11 月			5.8	32.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3 年	22801.9		2.9	27565.9		0.1	-4763.9
10 月	1939.7	2.0	5.7	2330.5	0.2	3.2	-390.8
11 月	1949.2	0.5	4.6	2308.9	-0.9	-0.9	-359.7
12 月	1928.0	-1.1	1.6	2301.9	-0.3	1.2	-373.9
2014 年							
1 月	1924.8	-0.2	2.7	2316.6	0.6	0.9	-391.8
2 月	1877.7	-2.4	-0.1	2300.0	-0.7	0.1	-422.3
3 月	1939.4	3.3	3.8	2370.6	3.1	5.9	-431.2
4 月	1943.2	0.2	3.5	2402.3	1.3	5.3	-459.2
5 月	1965.6	1.2	5.0	2401.2	0.0	3.5	-435.6
6 月	1957.0	-0.4	2.8	2374.4	-1.1	4.6	-417.5
7 月	1980.3	1.2	4.3	2387.3	0.5	4.1	-407.0
8 月	1987.4	0.4	4.3	2387.7	0.0	3.8	-400.3
9 月	1952.3	-1.8	2.6	2388.4	0.0	2.7	-436.0
10 月	1975.4	1.2	1.8	2409.7	0.9	3.4	-434.3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2012 年—2014 年 2 季度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2 年		1696.8	3113.5	-1416.7
	1 季度	292.5	1045.6	-753.0
	2 季度	523.1	704.1	-181.1
	3 季度	449.3	915.9	-466.7
	4 季度	432.0	447.8	-15.9
2013 年		2307.7	3283.4	-975.8
	1 季度	433.1	812.1	-379.1
	2 季度	604.6	1011.3	-406.8
	3 季度	559.9	914.2	-354.4
	4 季度	710.2	545.7	164.4
2014 年				
	1 季度	-1075.5	490.4	-1565.9
	2 季度	624.4	837.8	-213.4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1 季度		-0.1	-0.3	-0.3
2 季度		-0.3	-0.5	-0.3
3 季度		-0.2	-0.1	-0.2
4 季度		-0.5	-0.5	0.0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0.2	-0.2	0.2
2 季度		0.3	0.2	0.0
3 季度		0.1	0.2	0.3
4 季度		0.3	0.1	-0.3
2014 年				
1 季度		0.3	0.2	0.1
2 季度		0.1	0.3	0.3
3 季度		0.2	0.5	0.3

表 14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1.1	0.8	0.0
2 季度		-1.8	0.9	-0.2
3 季度		-0.6	0.7	0.3
4 季度		-1.3	-0.6	-0.9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1.6	-0.8	-0.8
2 季度		0.1	2.3	1.6
3 季度		0.5	0.1	1.1
4 季度		1.0	1.4	0.7
2014 年				
1 季度		0.3	0.4	0.4
2 季度		-0.6	1.4	1.3
3 季度		-0.2	0.8	1.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 比增加(万人)	失业 率
		环比	同比		
2013 年			0.41	-125.4	12.0
	10 月				11.9
	11 月				11.9
	12 月	0.16	0.86	18.8	11.8
2014 年					
	1 月				11.8
	2 月				11.7
	3 月	0.14	0.82	11.7	11.7
	4 月				11.6
	5 月				11.6
	6 月	-0.21	0.03	35.9	11.5
	7 月				11.5
	8 月				11.5
	9 月				11.5
	10 月				11.5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
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1 季度		-0.2	-1.3	-0.3
2 季度		-0.5	-1.3	-0.6
3 季度		-0.7	-1.6	-0.6
4 季度		-1.0	-1.5	-0.7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1.2	-1.4	-0.2
2 季度		-0.6	-0.7	0.0
3 季度		-0.3	-0.4	0.6
4 季度		0.5	0.2	0.2
2014 年				
1 季度		1.0	0.5	0.8
2 季度		0.8	0.7	0.9
3 季度		0.8	1.1	1.1

表 17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2.7	2.8	-0.7
2 季度		-3.9	3.3	-0.8
3 季度		-4.1	2.8	-1.0
4 季度		-4.8	1.9	-0.8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5.2	0.2	-1.7
2 季度		-3.4	1.6	0.0
3 季度		-2.4	1.0	0.9
4 季度		0.0	3.0	2.6
2014 年				
1 季度		2.3	3.6	3.6
2 季度		0.9	3.2	3.5
3 季度		0.1	3.3	3.1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3 年	18960		0.9	17372		-3.4	1588
10 月	1585	-0.4	1.4	1455	-0.4	-2.9	130
11 月	1590	0.3	-1.8	1434	-1.5	-4.8	157
12 月	1571	-1.2	4.2	1426	-0.6	1.4	145
2014 年							
1 月	1589	1.6	1.2	1457	2.0	-2.6	132
2 月	1609	1.2	3.5	1458	0.1	0.1	150
3 月	1598	-0.7	-0.7	1456	-0.2	3.2	142
4 月	1596	-0.1	-1.4	1448	-0.5	-2.2	147
5 月	1608	0.8	0.5	1456	0.6	0.0	151
6 月	1597	-0.6	3.2	1465	0.6	2.8	132
7 月	1606	0.5	2.9	1477	0.8	0.9	129
8 月	1583	-1.4	-3.2	1429	-3.3	-4.5	154
9 月	1650	4.2	8.5	1471	3.0	4.2	179
10 月	1645	-0.3	3.9	1451	-1.3	-0.5	194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
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
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3 年		851	1914	-1063
	10 月	1750	1571	179
	11 月	58	290	-232
	12 月	-89	23	-111
2014 年	1 月	271	363	-92
	2 月	-215	-210	-5
	3 月	-386	-240	-146
	4 月	-33	154	-187
	5 月	258	151	106
	6 月	94	15	79
	7 月	15	34	-19
	8 月	150	60	90
	9 月	111	410	-299
	10 月	96	114	-18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国。
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2 年		1.5	2.0	1.7
	1 季度	1.0	0.4	1.5
	2 季度	-0.5	0.4	-0.6
	3 季度	-0.7	-0.5	0.4
	4 季度	-0.1	0.5	0.7
2013 年		1.5	2.0	2.0
	1 季度	1.5	1.3	0.8
	2 季度	0.7	0.8	0.6
	3 季度	0.4	0.3	-0.1
	4 季度	-0.4	-0.1	0.1
2014 年				
	1 季度	1.4	2.2	-0.3
	2 季度	-1.7	-5.1	0.3
	3 季度	-0.5	0.4	0.3

表 21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3.4	-0.2	5.3
	1 季度	-0.1	2.9	2.0
	2 季度	0.5	-0.5	1.8
	3 季度	-1.0	-4.0	-0.8
	4 季度	-0.6	-3.2	-2.0
2013 年		2.6	1.6	3.4
	1 季度	0.5	4.2	1.0
	2 季度	2.6	3.0	2.3
	3 季度	2.1	-0.6	1.7
	4 季度	1.3	0.2	3.7
2014 年				
	1 季度	3.6	6.4	6.2
	2 季度	-4.3	-0.5	-5.4
	3 季度	-0.9	1.3	0.7

表 22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2 年		1.5	2.0	1.7
	1 季度	3.3	3.7	2.2
	2 季度	3.2	3.0	1.3
	3 季度	-0.2	0.9	1.5
2013 年		-0.3	0.7	2.0
	1 季度	1.5	2.0	2.0
	2 季度	0.5	1.8	1.5
	3 季度	1.4	1.9	2.6
2014 年		2.2	2.3	2.0
	1 季度	2.3	2.3	1.5
	2 季度	2.5	3.3	0.2
	3 季度	-0.3	-2.8	0.0

表 23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3.4	-0.2	5.3
	1 季度	5.6	1.0	6.7
	2 季度	6.2	9.2	9.0
	3 季度	3.0	-4.9	4.9
2013 年		-0.8	-5.1	0.9
	1 季度	2.6	1.6	3.4
	2 季度	-0.3	-3.4	0.0
	3 季度	1.4	-0.1	0.5
2014 年		4.6	3.1	2.9
	1 季度	7.2	6.8	8.9
	2 季度	9.9	9.2	14.7
	3 季度	2.2	5.4	5.9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3 年		1.1	1.46	4.0
	11 月	5.6	1.55	3.9
	12 月	6.9	1.61	3.7
2014 年	1 月	6.9	1.63	3.7
	2 月	7.1	1.67	3.6
	3 月	6.1	1.66	3.6
	4 月	5.0	1.64	3.6
	5 月	0.9	1.64	3.5
	6 月	3.0	1.67	3.7
	7 月	-2.0	1.66	3.8
	8 月	-1.4	1.62	3.5
	9 月	1.0	1.67	3.6
	10 月	-2.1	1.69	3.5
	11 月		1.66	3.5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出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 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3 年	697742		9.5	812425		14.9	-114684
11 月	59410	-0.2	18.4	73370	2.5	21.2	-13960
12 月	60708	2.2	15.3	72614	-1.0	24.8	-11905
2014 年							
1 月	58664	-3.4	9.5	75928	4.6	25.1	-17265
2 月	60378	2.9	9.8	71611	-5.7	9.0	-11233
3 月	58566	-3.0	1.8	74617	4.2	18.2	-16051
4 月	58814	0.4	5.1	67445	-9.6	3.4	-8630
5 月	58046	-1.3	-2.7	66661	-1.2	-3.5	-8615
6 月	59253	2.1	-1.9	69798	4.7	8.5	-10545
7 月	60221	1.6	3.9	70339	0.8	2.4	-10118
8 月	60298	0.1	-1.3	69329	-1.4	-1.4	-9031
9 月	62455	3.6	6.9	73318	5.8	6.2	-10863
10 月	63473	1.6	9.6	73323	0.0	3.1	-9851
11 月	63684	0.3	4.9	72934	-0.5	-1.7	-9250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3 年		3624	133860	-130236
	10 月	-1152	7887	-9039
	11 月	848	5135	-4287
	12 月	489	18470	-17981
2014 年				
	1 月	1420	12604	-11184
	2 月	-1984	6528	-8512
	3 月	4231	7239	-3008
	4 月	-1349	20383	-21732
	5 月	474	7517	-7043
	6 月	2552	7000	-4448
	7 月	-800	7828	-8628
	8 月	97	6392	-6295
	9 月	2750	6907	-4157
	10 月	-1394	15159	-16553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2 年		1.4	0.1	2.5	1.0	4.8	3.4
	1 季度	0.8	0.6	2.7	0.8	6.0	4.8
	2 季度	1.6	0.0	2.9	0.6	4.5	4.3
	3 季度	0.8	0.2	2.2	1.0	4.6	3.0
	4 季度	0.9	0.2	2.1	1.8	4.4	2.0
2013 年		2.0	1.7	1.9	2.3	4.7	1.3
	1 季度	3.2	0.8	1.8	1.9	4.4	0.8
	2 季度	2.0	1.7	2.2	3.5	4.7	1.0
	3 季度	2.7	1.7	1.8	2.4	5.2	1.3
	4 季度	2.9	2.7	2.9	2.2	4.6	2.0
2014 年							
	1 季度	1.0	2.9	1.9	1.9	4.6	0.9
	2 季度	3.6	3.2	1.3	-0.9	5.7	0.8
	3 季度	2.8	3.0	1.4	-0.2	5.3	0.7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2012 年		2.3	4.0	1.5	1.5	5.6	6.2
	1 季度	2.8	4.8	0.7	0.5	5.1	6.3
	2 季度	2.4	4.4	0.9	0.1	5.6	6.4
	3 季度	2.1	3.2	1.6	1.4	5.3	6.2
	4 季度	2.1	3.4	2.9	3.8	6.5	6.1
2013 年		3.0	1.4	2.9	2.1	4.7	5.8
	1 季度	2.1	1.0	2.9	1.4	4.2	6.1
	2 季度	2.7	1.8	3.0	2.6	4.5	5.8
	3 季度	3.4	1.6	3.0	1.5	5.0	5.6
	4 季度	3.7	1.1	2.9	3.4	5.1	5.7
2014 年							
	1 季度	3.9	1.9	2.6	3.4	6.2	5.2
	2 季度	3.5	1.6	1.8	3.9	6.4	5.1
	3 季度	3.2	2.0	2.7	3.6	5.6	5.0

表 29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3 年		7.1	7.7	5.5	5.5	24.7
	11 月	6.9	7.1	4.6	5.4	
	12 月	7.2	7.2	4.3	5.6	24.1
2014 年						
	1 月	7.0	7.2	4.8	5.6	
	2 月	7.0	6.9	5.1	5.6	
	3 月	6.9	6.8	5.0	5.4	25.2
	4 月	6.9	6.6	4.9	5.3	
	5 月	7.0	6.5	4.9	4.9	
	6 月	7.1	6.4	4.8	4.9	25.5
	7 月	7.0	6.2	4.9	4.9	
	8 月	7.0	6.0	5.0	4.8	
	9 月	6.8	6.0	4.9	4.9	25.4
	10 月	6.5	6.0	4.7	5.1	
	11 月	6.6		4.8	5.2	

表 30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3 年		3.1	4.9	3.4	4.2	3.1
	11 月	3.0	4.5	3.3	4.2	3.4
	12 月	3.1	4.3	3.2	4.1	3.0
2014 年						
	1 月	3.2	5.1	3.1	4.0	3.3
	2 月	3.9	4.6	3.1	4.2	3.2
	3 月	3.5	4.8	3.1	4.2	3.0
	4 月	3.7	4.9	3.1	3.9	2.9
	5 月	3.7	4.9	3.1	3.9	2.9
	6 月	3.6	4.8	3.2	3.9	2.8
	7 月	3.4	5.5	3.3	4.0	2.8
	8 月	3.5	5.2	3.3	4.1	2.7
	9 月	3.5	5.1	3.3	4.0	2.7
	10 月	3.5	4.8	3.3	4.0	
	11 月	3.4	4.5	3.3	3.9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表 31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4588.6	4618.5	-29.9	5414.8	6545.3	-1130.5
10 月	405.8	408.6	-2.8	455.2	606.4	-151.2
11 月	379.9	384.3	-4.4	425.1	598.8	-173.7
12 月	374.8	360.0	14.8	428.7	519.1	-90.4
2014 年						
1 月	368.3	346.1	22.2	436.8	567.3	-130.5
2 月	356.5	348.0	8.5	431.3	529.4	-98.1
3 月	409.5	389.0	20.5	448.3	575.8	-127.6
4 月	389.0	396.1	-7.1	402.4	565.9	-163.5
5 月	412.9	408.5	4.4	428.9	572.7	-143.8
6 月	415.3	402.4	12.9	415.5	577.1	-161.6
7 月	397.6	384.5	13.1	426.5	646.8	-220.3
8 月	393.9	398.4	-4.5	355.6	533.8	-178.3
9 月	413.8	398.4	15.4	426.0	587.8	-161.8
10 月	415.7	411.2	4.5	437.9	491.0	-53.1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959.9	1035.0	-75.1	2421.8	2504.5	-82.7
11 月	84.2	84.3	-0.1	208.6	200.0	8.6
12 月	74.0	72.2	1.8	208.5	190.4	18.1
2014 年						
1 月	71.6	87.0	-15.4	160.3	210.2	-49.9
2 月	75.4	74.8	0.6	159.3	188.9	-29.6
3 月	73.9	85.0	-11.1	176.3	183.5	-7.2
4 月	73.8	85.6	-11.8	197.2	201.1	-3.9
5 月	74.6	81.4	-6.9	207.5	209.4	-1.9
6 月	75.3	75.4	-0.1	204.7	188.4	16.3
7 月	79.9	86.2	-6.3	230.2	223.4	6.8
8 月	71.9	87.8	-15.8	204.6	201.0	3.7
9 月	82.6	85.3	-2.8	196.2	213.8	-17.7
10 月	80.4	99.7	-19.3	183.3	203.5	-20.2
11 月				156.5	187.8	-31.3

表 33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3125.5	4658.0	-1532.5	5232.9	3429.8	1803.1
11 月	239.3	336.6	-97.3	468.0	298.1	169.9
12 月	264.0	366.8	-102.8	495.3	324.9	170.4
2014 年						
1 月	268.1	363.1	-95.0	396.5	209.8	186.7
2 月	253.0	334.9	-81.9	364.6	240.3	124.3
3 月	290.8	395.4	-104.6	470.6	274.3	196.3
4 月	237.3	358.5	-121.2	476.8	276.9	200.0
5 月	274.2	394.5	-120.3	441.0	260.9	180.1
6 月	261.4	384.9	-123.5	405.2	266.9	138.2
7 月	279.2	401.1	-121.9	460.6	289.9	170.7
8 月	264.0	374.6	-110.6	409.4	250.9	158.5
9 月	289.0	429.8	-140.8	387.8	258.3	129.5
10 月	260.9	394.5	-133.6	404.6	268.6	136.0
11 月	259.6	428.2	-168.6			

表 34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5596.3	5155.8	440.5	3801.9	3909.7	-107.8
11 月	479.1	431.1	48.0	316.8	321.5	-4.7
12 月	479.8	443.5	36.3	320.7	312.1	8.6
2014 年						
1 月	455.7	447.5	8.2	270.5	311.0	-40.5
2 月	429.1	420.6	8.5	304.6	304.2	0.5
3 月	490.7	455.4	35.3	332.4	332.2	0.2
4 月	502.7	458.7	44.0	340.7	345.7	-5.0
5 月	475.8	425.9	49.9	343.8	342.5	1.3
6 月	478.3	424.6	53.7	334.7	330.5	4.2
7 月	482.1	458.5	23.6	337.1	346.9	-9.8
8 月	461.2	427.9	33.3	333.6	344.8	-11.2
9 月	474.7	442.2	32.5	342.6	336.7	5.9
10 月	514.4	442.4	72.1	370.9	369.4	1.4
11 月	468.9	413.8	55.1	323.3	334.1	-10.8

表 35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11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5355.5	6222.8	-867.3	3054.4	2699.0	355.4
11 月	471.9	551.5	-79.6	257.3	213.8	43.5
12 月	455.3	535.6	-80.3	263.8	241.6	22.2
2014 年						
1 月	437.1	505.8	-68.7	242.9	213.4	29.5
2 月	328.7	414.3	-85.6	212.8	197.2	15.6
3 月	439.3	514.6	-75.3	277.4	258.0	19.4
4 月	408.1	483.5	-75.4	266.0	240.6	25.4
5 月	428.1	486.4	-58.3	266.6	213.8	52.8
6 月	426.6	486.5	-59.9	267.9	249.2	18.8
7 月	442.9	494.9	-52.0	267.5	241.6	25.9
8 月	442.1	478.3	-36.2	280.9	240.0	40.9
9 月	471.3	527.2	-56.0	264.3	229.3	35.0
10 月	477.4	534.0	-56.6	269.0	222.8	46.2
11 月				266.8	224.6	42.2

表 36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 年	2282.8	2060.1	222.7	1835.5	1873.7	-38.2
10 月	211.1	185.2	25.9	157.0	156.7	0.2
11 月	194.5	164.1	30.4	159.4	151.5	7.9
12 月	202.3	172.8	29.5	169.7	154.6	15.1
2014 年						
1 月	193.6	174.4	19.2	144.7	149.2	-4.4
2 月	178.1	146.5	31.6	146.3	137.9	8.4
3 月	197.9	168.9	29.0	151.9	145.2	6.7
4 月	203.3	176.5	26.8	142.9	162.6	-19.6
5 月	200.8	183.3	17.5	148.2	147.7	0.5
6 月	190.2	177.5	12.8	154.1	157.0	-2.9
7 月	191.9	180.5	11.4	141.2	140.8	0.4
8 月	201.0	188.8	12.2	144.8	147.9	-3.2
9 月	200.5	171.5	29.0	152.8	155.5	-2.7
10 月	199.1	195.5	3.6	153.5	153.3	0.2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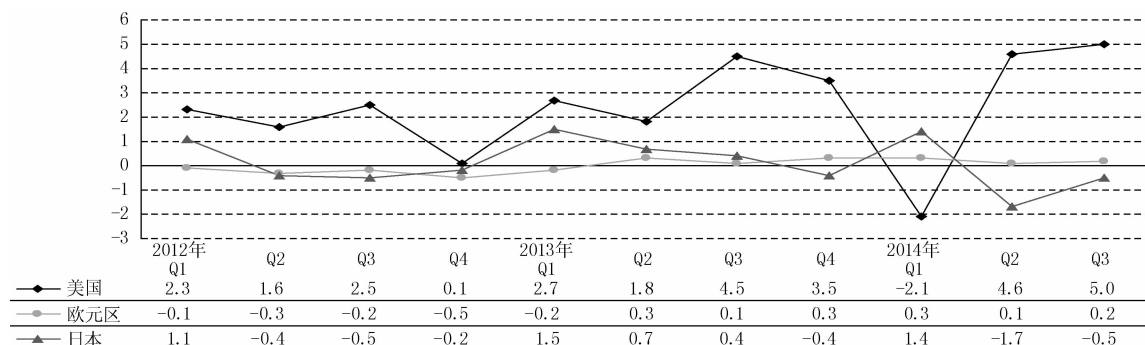


图 1 2012 年—2014 年 3 季度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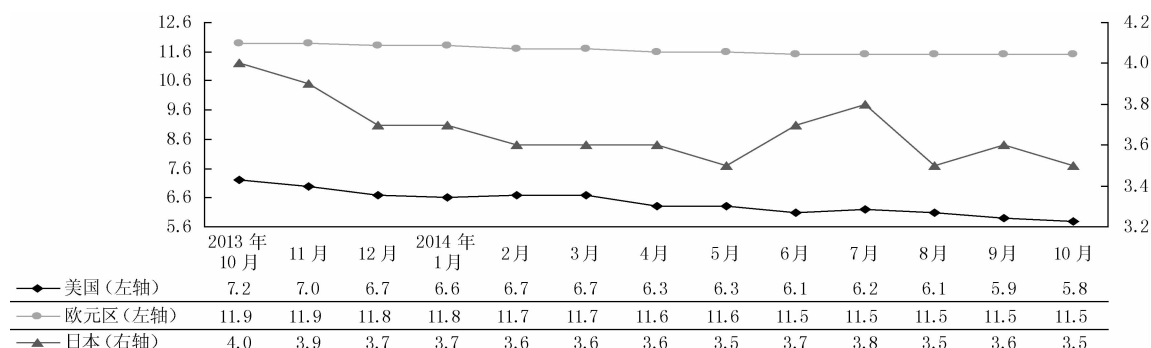


图 2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0 月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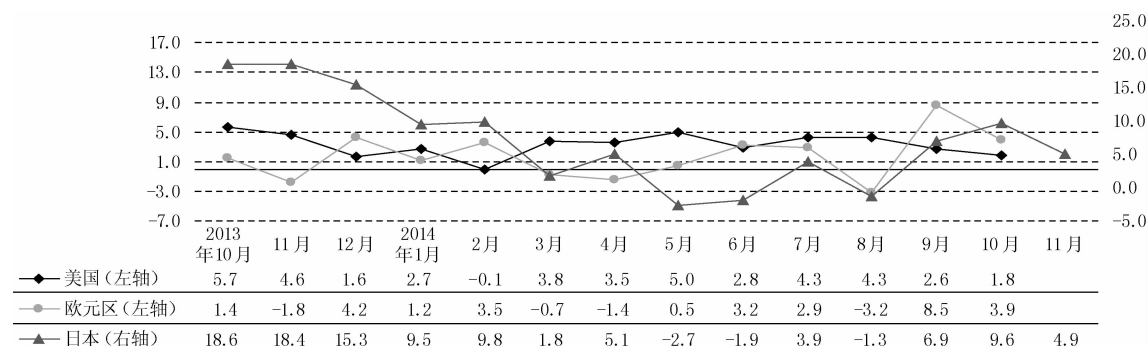


图 3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1 月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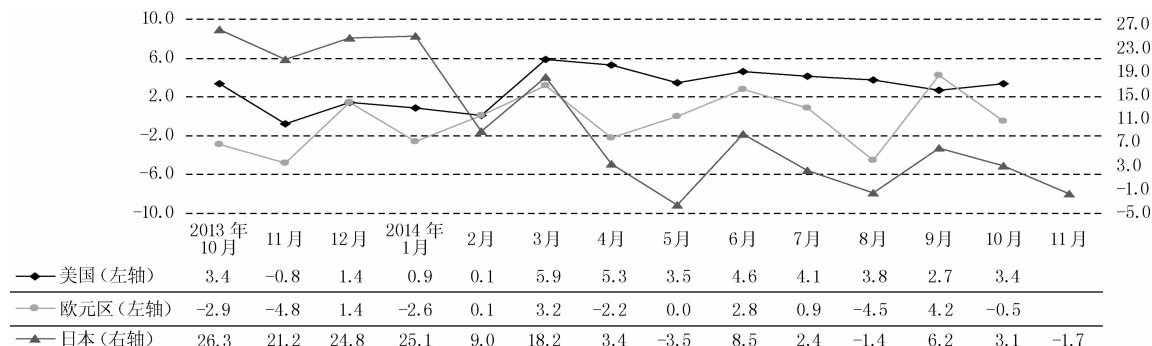


图 4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1 月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李 蕊

ABSTRACTS

(1) Research on the Road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Our Country

Research Group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c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ur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five stag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evolution while we pursue common prosperity since 1949. Though having entered a new historical stage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our country is facing with many severe challenges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mprovement,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policy effects of transfer payments from the exchequer. It's urgent tha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take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in our country.

(2) The Global Economy, China-US Economic Relations, and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Zhu Guangyao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recovery of global economy is very slow and very uneven, global employment keeps not optimistic, interest rate policies of main countries diverge from each other, new technology revolution is yet to be made a breakthroug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e cooperation in many different fields under the context. China-US relations have great impacts on the two countries and even on the world. This article is an adaptation of the author's speech and Q&A on October 8, 2014, at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upplementing some contents of the author's recent answers to reporter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hina economic issues such as reform, the real estate, local government debt, and shadow banking.

(3) Recognize Correctly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i Deshui, He Keng, and Yang Chaofei

Editor's notes: Our country is stepping into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radually now. How to recognize correctly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Globalization invites Li Deshui, the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ommittee for Economic Affairs of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He Keng, the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NPC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Committee and Yang Chaofei,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to make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s from fou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4) The World Economy under the Dangerous Geopolitical Situation

Gu Yuanyang

The world economy developed asynchronously and unevenly in 2014; economic performances of main economies were universally worse than expected; change,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became global trends; overall, developed economies kept loose monetary policies; without fiscal cliff and economic crisis as in previous years, the dangerous geopolitical situation beca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economic recovery; various economies showed different development trends, exerting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Being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cyclic crossing now, the world economy will step into either continuous low-rate growth or the beginning of cyclic boom.

(5) A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Sheng Sixin and Cao Wenlia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s an important deploy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n the new period. Now, the major countries hol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proposal, an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will face different market structure and situation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and Central Asia. Considering capital scale, structure of targeting market, and geopolitical factors comprehensively,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will have distinct cooperative or competitive spaces with the World Bank,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BRICS Development Bank, and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a still has a lot to do, for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ing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expanding its strategic effect.

(6)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untermeasures

Ren Haiping and Wang Tianlong

The complex and volatil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bring a series of new challenges to our country's national security in recent years.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our country's national security become more richer, space domain becomes more bigge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become more complex, than ever before in history.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extend continuously, threats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crease every day,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and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need changing and updating. We shall work hard to set out on a path of national secur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7) Research on the Going-Out Strategy of Chinese Financial Industry

Zhou Yi, Dai Yingjie, and Shui Mingyu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s that our country build a new system of the open economy, accelerate perfecting the modern market system, and expand the inward and outward opening up of Chinese financial industry. The going-out strategy of Chinese financial industry is not only needed by supporting enterprises go out, sustaining re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elerating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industrial transferring and upgrading, but also necessary for dee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national strategy, this paper highlights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summarizes experiences and meanings of Chinese financial industry going out, and explores its effective way.

(8)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and Measures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Li Luosha

The new round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FTA as its symbol, is exerting profound impacts on world trade and political pattern now. China is making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FTAs now.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c choices for our country to take part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o take FTA construction as a ballast stone to build new great-power relations, to promote Asia-Pacific all-around infrastructure and connectivity construction, to build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o develop intercontinental FTAs; also, this paper gives the strategic way for our country to take part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o develop high standard FTAs independently, to join in the TPP o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CEP and TPP, to focu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FTAAP, to work hard to build a China-US FTA, as well as to accelerate the China-EU FTA.

(9) Som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Governance of State-Controlled Listed Companies and Countermeasures

Cheng Fengchao and Liu Ming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the early 1990s,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listed companies in our country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promoting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other aspects, however, it also resulted in many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bl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in state-controlled listed compani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de a deep analysis of three problems existing universally in state-controlled listed companies,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one by one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for developing a mixed economy.

(10) To Accelerate Cross-Straits SM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 Review of the Fifth Cross-Straits Forum on SM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Zhou Xiaoke

The fifth Cross-Straits Forum on SM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as held in Cixian of Handan of Hebei Province, on September 17–18, 2014, and more than 200 professionals from cross-strait authorities, enterprises, colleg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ttended the forum. To accelerate cross-strait SM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s beneficial for deepening cross-strait industrial cooperation, promoting cross-strai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the well-being of cross-strait people. Overall, facing with both unprecedented new opportunities and realistic problems needing overcoming, the cross-strait SME cooperation has broad prospects.

Editor: Xie Yunliang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 征稿通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深切缅怀新四军革命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砥柱中流，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伟大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昭展丹青名家并推书画新秀；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等 8 家单位发起“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活动，参展作品将在全国范围征集，经活动艺委会评选后的 320 幅优秀作品于 2015 年 5 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首展，之后在相关省市巡展并筹台海联展。同时活动中的部分甄选作品将捐由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永世纪念、教育后人。我们诚邀全国画坛诸位艺术家与各界贤达加盟本次展览。

一、组织机构

（一）组委会

主 任：欧阳淞 蔡 武 陈昊苏

副主任：李忠杰 杨志今 左中一 王占生 邓淮生 薛德堂 毋瞩远 黄如军

委 员：张永新 张光东 韩铁成 桂建平 叶小楠 何光耀 乔泰阳 张淮流

刘延淮 周善平 赵黎明 邓小燕 张末生 彭 华 吴长江 赵长青

葛 华 颜 宁 张士明

（二）主办单位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中国海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承办单位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四师淮北分会

中海外爱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协办单位

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区）美协及新四军研究会

（五）军史专家委员会

寿小松 黄如军 耿成宽 徐维国 王传厚 张学忠 徐君华

（六）艺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大为

主 任：吴长江 **副主任：**徐 里 杜 军 **秘书长：**丁 杰

二、展出日期、地点

2015 年 5 月（拟定），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展出规模

本次展览展出美术、书法作品 320 余幅，其中特邀美术名家名作百余幅，全国征稿入选优秀作品 100 件，同书法作品共同展出。评选委员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专家组成。

四、作者待遇

1. 该展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作者具备申请加入中国美协会员的一次条件。
2. 优秀作品 100 件（税前收藏费：中国画作品 50 件；15000 元 / 件。油画作品 50 件；25000 元 / 件）。
3. 画展将出版画册，每位参展作者均可获赠一本。
4. 组委会向参展作者颁发证书。

五、参展要求

1. 参展作者需提供送展作品照片 1 张（10 寸以上）参加初评，照片注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初评入围者接到电话通知后邮寄原作（送原件地址另行通知），同时通过邮局汇寄 150 元评选费进行终评，初评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照片不退。终评落选作品退件。

2. 参展作品一律为原始真实创作，如检测后发现作者使用高仿作品参评，中国美术家协会将在三年内拒绝此作者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任何展览活动。

3. 初评投递作品照片，相同作品照片如反复多次投递，中国美术家协会将视为无效稿件取消参评资格。

4. 送件要求：中国画幅尺寸不小于 6 尺整张，横竖不限；油画画芯尺寸：不小于 1 米×1 米。送件作品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写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和画面相同）、尺寸（高×宽 CM）、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送件须妥善包装并挂号或特快专递邮寄，防止邮寄中破损遗失。

5. 收作品照片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止，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6. 联系方式。收件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一号院 32 号楼 A 座 710，邮编：100083；收件人：张英财；联系电话：（010）59759683。画展信息可登录 www.caanet.org.cn（中国美术家协会网站）查看。

六、特别声明

1. 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2. 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应视为已确认并遵守征稿启事的各项规定。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3 年 12 月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Awati

魅力阿瓦提焕新颜

近年来，阿瓦提县委、政府按照“加强基层、重视基层、服务基层”“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的总要求，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安心基层、扎根基层，把基层作为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平台，作为锻炼自己的重要平台，以民为本，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群众服务，以基层为家，共同建设美丽棉城，使城市整体功能和品位得到极大提升，城市形象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图文/王国纯 杜钊 艾山江·买木提力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Champagne times



新疆阿瓦提县委宣传部 宣